

拉岡累特著  
梁大鵬譯

# 日本的發展

商務印書館發行



K. S. Latourette 著  
梁大鵬 譯

日  
本  
的  
發  
展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初版

(一〇三九三)

日本的發展一册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K. S. Latourette

譯述者 梁大鵬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版 翻 \*  
\* 所 印 \*  
\* 有 必 \*  
\* 究 \*  
\*\*\*\*\*

(本書校對者呂鑑平)

陸

## 譯者序

日本自一八六七年皇權歸還後，就虛心納物，採用西法。決然毅然廣求改革。費時僅二十餘載，已至內政修明，國基鞏固。伊藤、大隈等一班有能的政治家，就把他們的「注意」從國內政治漸移到向外發展上去。結果，我國首當其衝。日本一八九五年戰勝我國之後，就闊步的跑上帝國主義的程途。至一九〇五年再一戰而勝俄國。大和民族自豪的心理，日益增大。帝國主義的氣燄，越不可抑。要之，日本的向外發展，就是我國的忍辱犧牲。現在，我們的東三省已被日寇打劫了。不消說，這個「讐」是快要報的。日帝國主義者終會被我們打倒的。我們要打倒日本，要先瞭解日本。要瞭解日本，最好是先從她的歷史方面去觀察。

日寇打進來了。國內學者研究日本，也跟着緊張起來了。國內書攤上確出現許多關於日本的書籍了。然而要找一本從史的方面論述日本的專卷，比較適合國內讀書界的需要者，至今尙付缺如。這不能不算是我國學者的一樁醜事！

譯者起初滿心要編一部日本政治史；可是把個人的時間打算起來，期期不敢執筆。不久得聞耶魯大學拉圖累特教授 (Prof. K. S. Latourette) 所著的日本底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一書出版，馬上花了幾塊金圓買來，從頭到尾讀了一遍。覺得此書內容尚稱充實，作者態度尚比較的公正。當譯者閱此書時，正是日寇的飛機戰艦協擊上海之候。譯者受了愛國熱情的激動，除了參加一些反日工作之外，就每日抽些時間出來繙譯此書，作為抗日期中個人工作之一。

本書作者拉圖累特教授是研究遠東政治很有權威的學者。他是孫中山先生的老友，曾著有中國底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孫逸仙傳 (Sun Yat-Sen) 等書。別的不說，本書自出版以來，深受美國讀者烈熱的歡迎，現在已重版至三次了。作者對於日本的觀察和見解，都有他的獨到之處。譯者因敢以此書介紹於國內讀者之前。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序於紐約城

# 目錄

## 譯者序

- 第一章 日本地理上底重要……………一
- 第二章 從早期至佛教的傳入……………一一
- 第三章 從五五二年佛教的傳入至一一九二年幕府的組織……………二五
- 第四章 幕府：從其成立（一一九二年）至德川家康的握政……………五八
- 第五章 幕府：從德川家康的握政（一六〇三年）至培理來日（一八五三年）……………七九
- 第六章 日本舊時的文化……………九四
- 第七章 國內轉變時期（一八五三—一八九四年）（一）……………一二三
- 第八章 國內轉變時期（一八五三—一八九四年）（二）……………一三七
- 第九章 國內轉變時期（一八五三—一八九四年）（三）……………一七三

- 第十章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三一年：日本在國際上底地位（一）……………一九一
- 第十一章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三一年：日本在國際上底地位（二）……………二〇九
- 第十二章 中日戰爭後日本國內的發展（一八九四—一九三一年）……………二五一

參考書目



# 日本的發展

## 第一章 日本地理上底重要

日本旁居東亞，從堪察加（Kamchatka）至馬來半島之極南，一帶長列的諸島中，日本就占其較大的部分。日本的屬地北至千島列島（Kurile islands）之北，南至台灣之南。長約二千五百英哩，比美之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州而稍大，比之不列顛諸島（British Isles）約多百分之五十。日本島嶼許多是很狹小的，其中有住民的大小島嶼約有六百。日本有六個大島，我們依次從北至南說來有薩哈連（即庫頁），蝦夷，本道，四國，九州及台灣。薩哈連，日人叫作樺太，南半部漁業至爲重要。蝦夷，日人叫做北海道。未久以前，該島的住民大都是蝦夷人。現在呢，該島已有神速的發達，日人移居那裏的也漸衆了。日本的本道（或稱本土）是諸島

中最廣大的。牠的面積占日本帝國島嶼部分的泰半，自從日本有史以來已就成爲日本政治的中心了。日本的四國是上古該島在行政上劃分已就有的名稱。四國爲日本南部內海邊境的一部分。水岸景色之美麗是噴稱人口的。日本的九州，依字面來說就是九省。這個名詞也是早期在行政劃分上已就有定的。九州與本道爲下關海峽所隔開。下關海峽雖至狹小，然而交通逾恆重要。從東亞口岸而往北美的船隻大致是經過這一條水道的。九州在日本諸島中，與高麗，中國距離較近。因此，也就是亞細亞大陸影響於日本所經的要道。試以歷史來說，該島也是十六世紀最先與歐洲文化接觸而深受其影響的地方。九州的長崎不特是景緻絕麗，而且是日本帝國諸重要港口之一呢。台灣於一八九五年由中國割讓與日本，可是台灣的人民在種族方面還是不能與日本人同化。日本，在蝦夷之北的千島列島是一線長列而住民稀少的諸島。在南部有九州與台灣兩島，又有琉球羣島爲之連接。我們知道琉球羣島在過去六十年中纔分明屬歸日本管轄的。除了上面所舉的諸島之外，日本現在握有高麗（面積約等於日本帝國島嶼部分面積之半），更進而控制南滿和內蒙。戰前德國在太平洋赤道之北的屬地

亦歸於日本所統轄。日本國威的張大從此可想見了。

### 人民與歷史之受地理的影響

我們上面所舉日本領土的重要成分，已略說明地理對於人民的顯明的影響了。從歷史上看來，日本諸島就因為地理的關係，已密切地結合得牢牢固固的。日本人雖則種族的來源雜而不一；然而除了稍些例外，他們同寅協恭，羣策羣力的精神，的確是教人起敬的。他們的國家意識，表現得逾恆濃厚，他們高度的愛國熱誠的與時俱長，自然與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是息息相關的。換而言之，他們愛國心般，是因為他們隔海而居，少與外族接觸的緣故呢。

日本是個島國，自然能獨立地和繼續地令他們國族發展的。日本自從立國以來，從他們的祖先直至現在，未曾遇過一齣有效的外來的侵擾，未曾像中國那樣被外族來中斷其政治的程序。在十三世紀，日本雖被蒙古人來侵，雖受外族管治的恐嚇；然而無一可算是有效的侵擾。除了在思想方面外，日本人民從未受過外族的征服。日本文化的啓發，分明是深得外來文

化影響的。可是他們能自由地去擇納國外的文物制度，而又能把所已擇納的去加一度改變，以求適應於他們實際的需要。

日本人是島居的人民，因之，他們自然是善於靠海謀生的。日本港灣之安全，與諸島之間廣大水裂之烏有，更足鼓勵人民對於海業的經營。日本的長崎，橫濱均是世界著名的好港。日本的內海也是很好的。中有小島的點綴，既無狂風暴雨的擾人，又是文化發源的舊地。這樣，自然的能引起人民對於水面生活的競向，與對於漁業的發展了。無怪乎，日本人在現代世界商業中注意到海的方面上去呢。今日世界諸商埠中，實沒有一處看不見日本國旗的飄揚了。

我們知道，日本諸島與亞洲東岸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因為在地理上相靠近的緣故，於彼此交通方面，當然容易增進。日島至少有三處幾乎與亞洲大陸接壤，所以交通上比較的多大便當——薩哈連在北，九州和高麗居中，及台灣位南。這三者之中尤以九州和高麗為最重要。緣因日本人的祖先一部分是道經高麗而達日本的。中國和印度的文化也經高麗而後舶入日本。有了高麗而日本與亞洲大陸的通商，纔有如許高度的便利。以講薩哈連，或許早期有些

部落從北方經薩哈連而到日本，說不定這些部落就是今日的蝦夷人的祖先呢。以講台灣，則有琉球羣島爲到日本之接道。馬來人到日本之便利，及日本人種之含有馬來成分者殆由於此。

日本在地理上如許靠近亞洲大陸，自然對大陸的事件特感興趣了。亞洲是日本商業發展和領土伸張的自然場所，同時也是日本過密人口的自然的出路了。日本人無時不用盡他們的法寶，令西洋諸國不得在與日本靠近的大陸要區握有權勢。所以，他們爲高麗而與中，俄戰爭，由戰爭而至併吞高麗。他們要求：（一）中國不得把向台灣的福建口岸割讓於歐洲強國。（二）中國在國際上若要解決某種問題，須得日本的同意。（三）中國應即開放與日通商。在歐戰期中，日本曾圖在中國建設他們特殊的勢力，鞏固他們的勢力，令戰後不易爲列強所搖動。他們在亞洲大陸所取的主義，也是一種「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他們在亞洲對於列強的防範，與美合衆國在美洲對於歐洲國家的防範，是同出一轍的。日本所恐懼的是西洋國家在富於物產的中國與高麗，享有專利，俾日本商業發展上遇有阻梗。日本有些

領袖在他們的內心無疑是存有領土擴張的意思的；可是我們應當記得在未久以前，我們也是一個侵略者，我們也曾從無防禦的國家奪佔了不少的土地。

日本的領土是狹而長的，與大陸口岸靠近的。在地理上這極值得注意。在未有的歷史以前，許多各種不同的種族，因地理上之便，纔能來到日本。我們知道經薩哈連來日本的曾有許多與西伯利亞人類似的人民，又經高麗來了許多中亞，中國及高麗等處的人民，並從南方又混入那些馬來人的血脈。日本在地理上有了這樣的關係，致能執得東亞的牛耳呢。我們知道地理與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是息息相關的。英國因為居有地理上的優勢，故能操縱歐洲西北的海道，而為北大西洋的霸首。至於日本更是無庸說的。日本地理上既有如那優勢，則在商業上，航業上都是東亞的當然的主人 (logical mistress) 的。

因為日本在地理上所處位置的優越，自然的又使她成了東亞文化溝通的樞紐了。她的大商港口，有向美利堅的，也有向亞洲大陸的。自從水蒸汽發明之後，日本在太平洋的航業已大可與西洋各國相競比了。所以，日本盡量的開放門戶於西洋諸國，領導開放高麗者固非偶

然，就是許多中國學生擁擠地負笈於日本學府者，也屬意中的事情。總之，日本因地理上的關係，便能領導遠東諸國踏進新的時代呢。

日本地位之所以如許重要者，不僅因為她是個島國，并和亞洲大陸關係上受了影響之故。同時我們要知道，日本的土質對此也大有關係的。第一，日本分明就是個多山的島國，高山峻嶺，羣立壁天。凡經到日本的人，都有了這麼一個印像的。這許多山嶺中有些是由於地震爆發而成的，也有些是由於其他自然的變遷而成的。山嶺在日本占了地面最多。結果，僅有一小部分的土地可以耕種。現在日本全國可供耕種的面積（高麗不在內）大致僅有百分之十七。也許另有百分之十的面積，可以開墾的；但是此項開墾的費用為數繁鉅，自非易舉。所以，現在日本人口的增加與國內糧食供給的困難問題，已臨在目前了。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移民國外，另一個是如不列顛一樣的去發展工商業，所以日本看中亞洲大陸，滿洲蒙古及西伯利亞又是地廣人稀的地方，可以移民。中國人呢，馴良而勤勞，中國的市場又最廣大，以原料而論，則中國之富有，可謂世無匹儔。東亞沿岸一帶幾乎完全是個大倉庫，而又將

是更大的倉庫。日本既是多山的國家，瀑布水力尤見便利，發展工業也頗適宜。日本的煤炭產量既多，雖缺乏鐵礦，然可不經遠道取自中國本部及滿洲。因此，亞洲大陸的門戶之開放，於日本最有利的。日本在大陸對於特殊權利的要求決硬幹的。何以言之，因為那裏是糧食之源，那裏是日本過剩人口可能的出路，那裏是利於日本工業品的市場，及原料的寶庫。

因為是多山的緣故，把日本分成許多小的山谷及曠原。日本的可通船的河道甚渺，在鐵路、電信及汽船未適用以前，交通問題逾恆困難。所以疇昔日本在那種情形之下，自然的形成了許多小個各不相關的地域。每一個地域對中央政府幾乎都有獨自為政的趨勢。那時候的社會是封建式的，是側重於家庭方面的。

說起日本的氣候，我以為是最宜人的。日本的領土大半位於溫帶，可以說是發展最高文化之理想之鄉了。日本的颶風常多發作，故熱度驟變，日有不同。這樣一種氣候，依現代一派地理學家的意見，都以為是最好的。因為氣候多變，可增進人民的活動力，及提高文化。日本雨量頗多，又有溫的海流來自熱帶，調洗了她邊岸的一部。可是這種氣候對於蔬菜的種植有不適



宜。農夫常費不貲的勞力，而收穫者多不如意。日本人民之所以經久不能自耕自給者，正因為她的土地和氣候有不利於此呢。

日本天然景緻的美麗，是大可入畫的。無怪乎日本人愛美性之所以特富了。小山間的花木，多樣的嶺谷，湖，港，海色之豐麗，那能不令人發美感呢？又那能不令日本人民發展其對於美術的歡賞力呢？總之，日本地方在世界上可稱最美麗的一個了。花，木，鳥，湖，川，流，瀑布等無一不足令人流連愛賞不舍的。日本之所以有禮貌，及重視儀式者，一部分是因為長期的在這種環境之下的一個自然陶養的結果。

綜上所說的，我們知道日本的地位，日本的天然產物，及其諸島的特性，是處處深切地影響及她的人民，她的文化，她的野心及其政策的。

參考書：(See end of the book for annotations and further details on these works.)

Griffis, The Mikado's Empire; Japan Year Book; Hearn, Glimpses

日本的發展

10

of Unfamiliar Japan; Mitford, Japan's Inheritance; Nitobe, The Japanese Natio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article Japan.

## 第二章 從早期至佛教的傳入

日本早期的歷史，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得之於口傳，神話，古詩，教儀，及另一方面得之於人種學與考古學而已。所以，知而不詳的地方，在所難免。按日本最早的史記，其中最著者有二：一是古事記，一是日本記。前者成於七一二二年，裏中所記載的僅是憑一人的記憶，及搜羅所得的一類傳話。至於後一種則成於七一四年，（一）是由若干學者受政府之命，精心探究當時所集的記載及傳話而得的結果。日本記的寫成較之古事記受中國思想及言語的影響為深切。可是，這兩部史記裏中所寫載的故事，都是按照編纂者的觀念及當時的環境而下筆的。

（一）日本記於七二〇年修改，名為日本史記。

### 日本民族來源的傳說

我們如果從日本人的神話和口傳的看來，就可知道日本的土地人民及國家在起緣上的一些故事。日本相傳謂最初有的是若干天神，這些天神都各代表一種自然界的威力（*force of nature*）。

他們都是一對神夫婦的後裕。神夫名叫伊弉諾，神婦名叫伊弉册。神婦

死後，神夫親到地下求遇；可是當把晤時，神夫發怒於其亡妻，就獨歸地上。歸後他以為與死者

及其他一班在污瀆的鬼神相逢，於自己有蒙不潔，就先行清洗而後纔降生日女神（即天

照女神），月神及力神。力神因常多滋擾，其姊日女神不堪其侮，就避退穴洞，全地變成黑暗。諸

神不勝其苦，千方百計，要引誘日女神返歸大地。正諸相籌思之際，中有一神獻計，相率到日女

神之前舉行聖舞，禱告（此為後來教儀之始），及奏作悅耳之音樂，再備一座明鏡對女神持

照，女神看見鏡中現出自己之影，異甚，就慢然移步，隨鏡出洞。女神出洞之後，諸神即將洞門封

鎖，以絕女神復歸之路。至於力神則離開天國，并在本道之西南的出雲地方那裏產生一種人

類。日女神的曾孫瓊杵繼就受了諸神委派去管治日本。同時又授了那些珠串、一把寶劍，及

把引誘女神出洞的那座寶鏡作為他管治日本的主權的徵表。這三種遺寶，傳謂現尚存在日

本皇室。又謂瓊杵定居於今之九州。神武天皇就是他的後裕。神武後來取道由本道之南而到四國之東的大和去，在那裏建立他的帝國而自稱天皇。這是紀元前一六六年的事情。經了好幾百年及傳了許多位天皇之後，九州、四國及本道的南部纔漸歸治於大和皇室之下，同時又向北征服異族以廣疆土。當時有一位勇士名日本尊者在北至東京海股一帶與原來的土著人大啓搏鬥。因此，這位勇士的芳名，現尚爲日本人民所敬佩。

日本早期的故事，若要詳盡的說起來是極冗長的。可是在這冗長的故事中多屬世傳之言，得之於史冊者至少。上邊所述的故事，日本還在相傳，惟已不能邀一般學者的置信了。然而從未有作公開的否認過。這類故事影響於日本人民的厲害，可以想見了。依照這些故事說來，日本現在的天皇尙是「神」的後裕。因爲日本的天皇是萬世一系的，未曾中斷的。凡此種種都足以使人民對於天皇尊嚴的持固，不忠於天皇的，都看爲有犯瀆聖之罪。我們聽說古昔授與瓊瓊杵的珠串、寶劍、明鏡，現在還是一代傳至一代，一皇傳至一皇的保存着。或許這即算作天皇的始祖屬神非人的表徵了。日本普通人民對此種信念頗深，所以雖在科學昌明的現

代尙不稍減。將來也許因教育更高發達，人民此種信念會漸失掉。然而，現在若果有人公然指出此種信念之謬妄，那就會被大眾看爲「不忠」的行爲了。

當美人培理 (Commodore Perry) 於一八五三年到日本的時候，日本人民，尤其是一般急激愛國的青年，都無不相信現在的日本人，大半是古昔神人的後裔的，是優秀過其他一切民族的。這種信念，對於人民愛國心的助長，當無疑義。

我們從上面所說的故事看來，及得了人種學和考古學的幫助，或許可以寫說日本早期的歷史而達至相當確實的程度的。日島最初的居民似乎是一種穴居的人類，他們是否尙繼續存在，仍屬疑問。假如說，他們在歷史上如此是事實，則他們的遺跡，只可尋之於地層下的穴屋及甲壘中了。我們可斷定他們的文化必是極度古陋的。據我們所知，日本最初確有一種土人。有人說日本的土人就是現居於蝦夷島及千島列島的多毛扁面而賦性已變馴良的蝦夷人。蝦夷人的來源，學者聚訟紛紛，莫衷一是。有些人說，日本的先民是來自北亞的。當日本人最初到日島的時候，諸島的土地泰半爲土人所居。這些土人是一種強悍而殘酷的民族。當日本

人與他們接觸之初，他們尚在石器時代，尙是食人肉的蠻族。所以，我們可斷定那時候，他們顯然是沒有家庭生活的。他們對於多近開化而行侵略的日本人，無不作有力的反抗。可是被逐退避。經過了好幾百年的長期鬪爭之後，這些土人纔爲日人所克服，永遠的克服了。他們的血統也已與日人混合了。這種血統上的混合，尤以蝦夷之北爲較顯著。

現在的日本人的血統已是最混雜的了。這都是與外來的種族接觸而生的一種自然的結果。我們現在雖不能舉出個中混合的成分或各支派血統的來源；可是我們卻可斷定日本人的血統的混合，在來源上的支派必多，在時間上又必有先後的不同。日本種族來源的複雜，不特在稗史，神話中可尋旁證，卽以考古學方面來說，從地下古墳掘起的東西，也足示出上所言之可靠。日本人對這混雜的種族，雖已求其融化一致；然而其所達到的程度，還是不得完全的。在遠古的時候，日本的民族已就顯有兩種：一種可以說是貴族的 (aristocratic)，另一種可以說是平民的 (plebian)。屬於前一種者，肢體瘦弱，皮色淡白；屬於後一種者，則軀體矮短，皮色略黑。我們知道日本人的祖先大概是從亞洲大陸道經高麗半島而來的，亦有由南方馬

來羣島而來的。日本人血統中含有馬來種的成分者，率由於此。有些人說，日本的九州人民與今之婆羅洲 (Borneo) 一種人頗相類像。相傳謂古昔婆羅洲有一種人向北道經與日本連接之諸島而來，後來他們被日本人在大和一帶所征服，再由征服而至同化。我們對遠古人種學上所知道的還很尠，所以要作毫厘不爽的斷定日本民族在血胤上的一切關係，卻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我們現在僅可以說日本人的血統上受之於滿人，高麗人及馬來人者最爲顯著。除了這些混合之外，尙有與蒙古人混血者，或也有與漢人混血者，還有其他一部分，尙屬無知之數。日本人中有些人因爲熱情愛國之故，竟豪稱日本人與印度歐羅巴人 (Indo-European) 混種者。試就言語而論，日本語與北亞中亞的一部分人民的言語頗相近似，與馬來語也有類像之處，而尤以與高麗話最爲相近。

當日本人的祖先初到日本羣島時，以進化而論，他們中有些已入了銅器時代，有些達了鐵器時代了。起初他們的人數，並不比土人之衆多；然而卻比較優秀。我們知道日本人那時是從兩個中心地點而散布於各島的。據說這兩個中心地點，一是今之出雲，一是與南部羣島及



高麗幾接壤的九州南岸。此外，另有一個顯著的文化的中心是大和。誰都相信當時這三處地方的人民於血統上是互有密切關係的。他們最先在九州，由九州而征服大和，復由大和而出雲。日本人相傳謂大和的征服是由於神武天皇的命旨。大和既被征佔，而日本人的國基始定。接後，他們的領土遂由大和逐漸的擴張起來。據一般的傳說和神話，都以為日本帝國開創於紀元前六六〇年；可是以當時的情形看來，日本的國基，也許是比紀元前六六〇年後幾個世紀而始定的。何以言呢？因為擴張領土，並非一樁易舉的事情。日本人的祖先每一尺土都是以武力向蝦夷人手裏搶過來的。況且蝦夷人對日本人的強佔行爲，反抗甚烈。此外，還有其他人民爲日本人進展之梗的呢。關於這些故事，古事記，日本記兩書均有記載，惟其所記載的多有味然莫辨之嫌。

## 大和國家

日人的祖先移渡日島之後，經有幾個世紀之久，日本國家的形式纔告成立。當時他們所

佔有的領土僅有本道的南部，四國及九州共三部。他們的國家形式雖已成立；然而各部人民在關係上卻很微弱及疏漫的。後來他們逐漸向北方發展直至本道的中部。以力量論，他們當時是大大可橫行本道的。相傳謂古昔有一位勇猛過人的叫做神功皇后。在她所統率之下，大和國家曾侵伐高麗，皇后的子氏應仁更是一位數奏戰功，享有盛名的人物。日本人民無不以大戰神崇拜他。我們從石碑和高麗人的記載上看來，就知道日本人侵伐高麗半島者確有數次。在地理上高麗與中國接壤，而中國當時又是東方文化最高的國家，比之日本自然是文野之別的；可是中國內部諸侯分地割據，內訌迭生。無怪乎因此惹起日本軍人領袖對高麗特別注意而垂涎欲滴了。經了多年的企圖與霸行，日本人纔佔有高麗南部的一部分。自是，高麗人民之移居於日本者漸衆，高麗接就成爲大和國家的納貢國了。

大和國家的文化在當時所表現者簡陋異常。那裏沒有城市，沒有精工建造的屋宇。經了好幾百年大和的人民還不知世有所謂文字者。縱令他們當時有用文字，也必極其稀少的。家庭的制度雖已進至父權；然母權尙未盡去。當時的土地大概都是天皇與貴族的私有財產。在

交通方面僅有簡小的船隻，在食料方面以魚爲全國普通的重要食品，惟不如現代的日本人食用魚類之多量的吧了。種植米穀及蔬菜等漸普及，荒山林木亦漸斬去，山地變爲田園，農民頗識灌溉。畋獵山林取食獸肉，亦是當時人民生活的常態。烹調則用無蓋的土器，衣服則稍有用絲，大都以麻及樹皮等。棉花當時尙未由中國介紹過來，羊毛之用，尤未聞知。幣制尙未發明，交易則以物換物。美術方面亦是極其粗陋。可是後來日本人大改舊態，美術的愛好和重視，日增不已。從他們個人的裝飾上看來，就知道是煞費苦心的。古昔日本人的軍裝已夠表現他們愛好美術的開端了。他們那時候的貿易只是限於農用，家用，軍用等器件的簡陋的以物換物的關係而已。至於工匠們的組織是一種「行會」。人民的生活，大概是農業化與軍事化。社會階級頗爲森嚴。奴隸制度之久曾存在者，大約是不斷戰爭的結果吧。其時日本沒有任何法典，訟事的裁判，方法至爲野蠻，被告人在原告人之前誓向神明試證。把被告人的臂腕放在沸水中，或手握火紅的鐵。若經此而被告人的臂腕或手不爲所烙傷者，當告無罪。還有一種很殘酷不近人情的習慣，主人逝世埋葬時，其僕役，妻妾均偕生埋；可是不久因受大陸文化的影響，這

種惡習纔行破除，以泥像替代「生人伴葬」的習慣成立。

大和國家開始就築在戰爭上面。日本人與蝦夷人長期戰鬥，又與西南諸部人民的搏爭，無一不是顯示他們好戰的天性。日本人與中國人不同，他們因為生性喜鬪，又好擴張領土，所以每一寸土都是用武力去爭佔而得的。日本人的文化大都是軍國的，農業的文化。在中國呢，武人向不重視，中國人僅以為「兵」是保護士農工商階級的一種不得已的設施。這種觀念與日本就根本有殊。日本是個軍國，自從有日本歷史以來，除了極少的幾個重要世紀之外，一切國務都為武人所支配。

我們要瞭解日本帝國制度，就應從它的早期說起。日本早期的制度與現在的不同。現在的制度是經過無數年代演進的結果。起初，日本的總治首簡直是統馭諸部落或氏族的領袖。這種領袖在權力上是絕對的。可是實際則總治首的權力的握有，並不見得如何絕對，不過在諸酋長的互相聯合之下，而總治首居有因襲統率的地位而已。諸酋長中不是人各忠心於總治首的。如西南部的諸酋長都是各自為政。除非大和朝廷遇着強威的總治首（天皇），他們

是不會輸誠聽命的。日本天皇在早期是全國最高的祭司。他有權力宣戰媾和，所以日本的帝國制度是在其民族的意識中樹立的。這種民族意識，雖曾迭經改變；然而未嘗稍廢過。到了十九世紀大轉變的來臨，這種民族意識，就成了日本國家改造的推動力。

日本的宗教簡單逾恆。日本沒有正式的神學，沒有好的倫理制度。人民在自己的行爲上，對於人生的神秘上，和事物的原始上，所了解的程度，都極膚淺。他們對於自然界的大力，與巨的物體均由驚怕而至奉拜。祖宗的精神，尤其是皇室祖宗的精神，更爲增誠崇拜。所以，後來日本人的宗教大部分就成爲崇拜皇權的儀式，和爲皇權保障的壁壘了。那時候的日本人民都以爲他們的周圍無論在林木，石頭及空間無往不是鬼神的所在。甚至獸類他們也當作神靈看待。在神廟方面，當時還是寥寥無幾，建築上尤極粗陋。教儀呢，是很其簡單的。其所包含的大概是祖宗靈秀的崇拜及敬怕而求赦罪贖咎的。因爲要赦罪贖咎，就影響及個人的清潔。日本人之養成清潔習慣者，率由於此。日本人起初與其他原始社會的人民都同樣的有許多禁忌的事物。例如：死人的屍頭，及臨產的婦女，都是絕對禁止人家接近的。這種迷信，現在雖經改變，

其改變的程度仍至稀微。本來他們所奉信的東西並沒有甚麼名稱；可是後來因為外國文化輸入，引起他們自我的意識，纔以其所信奉的名爲「神道教」。所以，現在的神道教，也就是日本人早期的宗教，不過經了許多個世紀而有若干的改變吧了。

我們上面所述的文化，簡陋的文化，都是經了許多個世紀不斷的進步，不斷的改變而得的結果。我們這裏所述說的雖有「語焉不詳」之嫌；然而如果詳盡的說起來，就非專卷莫辦。

### 中國文化底輸入

當日本國家在大和一帶伸張的時候，一種有力的文化已在比隣的大陸啓發得靡然大有可觀的了。至少在紀元前第二個一千年之初，中國本部的西北，人民土地已兼并的增加了。降至紀元前一千年的後半，中國已有哲學，文學，美術及商業的組織了。這種文化與上古西方的最高文化是大可比競的。孔子對於哲學，倫理學及政治學的貢獻已屬靡然，而他的偉大的人格尤爲不可磨滅。他所書述傳下來的學說，大部分便是所謂中國的經典。這種經典的影響

力，除了佛教，耶教的聖經之外，是翹然世無匹儔的。後來，孟子和其他許多哲學家就承繼孔子的道緒而光大儒家的學說。孔子時代，道教勢力已大，字象也達完善。那所謂字象者，一部分是形象，一部是意象，另一部是韻象的。總之，中國當那時候，文字已備，後來稍為增改，便是現在中國文字的標準。同時農工商業已在發達，人口也臻增加了。

在紀元前第三世紀的當兒，中國國內的諸侯國，互相獨立的諸侯國，已併合而成一個大的帝國了。在漢朝時代（紀元前二〇六至紀元後二一四年）全國已告統一，北，東，南邊界擴張。貿易之道已過中亞，南與印度交通已達，希臘文明也由接觸而至溝通了。

中國文化啓發於亞洲大陸，因為地理上的關係，自然對日本是有所影響的。漢朝的諸侯，當時已有統馭高麗的一部分。他們由中國所介紹到高麗的文化，便使大和國家起了一種新的感覺。漢朝開始而後幾百年中，日本派遣大使到中國朝廷。自此，中國文化就為半開化的日本人所採納。孔子哲學深為日本皇廷所樂道。在許多年代，高麗與中國的工人商人陸續的及大幫的到日本去，在那裏發展他們的市場，謀他們的市利。而時低級文化的日本人對這班外

來的工商人，也示好意并惠光顧。這麼一來，中國文化就如後來的西洋文化一樣的為日本人所模倣與採納，盡他們最高的能力去模倣與採納。

中日通商後，在好幾個世紀當中，日本文化已在中國文化影響之下而作遲緩的發展了。後經許多事件發生，需時僅數載，而日本島國裏面就起轉變。中國的種族呢，當時已是繁衍的；可是中國在許多個世紀中都是全國分成了許多侯國，互相并立，各自為政的。後來因為全國統一，跟着又是高度的發展，而美術、文學之興旺，尤深影響於東亞諸國。要之，中國在文化上貢獻於日本者至夥，介紹佛教更為顯著。

參考書：Griffs, *The Mikado's Empire*; Chamberlain's translation of the

Kojiki; Aston's translation of the *Nihongi*; Aston, *Shinto*; Brinkley,

*Japan, Its History, Arts, and Literature*; Brinkley,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sakawa, *The Early Institutional Life of Japan*;

Longford, *The Story of Old Japan*; Longford, *The Story of Korea*.



## 第二章 從五五二年佛教的傳入至一一九二年幕府的組織

### 佛教的起原發展及其傳播

佛教在紀元前第六世紀起原於印度的北部。它的起原是一種改革運動，又是對於當時宗教制度而生的一種反動。佛教的開創者佛陀是個貴族子弟。他經多年的內心衝突，纔尋了個「悟解」，而要把他個人所悟解的祕密傳知於世。在當時的諸種思想中，他就感到人生是痛苦的。人生不能避免「貧」、「苦」、「病」、「死」，即不能避免痛苦。他以爲「苦」是由於人慾而生的。要免除痛苦，當去人慾。人能達到完全卻除慾望的階段，而這一個階段就叫做「涅槃」(Nirvana)。達到「涅槃」而一切痛苦便可絕斷。要求戰勝人慾，當并用多種方法。而在這多種方法中最重要者有三：(一)生活的沈默(meditation)；(二)絕慾(renun-

ciation) (三) 爲公勞務 (unselfish service)。人類的物質世界是暫時的，要在這暫時的世界上去求快樂，求佳好是一種錯誤。我們在這物質的世界中應該力求的是「自我解放。」照佛陀的教說，以爲如果宇宙間真有神靈的存在，則所謂神靈者應是變遷的，終會過去的。人類最好是不要去理會他。因爲人能以自己的力量尋求「超度」 (salvation)，不須神靈的幫助。可是佛陀逝世之後，他的教說已經了若干的改變，已受後來的思想、習慣的影響而改變。至與本來的教義精神有所懸殊了。現在的佛教已改變而至屬於衆神教的一派了。佛教傳播於印度的南北；可是在傳播中無論某一個時代某一種人民當他們接受這種教旨的時候都加以若干的改變。所以佛教在印度就有南北兩派的不同。北派叫做「大乘」 (Mahayana, the Great Vehicle)。印度之西北部的人民大抵屬於這一派。我們知道印度的西北部在美術的發展上頗受波斯、希臘的影響。他們於設童身牧師上，教儀上以及教旨上有類似東方和羅馬天主教 (Eastern and Roman Catholic Christianity) 的地方甚多。這是一件令人稀奇的事情。後來，學者曾經從歷史方面研究基督教與佛教間的互相關係，證明他們類

似的地方，是因爲基督教最初的幾百年中已與佛教發生接觸了。印度與羅馬通商極早。爲了此中的關係，廣傳的摩尼教（Manichaeism）就是基督教、波斯教、佛教三者的教義綜合而成的。至於景教（Nestorianism）的傳教師早期也已現跡亞洲中部，基督教與佛教間的關係，可以想見了。如要問此兩教於互相影響上誰多誰少，非我們現在可能斷定的。佛教在印度之南者爲南派，也叫做「小乘」（Hinayana, the Lesser Vehicle）。這派與佛陀的教義雖有遠離而趨複雜；然而其差離的程度，尙不如北派之甚。

我們在此應特加申說的是「大乘」派。這派的信仰，已發展成功一種深邃的哲學了。牠的教儀雖有粗淺的部分用以傳播於羣衆的。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說牠是諸多迷信的集成。牠的教義已引許多誠心而敏思的人們的注意了。注意於這種教義的人們，亦已在他們注意中得着智慧上的滿足，及精神上的進步了。這種教義已成有力的信仰，且這種信仰不惟可以傳布於普通人民，卽至深學之士也有景仰這一教派而畢生爲之努力的了。

在基督後，不久佛教的北派，就隨漢朝在中亞所開的商道傳入中國。再經幾個世紀之後，

佛教的南派也繼傳入中國助長北派的勢力。這樣，佛教在中國極盛一時而居漢代三大信仰之一。

到了第三世紀的開始，漢朝崩覆，中國統一破裂。在那內亂起伏的期間，中國人自然無意擴張他們的影響到外國去。可是經過一二百年之後，中國裏面有些侯國已形強大，而有向外擴張其影響的能力了。所以，佛教徒就於那時取道到高麗去。時至第六世紀的中葉與第七世紀的開始，中國統一復有可望。曇花一現的隋朝（五八九年至六一九年）過了之後，繼以唐朝（六二〇年至九〇七年）這一個朝代是中國最強盛的時期，全國統一，領土擴張超過向有的邊界，商業繁旺，美術文學宗教隨而發達靡然可觀。中國的唐代在當時確是世界最大而又最繁盛的了。中亞各國都有派遣公使到唐都西安去。商人雲集，甚至有遠從羅馬帝國而來者。景教摩教的布道師也在那裏作傳教上的競爭。他們與佛陀的信徒有時也并不是互相仇視的。可是從漢至唐這幾百年當中佛教之盛，已至登峯造頂了。當時中國人也許是樂為佛教宣傳的。佛教與中國文化一起傳至國外，並非無故呢。同時，日本人對這高級的中國文化自然

的由景慕而模仿，復由模仿而至改進了。說至此，我們應當記得從十九世紀以來的中日兩國無時不是渴望改革的。這都是因為與西人接觸的緣故。基督教的傳教師，商人以及外交官等既已不斷的接踵而來，且他們中又以傳教師為比較的博愛，比較的有勇敢，在早期東西文化溝通上傳教師當算是重要的工具。

佛教於第六世紀下半期傳入高麗，當時那裏最少有幾個侯國是接受佛教的。依地理來說，高麗南部與日本靠近，佛教既已傳入高麗，則由高麗而傳入日本只僅是時間上的問題。五二二年一位佛教僧直從中國東渡日本。這位僧到日本後，曾有發生若干影響。到了五四五年及五五二年高麗國王在邦交上對日本表示親善。曾贈與大和天皇以許多佛像及聖書，並勸採納佛教。當時大和國家因為有一個保守朋黨的反對，採納佛教就難如願。可是恰巧出一位有勢力的蘇我氏，對佛教大示歡迎。氏同一班熱心佛教的人們強硬地不顧羣衆的反對，建立廟宇。雖經羣衆騷鬧，甚至戰事接起反對這種新教。然而終為蘇我所壓服。蘇我既操勝利，其所主張就得實現，佛教的採納就至無甚問題。加以蘇我主張得了聖德太子的贊同，事更有濟。

聖德太子當時是民衆的泰斗。同時他又受業於由大陸過來的佛僧。因爲太子態度的影響，皇廷也就表示接受佛教。這麼一來，廟宇建築，道院設立，男女貴族中實行遁世，默念道院者大不乏人。後來有好幾位女皇在她們各個朝代對於佛教在日本的傳播，無不贊助。她們的熱忱影響於佛教的勢力是值得注意的。

### 日本受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影響

無論何種信仰，若果得了上流階級的贊許，則隨該信仰而來的文化，必爲大衆所歡迎。一個民族雖有其民族自豪的心理，甚至如十九世紀民族自豪的心理；然而他們必不願矇然人後而不去採取他人之長的。當中國文化被日本人認爲優級的之後，日本人就虛心的去採納，依他們的需要而採納。中國唐代既然是東亞最隆盛而又文物靡然的大國，日本當時對於中國的文物制度，無不匆忙地去採納。到了六六七年中國征服高麗，中國文化就輸入高麗，而靠近日本的邊戶了。於此，傳教師，商賈，工匠以及學者就從高麗，中國而到日本羣島去。同時日

本人亦到唐都西安來。他們中有些是日本政府派遣到那裏留學的。他們無不醉心於中國的財富和繁華。他們派遣到中國的公使歸日本來，都是傳說唐代的盛名。

日本起初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有的革新，僅限於國都及其附近一帶可以見到。至於離國都較遠的農村社會的改革，逾恆遲緩，如十九世紀農村改革一樣，遲緩。可是日本當時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整個的，而非局部的。換言之，日本全國無論在那一方面的生活，都受中國的影響。所以，佛教的流行及廟宇的建築是自然的了。日本人民中不分貧富，對於童身佛僧無不表示敬仰，而龐大的道院社會就此成立。結果是佛教倫理的講說，仁慈的重視，及轉生 (reincarnation) 概念的接受；惟其接受之程度不如印度人那樣充分吧了。佛教在日本起初最有勢力的是南派（小乘派）。後來最重要的卻是北派（大乘派）。在廟宇中莊嚴堂皇的教儀，已經介紹及曾給日本人以一種深刻的印象了。直至現在日本人在教儀方面，除了這些與他們本來的教儀有關係而又屬簡單者外，實別無所知的。

日本人原來的教儀，實際上未曾屏棄過。這一點我們下面當再說及。我們相信日本人原

來的教儀已與新來的宗教融合一起了。試以神道教來說，已經有所增補了。然在輕微的程度之下又受了中國方面的影響有所改訂。例如日本人的敬怕死者就是受了中國人崇拜祖宗觀念的影響。

中國文字與文學概受日本人歡迎的。中國文字日本人常用者僅限於較狹小的範圍。現在，日本人雖則更加擴大的研究中國文字；可是多年研究，結果不特普通人民不用及，就至上流人士若遠離國都的人們也是用不着的。他們要採納中國文字去適應日本的需要，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因為實際上，中日兩國的言語是顯然全不關係的。一是多綴音，一是單綴音。此點既不相同，而文法構造又各懸殊。我們知道中國文字僅有形象，意象，及韻象三者而沒有字母的。例如「人」或「亻」字原來就是包含人有兩腿的意思；「手」或「扌」字起初形如「扌」，謂手有五指，形似五指就是「手」字；「亻」「二」兩字合而成「仁」字，意思就是說二人之間或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義務。中國文字中最多的是韻象。例如「孚」字讀如韻含有孵蛋的意思；若其左邊加以「亻」字，就成了一個「俘」字，讀音雖與孚同，而其



意思則有如戰僑。又若「孚」字之上冠以「廿」字則成「葦」字，讀音仍與孚同，意思則指一種水草的內皮。諸如此類的例子是極多的。日本人要採用中國文字去適應日本人的需要，我以為有兩個方法可用。第一個是用音，這就是說一個日本字可以從幾個中國字合併產生出來。這一個辦法只取用中國字的音，而不理會牠的意義。例如「山」字日本字爲「ヤマ」「ヤマ」。這個字可以「耶馬」這兩個字來替代。這個辦法有兩缺點：一是因爲只能取用中國字的音，而中國字的意趣卻不是日語的意趣；二是有些日本字母的音，未必於中國字中有與類似的音。至於第二個方法則把與日本字同義的中國字來替代日本字。這麼一來，則中國文字便可搬納於日本文以充實用。如「ヤマ」一字中國文爲「山」，在讀音上我們依照中國音或日本音都可聽便。例如著名的富士山我們可用中國字音照中國的寫法，同時又可寫爲「富士耶馬」。以中國字來代日本音的寫法。上述兩種採用中國字的方法，從前曾經兩者並用；可是結果逾恆混亂。後來纔逐漸趨用第二個方法，就是用中國字來替代日本字義的辦法。這個辦法既然可用中國字音，又可以中國字來替代日本字音。這樣的實行起來，日本文中不惟增加

了許多新字，同時又增加了許多新的意趣呢。總而言之，中國文與日本文的關係很像拉丁文與英文的關係了。然而日本人採用中國文字並不是一樁易事。因為這二種文字在起原上已就互不相關的。所以，我們也許可以說如要用中國字來寫日本文，即不異以中國字來寫英文的同樣困難。

介紹中國文字就可得到中國富麗的文學，哲學，歷史，詩，宇宙學以及科學等。這些都是中國數千年累積下來的成績。中國文中不惟有孔孟及老子等的述著，且漢唐兩代學者輩出，作品宏富。均可取用和賞識。總括來說，中國的文學是在在大可與上古希臘，羅馬所沿積於北歐的文學並駕齊驅的。在中國那種光輝燦爛的文學影響之下，而日本的文學纔告開始。關於這一類早期的神話及故事在日本均有記載。這項材料我們可從古事記與日本記二書見之。

中國的文字文學介紹入日本的時候，中國藝術也在一起地舶進日本。中國的雕漆學在漢唐兩代已發達至登峯造極的了。我們知道當佛敎傳入中國的時候，一種高深的表像學 (iconography) 跟而傳入中國。這種「字」都併合印度，希臘及中亞的各自的優點而成的。後

來對這種舶來的表像學實際引起了中國人的天才去研究它。結果就產生了一種專能代表情感的及能透察的最上級的中國肖像學。現在世界各國愛好美術的人對於古昔遺留下的一些零碎的作品，還是贊賞不置的。日本人經看見了這些作品之後，也發激了他們潛伏着的天才，開始作許多佛陀的畫像以及各神聖的插話。同時在國外方面又有許多佛教的彫刻輸入日本。就以建築方面來說，古昔在日本也是著名的。所有佛教的廟宇都是模仿大陸的樣式而建築的。所以這些佛教廟宇的壯麗遠爲神道教所不及。皇廷貴族的高第之建築也是比而遜色的。後來因爲受了這一番的激刺，比較能歷久及壯麗一點的宮庭纔逐漸地建築起來。

日本人的手工藝分明就是從高麗和中國介紹過來的。從這種介紹之後，日本人對於新樣的紡織工具漸能熟用，紡織學上纔有進步，工業上的方法也自能改良。同時中國的醫術及軍事學相接傳入。中國的日曆也正式仿行起來。中國的服裝大受歡迎。不過在衣服上的樣式則另由政府詳加規定吧了。爾時日本在交通方面，道路已開始建築，除陸地交通之外，又有划船爲水上之運輸，爲最重要的運輸。其後船隻製造漸有改良，量衡制度，廣行採用。商業方面因

以長進。日本的鑛業開始頗遲，後因看見國外輸來的寶貴的各樣的金屬，竟引動了日本人去開墾採用他們自己的鑛產。他們開鑛最先所發見的是銀，跟銀而被發見的是銅。有了這些鑛物，他們的幣制便告成功。在第八世紀的初葉，日本真正的貨幣已是第一次的出現了。在中國呢，那時候的貨幣以銅錢爲最多。

當時，高麗人及中國人到日本去的有些是佛教傳道師。他們到日本去一部分是固爲熱心傳教，而另一部分卻是陰懷野心的。除了這些傳教師之外，有些是手藝工人，有些是商人，又有些是學者。這些到日本的商人爲的是要開拓日本的富源，至於學者們是因爲皇廷貴族招請及鼓勵他們到那裏去研究日本的。這樣，結果便是這已混種的日本人的血統再爲這些外來的高麗及中國人混雜起來。

在日本的社會，當時便發生了鉅大的變遷，財富增加，貧富階級之分漸至顯明。農業當時是百業之至要。家庭方面，日本受中國的影響很深。日本人家家庭的鞏固，都是因爲與中國思想接觸而使然的。中國人的家庭生活是尊卑長幼有序的，崇拜祖宗尤其是中國社會的基礎。這

種思想日本人早在準備接納的。中日兩國的家庭制度根本不是兩樣的。不過日本人的家庭受中國思想之響影而鞏固與改變他們家庭的趨勢吧了。我們知道中國人的倫理觀念是他們家庭制度的結果。而這種觀念的影響便是日本道德標準的變遷。

### 日本因與中國及亞洲大陸其他國家接觸影響於政治上的變遷

古昔日本國家中特別著名的是「改革」。我們上面已經說過聖德太子對於新來的宗教是極力主張接納的，同時對於新的文化也同樣的表示歡迎。他不獨是一位佛教徒，而且對於中國歷史的典籍以及儒家學派的著述，也無不愛讀。他又是一位最聰明而最讚美中國唐代政治組織的一位政治家。一部分因他個人創議的緣故，日本政府的改組纔得完全實現。當六〇四年他頒布一道十七條的憲章，這就叫做日本最先的成文法典。這雖不得說是出於精心的一種法典，牠沒有枚舉諸種個別的罪名及說明各種犯法的懲罰。自然這是牠的缺點；然而牠是把佛教與孔教倫理的原則作普通的適用至政府生活上去的。換句話說，牠是一宗關

於道德上的規言，用以指訓政府官員執行職務的。聖德太子同時要使政府官員信仰佛教，忠心天皇，就不得不鼓勵他們使其修養有高尙的德性。能如此，則他們必有遵正義與完整的去盡其勞務。當六四五年（一）聖德太子逝世之後，日本國家整個的改革，纔見實現。而且實得能滿人意呢。所以，這一個時期可以說是日本政府真正實現改革的時期。後來許多附加而有的改革在好幾位天皇之下，相接實現。例如七〇一年所頒布的修正法典（二）關於官吏各面的生活均無不涉及的。

（一）在孝德天皇時代（六四五—六五四）所謂「大化改革」即在這個時期中。

（二）文武天皇六九七年—七〇七年之大寶令。

在這許多年日本政府的改革，都無非是要採行中國政府制度的。他們所取的步驟，雖屬急進；可是事實上他們所希圖的並非完全成功。我們知道中國當那時候已是一個龐大的農業，工業和商業的國家。同時在政治的組織方面又有絕對專制的君主統轄全國，輔君主而行國政的官員又是以競爭考試的方法慎重登選的賢能之士。這種政府的存在，於原則上是為

民謀利的。凡歸於利民的事情都爲政府所樂道。在日本方面呢，她的人民既是農業化的，軍事化的，他們的國家又狹小又是由許多個部落聚合而成的，每一個部落在其所在地都有一個會長統轄一切。而這許多的地方會長之上雖有一個世襲的治首，神人後裕的治首；可是諸會長對於這一個治首只是名義上如此公認的。在這樣一個環境當中，他們由希圖而終成就地產生了一種新的政治組織，由這種政治組織發展而至完全適應於各種的需要。當時日本會作永久的定都於大和的柰良。打算必不與疇昔那樣的每一天皇崩，遷一次都的辦法。柰良相傳是仿中國唐代的西安府而建築的。從七〇九年起柰良便是皇宮所在之地，直至七八四年遷都西京爲止。(一)西京從定爲國都之後，就以中國的國都爲模型居然建築起較大的國都起來。從七八四年直至十九世紀西京始成爲天皇的家園了。

(一)日本從七〇九年至七八四年世稱爲「柰良時期」及從七九四年遷都東京至一一五九年世稱平安時期。

一個國都若果永久的定在某一地方，則跟而來的必有許多的變遷，足以改變全國行政

上的變遷。在這許多改革中，我們找出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日本天皇權力的增大。天皇的地位本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經了這許多改革之後，更使他加威不少，更使他成了一切權力的來源。日本的採納中國制度，事實上好像已經在那些有才智的大臣及首相之下作審慎的與有計劃的去仿中國的辦法，鞏固天皇的權力，用以抵抗貴族，用以取消天皇以外的一切可能取消的官位世襲的成例。我們知道中國在昔的天子曾經戰勝過許多地方世襲的諸侯的。在日本呢，對於皇權增大的先例，我們可於聖德太子的憲章中見證。此外還足爲此例證的就是蘇我一家的傾覆。蘇我一家的權力是極大的，是六四五年改革政策的一部分的，是多世左右皇廷的；可是結果終不免於廢逐，不七十年之久竟由廢逐而至歸於消滅。

我們在這裏應該附說的就是中國王位承繼的原則，日本未敢採納過的。古昔的中國，皇帝在位是受天之命的，是民意所歸的。倘皇室失德，有背民望，則可收回天命而以另有賢德的人爲君主。在中國，人民起義廢除暴君是正當的。所以中國的王朝是改姓換號的，而非永爲一家世襲在位的。王位固屬神聖不可侵犯，而暴虐之主卻可廢除。這種思想是難爲日本人所歡



迎的。實言之，日本政治上的改良家始終對於皇室是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室是天神最正統的後裕。所以，日本人視興師反叛皇室是大逆不恭的。皇朝的易換是絕不容許的。

文武官員在職分上當時已截然劃分，不復如古昔部落時代那樣的混然積在一起了。這種文武分治的制度是採自中國來的。至於文官的選登，一部分固着眼於貴族；然而另一部分是經過考試而定的。所考試的科目大都以通孔門之學爲標準。行政能力的試驗也同中國一樣的基於能寫流暢及高深的漢文。這麼一來，預備應考登官的學校在國都及各省均有設立。當時在政府的組織方面仿中國唐代在西安的制度設一中央內閣，裏分八部。他們所頒立的法典都是取法中國的。他們頒布法典的目的在求全國尊卑上下均得着正義。雖然還有那些舊時的貴族依然持在；可是舊時的社會階級廢除，而新的階級制度採行。全體臣民不論階級，同樣的爲天皇所支配，同樣的有須遵守天皇所頒布的法律，有須聽判於天皇的裁判所。

日本起初的徵兵制度，也是在中國影響之下而介紹過來的。每次在役的軍人，實占有全數壯年臣民從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之多。

關於土地方面則由天皇去使用及分配。日本前此的土地多半是爲少數地主所獨佔，所以大多數的農民，就自然的爲情形所迫而陷於農奴的地位。這些大地主既擁有廣大的土地，就有甚至足以威嚇天皇的情勢。自從土地收爲國有之後，上述情形纔見改變，土地復行分配，無論男女均各有份。他們爲要防杜今後土地集中於少數地主所有，爲自由地使人口增加起見，確定一個辦法，就是每六年將全國農田重行分配一次。如職屬官吏的，則可由政府分派若干畝土地，以該土地所得之收入爲該官吏之薪俸。他無論如何不得別有強索農民，私取非分之財。強迫勞力也有法定的辦法，就是凡農民如不能付納田稅時，可以他的勞力的代價免去他所應付納稅額的一部分。當時因爲日本地面還有多大屬於荒蕪的。政府爲獎勵人民廣事開墾起見，設有一定的酬金，及在人民所已開墾的土地賜與他們以較大的私有權。這都是一種發展土地所取的辦法。在租稅制度方面雖則政府官吏多半是免稅的；可是政府對於人民付納的稅都是設法能使其有公平的及合正義的分擔於人民。

日本全體的人民好像仿中國制度似的分每五家爲一小組，每五十家爲一大組。這種分

法，目的在互相警衛。他們更十足的仿效中國制度，無論那一組內的人員對於各組員的行爲，都是彼此互相負責的。同時他們又採仿中國的刑法，略加修改分別採行，所以遲百餘年後，而這種刑法在日本就爲裁判案件的標準了。

我們應該記着，這些在行政上的革新，這些因與中國文化接觸而發生的改革，並不是這樣簡略的述說而可包含盡意的。我們上面所述的改革在各種法典中略可見到。要之，這些改革所包括的時期有第七世紀的大部分及第八世紀的全部。我們很可以說從第六世紀的中葉而至第八世紀的末葉的日本史簡直是受中國的影響，而改變他們民族生活的記錄。第八世紀以後直至十九世紀歐人東來，這一個時期中，日本受中國之影響雖不如七、八世紀那樣重要；然而每一支發現於中國的文化，其影響必及日本，必使日本人對牠的發現，而有所感覺。從八世紀結束而後，唐代光輝燦爛的文化便趨暗淡，而中國文化影響於國外者，也就有江河日下，大不如前的景況了。

### 日本對於國外文化的接受與變用

日本人不是對於國外文化一味盲目採納的。在十九世紀他們固極歡迎西洋文化；然而他們所歡迎而採納的只是能適應於日本實際的需要的文化。他們的感覺性是最敏銳的。他們很厭惡「野蠻」，所以一與文化先進的人民接觸，就無不廣事努力的去求他們自己的改革，使能與所接觸的先進國民在文化上站在同等地位。他們最先對於國外舶來而合適於日本特殊環境的文化，能適應於所已接納的文化；可是後來就逐漸的把所已接受的文化，加以改變使成爲他們自己的文化。日本人在很久以前已經開始着想他們自己的宗教了。第八世紀的末葉與第九世紀的初葉，天台與真言兩教派興起。他們的信仰都是從中國介紹來的，不過加以改訂便成了日本化的信仰吧了。天台宗對於當時所流行的佛教，又加以改良。他們介紹入日本的幾乎都是能稱完全的哲學和較爲濃厚一點的遁世主義 (asceticism) 附加於佛教裏去。他們以爲人們要求超脫罪惡，自我救拔是可能的；然而並不是要經過長期若干次數的化身。換言之，就是人人可以憑他的智慧達到了解佛陀的造化觀，能如此，而罪惡的超脫與自我的救拔便有可望。這是天台宗對於佛教的解說。當時又有所謂「教會政治」者，這是

最澄（後人號爲傳教太子）創設的。最澄生於七六七年，死於八二二年。他在中國研究宗教多年，東歸日本後，遂聲譽大著。此外，真言宗又從國外介紹一種「信行神祕法」(esoteric system of faith and conduct)，教人關於身體、說話和思想的三大密律。據說人們若果懂得這三種祕法而能作適當的體勢、魔術去祈禱者，可以通鬼神。這種說法與西方古昔的「僞知論」(Gnosticism)極相像。從歷史方面說來，這種神祕法術是苦界創始的。後世所知道的「弘法大師」就是這位先生的別號。苦氏與最澄是同時的人，他也遊歷過中國。他所創的法術就是當他居留中國時候研究所得的結果。後來他歸故國，就以所創的傳示於世。苦氏在他的時候不僅是被衆尊稱的聖人、藝術家，同時他又是一個著名的書法家。

日本人因採用字母註音的方法，所以，他們在取用中國文字上就逾恆便當。他們對於正體（片假名文字）與草體（平假名文字）字的並用，尤能使他們易於學習，同時又能幫助他們的文字。這樣註音辦法即至未曾涉略過報紙的日本人，若果是懂得字母的也能識字了。日本人關於美術文學學校的發展，甚至行政機關的制度也是經過選納的，不是徒然盲目地

從外國搬進過來的。可是有一點我們在這裏應該注意的，就是當日本行政上採行新的制度，尚未全告成功的時候，已開始發生了新的行政制度與實際情形有不和諧的顯露了。這一部分是因爲日本仿行中國制度的步驟還未完全的緣故吧。總之，我們要採取某一個地方的制度搬至絕對不同的地方去實行，倘不特別審慎則少有不發毛病的。所以日本仿行新制之後，就有三個顯著的結果：（一）藤原貴族以攝政的方式左右皇室；（二）封建制度的興起；及（三）武人階級數目上的增加與權勢上的膨脹，支配政府達於極點。

### 藤原一家的盛衰

藤原一家在權勢上僅有亞於天皇，這是日本人所公認的。藤原自誇謂他的家族係自神來。從第七世紀的早期起，一切政權盡旁落於藤原一家之手。藤原一家的先創者是一位才智過人的鎌足氏。他自參加六四五年的改革之後，其功績的偉大早已昭示於國人了。我們知道經過了行政大改革時期的幾位強有力的天皇之後，接而登位的天皇都是幼弱無能的。於此，

藤原一家就漸起而謀他們在政府中地位的鞏固。在軍事方面，他們的勢力本不重要；可是文官要職多是他們一家的特有財產。譬如各省的省長與皇廷要職都逃不出藤氏一家的。中國選登行政官吏的方法，日本政府那時未曾完全採行過，就六四五年改革而後的官吏一部分也是由貴族中選任的。甚至已採行的中國式的制度漸趨廢除，杜防壟斷官職的短任制也漸摒棄。他們壟斷官職是有步驟的。由較長的任期而至連任，有時許多官職竟改爲終身任期，復由終身任期進爲世襲官職。舉凡行政官吏均由藤原一家親屬分配登任。任期是終身的，是世襲的。所以從前用以減消貴族權力與鞏固天皇地位的方法，現則轉過頭來用同樣的方法去鞏固貴族地位與減消天皇的權力了。藤原有如樞密院顧問一樣的可先拆閱人民對於天皇的請願書，尤有進者，天皇的后配是藤家女兒，繼位的天皇是藤家的外孫，甚至現在的皇后也是與過去千餘年她的先輩一樣的多係藤家之女。在這種關係中，歷代被委爲攝政的（一）都是藤家的人。所以藤家實際上是日本的治首了。誠然，藤家固未曾篡奪皇位，固未嘗不提高皇位的尊嚴；可是皇位既然益尊嚴，既益神聖，而在位的天皇自然少有涉及實際的政務了。每當

天皇長大預行登極的時候，必被迫向佛僧發誓退居道院。這麼一來，孤弱無能的天皇安足爲藤氏發揮野心之阻力？這樣被迫而退的天皇竟有同一時代而數見者。

(一)日語稱爲「關白」

藤氏的專權，在天皇方面並不是歷無抵抗的。例如桓武天皇（七八二年——八〇五年）之所以從奈良遷都於西京（七九四年）者即一表示。桓武是歷來天皇中一位最有能幹的。他的遷都，顯然是要洗去朝廷侈奢的習尚和皇族萎弱的風氣。他以爲西京是一個古城，而又位近全國之中央，遷都那裏一可以使他們對於古城的認識；二可以在國政上作有力的支配。他如白河天皇也有同樣的表示不滿於藤氏的專政。他雖退居道院中，卻自己設立了一個傀儡機關來從中指揮國政。(二)因爲藤氏過於專橫之故，其他貴族有時也見蠢蠢欲動的要起而推倒藤氏，僭奪政權。

(二)此外尚有醍醐天皇（八九八年—九三〇年）及三條天皇（一〇一二年—一〇一七年）均不安於藤氏的



鎌足（藤原）逝世之後，他的後裕並不失掉他們向所取得的官位。皇廷的要職依然爲他們所壟斷，直至十九世紀舊制度的廢除爲止。藤原一家勢力的下傾爲的是他們所採行的制度簡直是武人階級的政府制度，他們所握的軍權僅限於附近皇廷一帶。所以各省的軍力藤家一無所有。結果在政治上就漸起變化。這一部分是因爲藤氏自家所採行的制度的缺點，另一部又因爲武人階級勢力的膨脹。我們知道藤氏專政的時代是最侈奢的。在奈良與西京的皇宮的建築既絕天工之巧，宮中生活又極人世之侈奢。皇宮貴族呢，平日只以揮寫詩幅，尋花玩月爲能事，淫佚賭風，耽溺情慾等話都可爲當時皇宮貴族生活的寫照。關於藝術及戲劇方面，在藤原時代略見發展，而且一部分是模仿中國而發展的。日本的美術在十九世紀初期之所以大受西洋人贊賞者都是以藤原時代的美術爲基礎的。精細的紡織產生了。美麗的彫漆也出現了。加以建築改良，皇宮，廟宇均屬峨巍壯觀。音樂方面也臻完善。舞女地位竟提高而成爲一種有尊嚴的專門職業了。佳期盛節，觀花，賞雪，玩月等都是最流行的。爲神廟道院以及宗教的習慣等每年所費的錢，實不勝數。金屬神像的鑄造耗費雖昂，卻爲人民所樂願。國家收

入的半數或多半數都是費用到宗教方面去。朝廷對於宗教益熱心，其他一切益怯弱，道德益見陵夷。佛教在當時的興盛可說是難以復加的了。佛僧權威之特大實無過於當時了。史載竟有佛僧道鏡與女皇通姦之行爲者，真是咄咄怪事！

奢侈淫佚的朝廷與其主人藤氏除了京都周圍的地域外，已漸至失掉其統馭各省的權力了。爲維持皇廷的經費，特別是佛教堂的經費，人民負擔的稅率，逾常繁昂。同時因爲國家領土的擴張，所需要的行政費，隨而增加。可是行政費不息地增加，而國家歲入則依故不變，租稅的增加漸積於少數農人的肩上。握有財產而免除稅付於中央政府的制度逐漸成立。這是與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互相彷彿的。六四五年的改革案不是規定全國可耕種的土地在一定年限重行分配麼？從整個的計劃說來，在實行上曾足差強人意的；然而後來這種制度便告終止了。我們曉得日本古昔的國土是向西北發展的。多半邊疆已開墾的土地，後來都是少數人民的私有，永久的私有。其所以致此者，不是由於中央政府的賜許，就是由於中央政府的弱點呢。國家領土的擴張益大而已開墾的土地亦益廣。有功於朝廷或在朝廷有特別勢力的官吏

得由政府授與地產，此項地產可傳授於子孫。同時佛廟道院也擁有廣大的地產。有時雖屢次上書政府要求依照一定時期重行分配土地，可是政府方面置若罔聞，補救無方，強橫的地主竟張他們的勢燄，霸佔與他們地產接壤的土地。他們對於土地的佔有是永久的一部分或全部豁免稅付的。同時在中央政府中的代表又爲地主所支配。政府對於地產稅付的豁免起初僅是賜許於佛寺道院的一種權利，爲政府約章所認可的權利。後來這種權利竟擴張而至爲各大地主所享有。許多較小的地主爲不欲滋生糾紛及避免稅付起見，都自己把他們的土地讓交到大地主或寺院那裏去，而自己僅願領回一些「封土」。這樣情形正與封建時代的歐洲類似。結果，國家面積竟包含極廣大的免稅土地而爲西京政府法權所不及的。做省長的常見在他法權下的土地僅佔有全省土地之一成或在一成以下者。所以做省長的不須離開省會去執行職務。最後除了附近西京的地主以外，各省多數大小地主對於天皇只是名義上的忠心吧了。他們徵集他們自己的租稅，彼此非難，互相鬭爭，他們簡直是各自爲政的，對於藤氏所支配的皇廷是不聞不問的。降至十一世紀的末葉，中央政府已崩壞了。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統

轄而非屬封領的土地，課稅逾恆繁重，人民不能抵受，只有匪窩和軍營才是避稅之所了。這麼一來，盜賊蜂起，明目張膽，擾害人民，甚至京都街道也有同樣情形。

### 爲統轄全國底封建鬭爭

藤原一家掌握政權雖有了好幾百年之久；然而他們的權勢僅是皇廷以內的權勢。各省的武人勢力之膨脹已有日增不已，北方的武人階級尤爲不可忽視。在第七、八世紀的改革期中，有人曾一度的要成立普遍的對於軍役上之責任；可是終於難行。中央政府的威權既已日趨下傾，秩序之紛亂遂益甚。擁有廣大土地（免稅）的地主，於此即不得不仗賴他們的租戶去保持他們的地權，防免鄰近較強地主的霸佔。這麼一來，地主之下有武士，常戰的武士衛護他的地產。這些武士的成分略有如次：（一）由警察中募招來者，（二）由於地主自家租戶充當者，（三）由於因受經濟逼迫漂泊無家的人們充當者，及（四）由於有勇敢而無事業可爲的人們充當者。這種專職的武士後來漸成爲新起的貴族所統轄。這班貴族與舊時以西

京爲根據地的文官貴族不同，他們是純粹的軍人而又是十足封建式的。他們起初也是皇族的分子，後來爲了些緣因就換取別的姓氏而爲低級的貴族。他們遠離京都而到諸省去當地方官吏與替代長在京都的文官貴族管理地產。久而久之，他們就漸成爲地產的事實上的主人，或新有地產的主人，並連帶的又成爲武人的領袖，當時唯一能維持治安的武人的領袖。當時最重要的地產是在西方，因爲那裏有新開墾的土地。北方則因爲驅逐蝦夷人久與作戰。同時這些武人貴族既遠離奢侈喪德的朝廷，事實上又因爲他們自己裏面常有鬪爭，與蝦夷人也常有鬪爭。在這樣狀態之下，武士階級就進展起來。他們爲了環境的關係已慣於歷受困苦艱難了。已慣於忠心領袖了。可是他們對於在京都領導政務的皇族貴胄是很少注意及的。後來這些武士遂漸成爲世襲階級，外人是不得而染指的。他們有自家的關於倫理方面的法典，這卽所謂「武士道」是。我們對此容當再說，這裏恕不詳及。

藤原一家支配之下的行政制度既然腐敗不堪，則武人之倒戈與藤原之傾覆，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那時武士領袖之最有威勢者爲平源兩氏。兩氏各自誇稱自己是皇族分子的後

裔，同時又各是久住邊疆而致勝的武人。總而言之，平氏主霸於西南，源氏則稱雄於東北。現在之東京即與其勢力範圍接近。

約在十二世紀的中葉，西京政府的崩解已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了。歷代佛教與神道教徒所熱心捐築的寺院有些也已成爲武装道士和暴徒的寓所了。他們威嚇弱而無能的京都領袖，在那樣飽受痛迫之下，京都當局只有命諸省強有力的武人首領入京維持秩序了。可是朝廷的命令一發，平源兩就歡然不費躊躇地馬上應命。平源入京之後，好鬪作亂的道士就被壓制，接着因爲朝廷巨奸與藤家的敵手引起鬪爭。此即給與平源兩氏進而干預政治的大好機會。最後平源兩氏互爭支配京都與天皇，而至武裝的衝突起來。在歷史上如許悠久而又如許尊嚴的皇族，委實沒有人想及皇權會被僭奪，甚至攝政權也會被僭奪的。藤氏傾覆之後，武人領袖企圖以天皇及皇室貴族牢固的在其支配之下；可是在各個名分上仍主保存，不過於行政方面天皇與皇室貴族是不能有多大的影響吧了。

平源兩氏爲了爭權而針鋒相對，結果長期内戰發生。(一)起初平氏戰操勝算而以西京

爲根據地。平氏領袖清盛（即平清盛）遂一登首相之位，而爲有力的治首。平氏既得政權就殘殺源氏領袖義朝（即源義朝）。同時源氏中凡有不利清盛的概行誅害。源氏分子慘死於平氏之手者甚衆；可是他們是不能一網打盡的。義朝的兩位兒子賴朝、義經及幾位隨同者幸免於難。賴朝、義經兩人是異母的兄弟。賴朝之所以得免於害，可說是因爲他是一位美貌的少年。惜他童年所過的是一種流犯的暗淡的生活。至於義經的母親情尤可憐。她爲了救護三位兒子的生命，竟以身許與清盛爲妾。她的三位兒子是在道院中生長的。其中兩位的後來所遇不關重要，我們可沒有述說之必要；然而義經的名字我們是應該記着的。在日本人目中他是一位最偉大的將才。清盛打敗他的敵人之後，就實現他的獨裁政治。當時他真是驕氣逼人，炙手可熱的了。可是他的政治才幹並不見得如何出類拔萃。他既在紛亂的狀態中奪得政權；卻不能把國家組織鞏固起來，不能平亂安民起來，這未始不是他的一大失敗。清盛卒於一一八〇年。爾時賴朝、義經兩人年已長成，就重舉源氏的幟旗，同時他們的表兄弟義仲又是獨立叛黨的領袖，對賴朝、義經的討伐平氏與以援助。接着竟打了五年戰。源氏兩兄弟所主張的是擁

護前任天皇復位；平氏則力爭保留童皇在位好作他們的傀儡。我們曉得義經是一位聰明絕頂的將才，又是源氏幟旗下的偶像。賴朝呢，是一位機巧而有能幹的組織家。他之所以爲源氏的領袖者，不僅是生而有的權利，同時他個人人格上的影響力也有同樣的重要。平源交戰，結果平氏敗北。戰抗雖稱劇烈；然終不免於被逼退出西京。在附近於今之神戶一帶平氏軍事上之慘敗者尤爲難忘。在連戰連敗中，平氏軍隊向西潰退，復在下關海峽作最後勝敗的決鬪，平氏不幸終至全軍覆沒。清盛的寡妻因不願被虜受辱於敵人，就抱同幼小的天皇一并投海自盡。平氏所部雖有些僥倖漏網的殘餘，卻已逃避於琉球的隱地去了。在這著名的平源交戰期中，所給與於我們的許多英雄的事跡，真是人所樂道的，爲後世青年所慕拜的。平氏最終敗亡之後，義經的聲譽大噪一時。因此便惹起賴朝的疑慮。義經在這樣情形之下對賴朝的信賴已漸失掉了。賴朝是一位狡詭陰險的人，竟以叛逆的罪名加諸義經，要行殺害。義經聞此就預備逃亡，不幸事機漏洩，終至自殺，因不願死於沒煞天良底兄弟手中呢。義經卒後，賴朝的威權益加張大，而至於高而無上的了。



(一) 他們戰爭約有五十年之久始告結束。其包括的時期，即我們所知道的源平時期（一一五九年至一一九九年）

參考書：Griffs, *The Mikado's Empire; the Kojiki and Nihongi*; Lloyd, *The Creed of Half Japan*; Brinkley, *Japan, Its History, Arts and Literature*; Brinkley,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Davis, *Japan from the Age of the Gods to the Fall of Tsingtao*; Asakawa, *The Early Institutional Life of Japan*; Longford, *The Story of Old Japan*.

## 第四章 幕府：從其成立（一一九二年）至德川家康的握政

### 幕府的組織

賴朝從平氏手中奪取得了政權，可是要把這奪得來的政權永爲他的家有，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賴朝的政策是對有權威的佛僧取妥協政策，在久戰期中所奪得貴族的土地也願歸還。他並沒有篡奪皇位的企圖。同時也沒有撤免藤氏貴族官職的意思。他保持西京皇廷，以及皇廷以內的舊有官職。在名義上，國家權力依然握自皇廷。儀節方面，尙求保而不失。我們這裏應加注意的就是賴朝在在都是爲鞏固他個人的勢力。各省的守護以及收稅官（地頭）都是賴朝一人任命，而由天皇批准的。在他以次的武人都是對他忠心悅服的。官吏既多由賴朝任命，後來因爲忠心之故，官吏們都變爲賴朝的附庸。賴朝對於西京政府所任命的地

方官吏不稍更動，而惟蝕奪他們的權力，以求行政上之便捷和效率之增加。課稅方面除屬於宗教者外，一切土地不能免稅。這種以軍事為中心的組織就叫做「幕府」。賴朝自然居幕府的首席受「大元帥」的頭銜了。賴朝個人是幕府的中心。他設幕府於鎌倉。此地與現在的東京相距不遠。他就在那裏別立國都。鎌倉遠離腐敗奢侈的西京。他以為西京是個不祥之地。藤氏、平氏，以及皇廷貴族在那裏均遭惡果。前車可鑑。且該地北近源氏黨羽勢力範圍正得相宜。賴朝移設幕府鎌倉後，日本遂產生了兩種行政制度：一為政治的，一為軍事的。各有各的官吏，各有各的京都。在這兩者中自然武人得佔優勢。將軍在名義上雖須受有文官的牽制；事實則將軍行動儼然有如天皇的代表。這麼一來，日本在第七、八世紀從中國抄襲過來的制度，到了這時僅是虛有其形了。然而無論如何，賴朝在日本歷史上從政治方面來說，是個具有偉大天才的人物。因為日本曾經過了不少次數的盛衰隆替；可是自他握政，設兩立政體稍經紛亂之後，竟能維持下去不大改變而直至十九世紀中葉之後者，已歷有六百五十餘年的長期了。日本在這一時期政權如那分立，而卻能免外侮之患者，事至僥倖。

賴朝之後，他所精心樹立而在實行的制度，因為他的子孫庸碌無能，不能繼而支配維持下去。結果，國家實權遂爲北條一家操縱。北條時政爲北條一家的首領，曾幫助賴朝將軍設立幕府。賴朝逝世後，多謀多詐的北條時政遂同其子謀害賴朝の後裕，或壓服他們使成爲北條一家的傀儡。因此，從表面上看來，將軍的職權還屬賴朝子孫；可是事實則大不然。當時的情形正與藤原時代互相彷彿。換句話說，北條之於將軍無殊藤原之於天皇。高而無上的官位，簡直徒有其名。一切實權均操於北條一家之手。將軍職位起初雖爲賴朝子孫所唯有。後因賴朝的正統子孫絕亡，藤原或皇廷幼年貴冑被任取代。由北條一家的領袖爲攝政，掌握實權。這麼一來，北條竟以酷辣的手段支配天皇與將軍。當北條專權的早年，後鳥羽上皇（一）曾企圖要歸復皇權，取消兩立政府；可是結果終遭慘敗。在位的天皇竟因此而被迫退居道院。北條遂從他的家系中任命一人爲西京軍事的治首。自斯，北條得以隨意支配皇位承繼之權。皇室之受遇如此者，真是前所未有的了。北條氏的專政時期係從一一九九年至一三三三年。

（一）此事發生於一二二一年。

## 北條時代

北條時代的日本，雖遇內亂與武人專政；然而在文化上之進步卻不因而阻梗。當時佛教新派之興起，這就是新有需要的表示，與宗教思想上之創造力的表示。我們要知道佛教的支派是複雜的。其中有一支派的思想從中國傳至日本，受日本人的改變而成爲日本式的教派。降至十二世紀的後半，天台，真言兩宗爲「清土」派所附加。後者的教義是對「阿彌陀」(Amida)有信仰者得救拔。所謂「阿彌陀」者，就是「佛陀的無限之光」，無始而復無終的，是萬物之母的。「清土」派在好多不同的時候，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而化身。他的化身是爲萬民求救拔的。在他的末次現身，他發誓不接受任何宣言而進入佛域。除非如許行作不能使天下萬民均得以救拔。他飽受痛苦之後，終得成功的爲被贖救者開設天堂。凡對「阿彌陀」而有信心的人，均得踏進天堂。

在十三世紀中，宗教方面除原來的之外，尙有三個宗派出現。第一爲信宗，係清土宗的一

種，有時叫做佛教天主派。重視所遵守的儀節。這派不設道院，牠的牧師可以婚娶。所有經文均行譯成土話，教人以得救之方，不在於抽象的哲學的悔改，戒免肉食與繁文儀節，而在於對阿彌陀有單純的信心，懇誠的禱告，清潔與生活之真摯。

第二，禪宗，影響於武人階級者甚鉅。這一宗的起源得賴於一個印度教士。在第六世紀這位印度教士到中國去，企圖在那裏努力於佛教的改革。他主張人類的啓明的得獲，不是從書本，而是僅如佛陀所謂由「默思」中得到。禪宗的教說後來傳至日本就在那裏大大的改變過了一回。凡屬於這一宗的信徒，在思想上應求集中。我們要明瞭真理，依此一宗的主張是應該從一個完全新的方向去觀察世界，同時要漠視於人類生命的交替方面。禪宗所崇尚的是簡樸。同時人類要能自制，而這種自制又要以十足集中的精力爲其後盾纔可。禪宗的思想既是純樸的，嚴於律己的，那末，與舊時那些柔性的教義，並其他講求壯麗的廟宇，親於西京奢侈的皇廷者如天台與真言兩宗與禪宗所主張的，自然適得其反。本宗的思想影響於武人階級者既甚鉅，則跟而影響於封建時代的人民生活者也當不尠。例言之，如繪漆，建築，園藝，交際，禮

法、文學、字法等都足以表示本宗思想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末期的封建時代爲尤甚。

第三，日蓮宗，係以牠的開創者而取名的。日蓮原來是一位極忠實及熱誠的傳道師。在他的時代，宗教、政治均形腐敗。他在這種情形之下，感痛良多。爲救時弊起見，他主創一種單神論（monotheism）。他所信仰以爲永在的是佛陀，不是阿彌陀。在佛教諸經典中，他特別注重一種。對於當時宗教與政治的腐敗情形，力主攻擊。因此，常觸當道之怒，而危其身。他的信徒用以傳教於人民的，是一種神妙而易於博人喝采的方法。可是後來這宗的內部自己發生分裂而成爲無數支派。

經了若干時間之後，鎌倉漸成爲一個奢侈繁華的地方。那裏有建築了巍峨壯觀的廟宇。而時中國的茶葉已輸入日本，廣用於鎌倉了。當時人們飲茶竟當做一種儀式看待，并有道德與美學上的意義。中國的磁器，同時也跟着茶葉輸到日本。日人在仿效中國陶器中，竟能第一次就成功。他們比較更精美的磁器。在彫刻方面也是頗有可觀的，尤其是彫刻在木上的爲最巧妙。日本有些在彫刻上的標本與西洋彫刻相較是有過之無不及的。至於刀劍的製造，實際

上提高了日人的手藝而成爲上流的美術。日本在繪漆學上最著名的有兩派。一派以西京爲中心，對中國舊時的繪漆大家至爲羨慕；可是這一派是十分日本式的。另一派則以鎌倉爲中心，深受大陸漆學所影響，是中國式的。

在歷史上，日本有一個時期是嚴重地飽受外侮與恐嚇的。蒙古族在十三世紀出了好幾位大有能幹的文官將帥。他們克服中國掌握治權。既能統一支配內部，於此就向外發展，蹂躪亞洲中部，西部以及歐洲的東部。到了十三世紀的末葉，居中國的皇位者是蒙古人忽必烈氏。忽氏是一位野心家，他決定計劃要征吞日本，遂於一二七四年舉行第一次出征；可是頗遭不利。七載之後，又復大規模的作第二次東征。而時日本國內正形分裂，恰巧竟因忽必烈的東征而警醒了日本全民族的意識。舉國上下一致共禦外侮。我們知道忽必烈的第二次來征是多年準備的。是集中力量而圖併吞日本的。當時復因日本海賊常有滋擾中國疆土，并逢北條辱死忽氏的驛使，因此大觸忽氏之怒，而東征之志益堅。然而日本人對於滿載軍隊的中國的艦隊，奮勇襲擊，不期狂風暴雨驟然而起，中國艦隊竟在日本港灣慘遭覆沒。這或許是日本史上



最顯著的一樁國家脫險的事情了。因有了這一次的脫險而日本至今尙不失爲一個成功禦敵的遠東文明的國家。

### 足利時代

在北條威勢不振當中，蒙古人的東征失敗，藉此恢復了北條若干的威信。可是鎌倉的奢侈繁榮的生活，卻是他快待失敗的主因。當時威迫天皇謝政幽居，而由一事未經的幼齡的皇太子繼位，自然一切政權旁落於所謂攝政的手中了。這種惡例成立，黑幕重重，弊竇滋生。正在政府失政怨聲最高的時候，後醍醐天皇登極，這位天皇是成年的人。他與先他的天皇不同。他很費氣力的要去恢復皇權，廢止兩立政府。結果竟因此而引起戰爭，北條暫操勝利，後醍醐天皇慘被放逐。可是北條之過度專橫，終於激起武人階級的強大反對。於此，許多握有軍權的人就聯合起來，給天皇以有力的擁護。在擁護天皇中尤其是源氏子孫，足利氏以及新田義貞，楠正成諸位熱心護國久享榮名的人物。天皇得了這麼強有力的幫助，最後幸收勝利。鎌倉失守，

北條專政於此遂告結束。後醍醐天皇是最聰明而又最有能幹的人；然而在政治上他並沒有獨斷的意思。他戰敗北條氏之後，就把戰勝所獲得的一切散給與他的部下。惜因分贓不平，裂痕滋生，足利復乘機起而大立反叛天皇的幟旗。於此戰事發作，新田義貞、楠正成兩氏雖則未經天皇的嘉遇；可是忠君之心始終不變。這一場內爭，竟延長數月之久，中間兩方均有勝敗進退。最後，効忠於皇廷的新、楠兩氏不幸被殺，後醍醐天皇被逼逃出西京。足利於此任憑他的意欲，由皇族子孫中擇一登極（一三三六年）。同時北條自己受任將軍之職。後醍醐天皇對足利這樣專橫大肆攻擊，並宣布足利所選任的天皇有篡位的行爲。這麼一來，皇族中遂分爲兩個對壘。在這種形勢之下，足利氏借其所支配的皇室就設都西京，實際統有全國的大半。別一方面，日本史家認爲正系的後醍醐天皇則借其子孫設都於大和。這兩個互相仇視的皇室，相持了五十餘年的戰爭，秩序混亂異常。加以私人的明爭暗鬪，竟使中央執權礙難續持。後來感於事實上之需要，南北皇廷實行妥協，而由南方皇廷握政。全國以此統一。

南北皇廷統合之後兩百餘年（一三九二—一六〇三）時局尙未太平。原因長期內爭，社

會紛亂已成爲強固的習慣。要使恢復原狀，事非易舉。同時尊氏又不是一個如源賴朝那樣有能幹的組織家。他雖善於克服敵人，然而他所用的不是武力而是仁愛。如以寬廣的土地去幫助他的敵人等。我們知道南北皇廷併合之後，連續因爲南北朝分立時所發生的問題作戰者尙數十載。爲了要抗制南方皇廷起見，足利將軍定都西京。同時鎌倉（幕府的根據地）就成爲多故的中心。他們所爭執的是將軍的承繼權。任將軍的常是人家的傀儡，此點真爲當時兩敵黨所鬪爭的鵠的。因爲這種鬪爭的緣故，武人家系的勢力，日形膨脹。他們各據各地，各自爲政。這種情形，甚至在距離不遠的地方就可見到。在他們鬪爭中，足利氏爲要打敗南黨的緣故，不得不以其統轄的地產，及各該地產的佔有權賜給各系武人，藉購他們的助力。這是源賴朝所未嘗想及的勾當。

日本秩序的紛亂，在當時竟蔓延於國外。日本商人行同海寇的商人散到中國沿海一帶，大肆劫掠，燬燒城鎮，寧波，上海，福州等市無一倖免。一來是因爲要報復蒙古人的侵侮，二來是不得中國官方賜與他們的貿易特權。他們的流寇行爲，毫無懼憚的由中國而伸演至菲律賓，

暹羅、緬甸及印度去。以日本人當時的向外活動看來，好像是一個適於航海的民族。這樣竟在他們二十世紀的商業佳績之前，經過了三百五十年的歲月了。

日本內部的混亂，一部分也是由於佛教武裝僧徒的助長。爲的是佛道院承受熱心佛教的天皇、將軍以及貴族等的捐贈財物，道院漸至積富起來。在社會秩序不寧的期中，他們竟養有幾千武裝健兒。佛教徒的許多住室都有武裝的自衛。同時許多較大的道院竟變成了暴徒的居留所，因此，道院的附近周圍，自然地就造成一種恐怖的景象了。有一個道院甚至能支配西京全城，使該城常陷於恐怖之中。

足利專政奢侈無度，因而無政府的狀態益見利害。足氏設都西京深受舊時皇廷奢侈靡華的惡習所影響。無怪乎，足氏一家也就是這種環境中的不幸者了。他們既然浪費成性，道德自然垂落。結果，苛捐雜稅層至疊來，人民負擔不勝其苦。在武人氏族方面，因爲他們的勢力增大，付給國庫的漸有減縮。所藉以供國家經費的只有附近西京一帶的稅收。國家經費既僅由來於附近西京一帶的人民，則賦稅自然繁重，怨聲四起，羣情憤激，反稅暴動緣此而生，取消債

務，民所熱求。在足利專政的末期，西京因多年內戰，一部分已成廢墟了。加以國庫收入過度不敷所出，皇廷貴族勢迫仰賴封建諸侯的撫卹。甚至天皇也陷於經濟的困厄。有一位天皇竟因為沒有經費，而把加冕禮延擱舉行者。另有一位天皇在窘迫中，藉賣親筆字幅及抄述古籍的撮要以糊口者。還有一位天皇崩後因缺乏治葬費不得已展期出殯者。

足利氏的一位將軍認中國為貢主國。這是後來日本愛國之士最引為不滿的。當時「日本王」的名號也由中國皇帝的賜給。日本的官船到寧波去都被中國政府以進貢物載來船看待。在足利一家好幾位將軍之下，日本與中國通商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官方的獨占。足利氏快意逾恆，因為與中國通商，對日本是有利的。日本與中國通商可以增加了她的歲入。

到了歐人東來日本之後，益使日本陷入於無政府的狀態。葡萄牙人在發見時期中的探險，降至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的早期，已為凡治過西洋史的人所熟識的了。後來許多探險上的史實纔傳至日本去。歐人或許最初知道日本國是由於威尼斯的（Venetian）旅行者馬可波羅（Marco Polo）氏傳說的。氏曾在忽必烈皇廷過了好幾年的光陰，而且又適在蒙古東

征日本的組織期中，氏歸歐時帶了許多說及日島的奇特的故事。這許多故事，竟能引起哥倫布一部分探見的希望。後來哥氏成功地直從西道而至東方來。當一五四二年，伽馬（*Vasco da Gama*）環遊好望角。經五十年而後，葡萄牙人到日本，爲歐人來日看見日本海岸的第一次。他們就在日本南方與琉球的諸口岸營立商業。他們介紹過來有兩件事，一是鎗砲，一是耶教。這都是影響日本後來的文化最深的。

葡萄牙人介紹過來的鎗砲，於日本是新的武器。可是這些武器竟一部分的助長日本封建諸侯的勢力。擴張他們對中央政府的獨立權，鞏固他們的地盤。在戰器上既有了這種新的介紹，則舊時一切用木造成的武器，與以泥土築成的城牆，已不復能用以禦敵了。於此，取而代之的有高大而以石堆築成的城牆。這種城牆現猶存在，真爲旅客一望嘆奇之古蹟。

基督教第一次由一位熱心而又勇敢的耶穌會徒芳濟各氏（*Francis Xavier*）於一五四九年傳入日本。芳氏到日本時伴有好幾位葡萄牙與日本籍的朋友。他在日島約有兩載，而於耶教的傳播已深入腹地而至西京一帶了。他既得有如許的佳績，隨從他的又有耶穌會其

他會徒，且他們對於傳道深具熱誠，曾不多時遂大受日人樂意的回應。從日本人看來，羅馬天主耶教與他們久已信仰的佛教在教儀、教義以及組織上是不大懸殊的。同時，日本如果授受耶教就大可享與西洋通商的利益。打算起來，仍是預備拱手敬受的好。佛教適在當時不能滿足日本人民於宗教上的需求，且該教會於道德、精神方面又極墜落。在這種情形之下，新的信仰就應運而起，且受政府的贊許。當一五八一年，距芳氏抵日本尚不及一百年的光景，而日本耶穌教堂已有三百所，信徒已達十五萬。在傳教最有佳績的時候，有謂日本耶穌教徒人數有達六十萬者，這或有言過其實之處。然而當時耶教之發展確有可觀。日本的封建諸侯會因耶教的事宜，派了兩位專使到羅馬去。一時人們都以爲日本有成爲耶教國家的可能。這種新的信仰輸入日本，事實上增加了許多糾紛。原因是耶教的佈道士持他們偏執的態度，要求耶教諸侯運用武力排擠佛教與神道教。結果，就引起異教的反對，並增加許多爭執。且葡萄牙的耶穌會徒到了日本之後，又有接踵由菲律賓羣島而來的西班牙的多明我會（Dominicans）芳濟會（Franciscans）與奧斯定派（Augustinians）。這些僧徒後來與耶穌會徒大起爭

執，糾紛益甚。

因爲武人領袖的衝突，武裝佛僧的仇視，中央政府的積弱無能，首都無能，首都無政府的狀態，西方鎗砲的介紹，以及諸教派之積不相能。在這種情形之下，那時的日本大有卽行解體之勢。

總而言之，這個時期並不全是黑暗的。第一方面，它不是一個最邪惡最野蠻的時期。雖然內爭頻作，雖然盜賊猖獗，擾害首都與各省，雖然政教各面四分五裂，而文化之進步卻無停頓。甚至在西京偶有安寧的時候，和諧的藝術卽行活現。京都的繁奢固爲人民所詬病，而封建諸侯中有些官邸又極精美。市鎮興起，這一部分是由於與大陸作半盜通商的結果。在宗教方面，佛教的禪宗所創看爲教儀的飲茶，頗爲盛見。藝術化的跳舞也加研究。同時在佛教領導之下，戲劇開始發展。細至花朵的排結，竟爲衆人所講究。園藝一門，日本人已在著名的。因之，人們對此頗多注意。我們知道，日本文化諸多是模仿中國的，園藝自然不能例外。可是日本的模仿中國並不是盲目的。日本對於仿自外國的東西，自己必下一番研究，加以改良，使能精益求精。日



本人愛好簡樸，所以對於天然的美，無不力加保存。日本園藝中有一派，就作如此主張。這麼一來，與精工巧作，重於形表的大陸派的藝術家自相迥異。角力一門後來竟在日本成爲一種專門的職業。日本當時在軍事上既重視如彼，而於刀劍的製造，自然達於美術上的優級。工藝的密術是父傳子受的。有些關於工藝方面的標本是著名而又是價值昂貴的。日本的繪漆並不是全無特點的。繪漆家中著名偉大的，也有人焉。(一)「武士道」是日本武人階級道德上的規律，而這種規律不消說也是細心酌定的。

(一)當時兩大繪漆家是雪舟與元信。他們都是模仿中國宋朝的藝術家。

## 武人支配下的日本

第二方面，日本那時在無政府的狀態中，曾出了好幾位偉大的人物，負起撥亂爲治的擔子。不然則今日的日本是無能爲的。自然，在擾亂的時候，有能的人容易顯露頭角的。王孫貴胄大非前比，武人階級竟起爭得優權。他們的領袖中最著名有豐臣與德川家康兩人。德川家康

掌握政權直至十九世紀的中葉而始告終。

現請先說豐臣吧，他是從多次與其鄰敵戰鬥中起來的。一五六八年他就被天皇之命到西京去恢復治安秩序。他一部分因為得皇室的同情，故一躍而為西京的霸者。可是自他服役於將軍之後，不久竟被革職。他爲着保持地位起見，就與他的敵人作了許多次數的戰爭。他打敗了他的敵人，壓服了武裝的僧徒，燒燬了兩座巍峨壯觀的道院。一座在大坂，另一座在江戶。他對於武裝的僧徒，佛教教義，均極厭惡，所以他歡迎耶穌會徒，使其作廣大的宣傳。在他以爲這種新的信仰，能幫助他推翻較舊的思想。他並沒有正式做過甚麼大官；可是他卻能支配全國，如一個最有勢力的封建諸侯的去支配全國。他與敵人作戰次數頗多，惜一次（一五八二年）於不備中陷入敵計。他遵着自身階級的規風，寧可自殺不爲敵傷。豐臣逝世之後，他的兩位有能幹的舊好秀吉與家康就接着掌握日本的政權。

秀吉是日本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他有日本的拿破崙之稱。他出自平民，身家地位尙不及於武人階級。他六歲失父，幼年處境至爲貧苦。十六歲時跟着一位武人領袖，後來他就由此

著名。過了些時日，他又供職於豐臣部下，以他的智慧能力，進身高位，最後竟成了他主人以下的一位要將。

家康在血統上是源氏的後裕，大有將軍的資格。他的將軍地位的得獲，與其說是端賴他的家庭的關係，毋寧說是端賴他自己的天才。他是日本封建制度期中最後的一位組織家，同時又是日本史上一位最具本領的政治家。他是最勤儉而又富有忍耐性的人物。當他無懼憚地運用其諸種手段，為期達到他個人的目的底時候，他的內心感覺自感覺，策略自策略，從不把他內心的感覺影響到策略上去。他的態度和靄可親，慷慨大度，愛重正義。這是最能感動人的地方。他治事的方略極多，別識力又幾乎全確。

豐臣的兒子庸碌無才，豐氏逝世，其子不能繼保其固有的領袖地位。不久內戰發作，結果秀吉勝利，遂為霸主。家康有一個時期本是秀吉的敵人；可是這時竟能盡去前嫌的與秀吉攜手，做起秀吉的主要參將來。秀吉以其機智與武力克服他的敵黨，甚至遠在琉球的敵黨也被打滅。日本就於此統一的在其管轄之下。他對於人的審斷異常正確。他是一位極智巧的兵法

家，同時又是一位絕對有能幹的行政大家。他雖不能克服他布衣出身的弱點，與早年教育的弱點；可是這對他個人的成功方面是沒有甚麼障礙的。他不是源氏的後裕，不能受將軍的榮銜，故以攝政自命。後來又受「太閤」之職。秀吉就以「太閤」之稱聞名於世。如秀吉者，可說是在日本由布衣之身而登高位的一個顯著的例子了。

秀吉克服全國之後，就從事於個人勢力的鞏固與擴張。起初，他對耶教表示贊許。不久，他以爲耶教在日本會引起內訌，同時又恐怕耶教宣傳會啓西班牙與葡萄牙侵略日本的先路。爲了這個緣故，他對耶教的態度，就由贊許而至反對。可是因爲有別種的關係，他並不嚴行放逐耶教徒。建設方面，他曾作廣大的建築，大坂與西京的口岸，並在西京下定了後來發展的基礎。他的野心極大，管握日本難滿其想。他曾作過向外從事於商業與政治上發展的呆夢。所以，他極鼓勵有勇敢的航海的日本人到澳門、菲律賓、柬埔寨與安南等處去。

在附近高麗一帶，秀吉計劃欲行征服，使成爲征服中國的門戶。他極聰明，以爲要避免國內的封建諸侯與他爲難，最好是發生向外征伐，以轉移他們的視線。所以，一五九二年秀吉就

命他的軍隊出征高麗。在與高麗人戰鬪中，日本人的種種殘暴行爲，徒增高麗人仇視日本的心理。日本的征伐高麗，與中國大有關係。因爲中國宣稱高麗半島是她的藩屬國。別國征服高麗，有危害中國的邊疆。我們知道高麗在幾百年前曾經統一過的，後來漸趨分裂。當日本人侵犯時，於禦抗上已無能爲力了。可是日本的延長的攻擊，所成功者僅有一部分。這因爲人力財力的損失，引起主持此事者無限的焦慮。就開始與中國和議。中間秀吉知道中國皇帝正備要賜授他爲附庸國國王的消息，遂憤而停頓和議。後來這位太閤逝世，日軍撤退歸國。日本在高麗的勢力就大縮減，而至混昧不清的對高麗自稱主國。所謂「主國」僅是自稱而已。日本沒有執行過主國的權力。自此而後，雖則高麗有時曾派遣大使到日本去；可是當時的日本已沒有干與鄰國內政的企圖或能力了。

秀吉在生時曾費了許多苦心，要使他的獨子承繼他的權位。他極審慎的計定一個攝政院，以家康爲院長，與國中最有能幹的人共同組織之。各人都嚴重的誓許要執行秀吉的旨意或委托。可是秀賴尙在童年，自然不能支配那些叛上作亂的封建諸侯了。僅在兩年中，日本就

分裂爲兩派。一派是包括南方諸侯而聽命於秀賴的；另一派是在不守誓的攝政院長家康領導之下的。兩派衝突，雙方軍隊相遇距西京不遠的關之原地方。戰鬥之劇烈，實爲日本歷史所罕有。家康因爲得了敵軍內部反叛的助應，就操勝利而爲全國的霸主。秀賴於此偕他的母親及其親隨人員退居於乃父所建築的大坂堡壘裏頭。表面上降服於家康，這樣過了好幾年的日子，也沒有與家康爲難的事情。他沒有參加家康的封建的組織；然竟娶了家康的女孫爲妻。後來，秀賴長成，他果然是一位智能不凡的男兒。就開始集中一切不滿於家康握政的人，從事籌劃以待時機。家康因此引爲杞慮。乃於一六一五年設故與秀賴爭執，領兵攻擊；可是大坂城壘鞏固，苦攻不下，就行退兵，佯意求和。秀賴竟落其計。最愚不過的就是他的礮台的外部防壘，盡許敵人毀拆，城池也許敵人填平。鞏固的城池既去，家康不顧再行攻擊，餘的堡壘也被內叛軍隊縱火燒燬。秀賴同其母氏竟身死於此難。這場把戲，遂此告終。

參考書：Griffs, *The Mikado's Empire*; Lloyd, *The Creed of Half Japan*;

Brinkley, *Japan, Its History, Arts and Literature*; Brinkley,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Longford, *The Story of Korea*.

## 第五章 幕府：從德川家康的握政（一六〇三年）至培理來

日（一八五三年）

### 家康改組幕府

在秀賴未失政權以前，家康已就企圖要把他所戰獲的一切結合起來，永保爲其家有了。事情真是巧幸，家康而後其子秀貞（一五七九—一六三二年）其孫家光（一六〇三—一六五一年）都是大具才能的人物，相繼握政，正如所願。日本國權在德川一家所支配者竟有二個半世紀之久，在這個時期中全國坦安無事者，也不止有二百年。他們所適用以達到其目的底方法，實有多種。第一，家康自命將軍（一六〇三年），爲源氏於四百餘年前所組織的封建制度中武人階級的首領。他設立其軍部於江戶（卽今之東京），遠離皇廷，在地理上既靠近

本道的中心，江戶之北又是他所得擁護其勢力的由來。那時候的江戶，自然是日本最大的城市了。將軍的官邸，設在江戶堡壘之內，現在的皇宮，就是那時將軍的官邸改變而成的。在江戶周圍的土地，則劃成「封土」封給他的親屬。換詞言之，一切險要的地方都是管在他所親信人的手中。較大的都市也一律是對將軍負責的官員所統轄。同時西京與江戶的交通要道，也無不嚴重的加以守護。家康是善於籌劃的人。他的氏族中的分子均賜以「封土」，而且分配得極備至。同時對於一班於忠心上頗有懷疑的地方諸侯，亦作如此對待。國中重要的位置，不出於德川一家之手。凡屬缺乏忠心於將軍的諸侯，所有的收入，均費用到封建方面上去，特別是費用到城壘的建築上去。

凡屬武人領袖，一概須在江戶設有住宅。他們中每人都要留幾位親屬在江戶居住半年，爲他個人沒有異心的保證。另半年則須各武人領袖親自寓居江戶使受監視。關於此項保證的規例，是可以增加的；可是後來這種方法卻爲德川氏第四位將軍所取消。於此又設有所謂代表省長者多人，散居全國監督各地武人領袖，使受江戶政府的指揮。至於封建諸侯在其



所統轄的區域內，行動至爲自由。普通人民——商賈，農民與市町居民，政府多鼓勵他們實行地方自治，而以同業會，市長老與村長等爲自治機關或首領。一切自治的官員均須負責維持地方秩序，須服從上峯命令，此與足利末年之無政府狀態，及個人主義之過度表現者，適得其反。我們知到紀律與服從是最重要的。日本在十九世紀之所以有如許龐大變遷者，多由於此。

在這龐大的變遷中，日本的帝國制度，並不廢除；然而天皇因爲太過於神聖不可侵犯，於實際上要作有力的干與國政，就感困難。同時因「天皇神原」(divine origin) 的信念的關係，使天皇對於政務的責任，只好棄開。天皇除了與他最親近的大臣及其親屬交接，奉拜皇宗及爲國禱告之外，別無所事。無怪乎，天皇神聖的臉顏是外人遇見不得的。日本的天皇尙是一切權力的來源，將軍不過是天皇名義上的臣僕吧了。國家年給天皇以適足的經費，并許天皇以賜授榮典的權限。舊時的皇室貴族，尙有保持，他們的尊嚴雖則有增無止，而經費的支給已是微薄。且他們不得參加實際行政，幕府的權力也就極大，天皇的重要官員於任命與任期上，究竟就是受了幕府的支配。德川爲要再使皇室減失權力的緣故，就把西京周圍一帶的

「封土」賜給於忠心德川的武人領袖。大坂是西京的要港，由將軍直接所統轄。

日本社會中的各個階級的人民，當時都詳細的審慎的受規律所約束。如皇廷貴族，封建諸侯，武人與平民各階級的行動，服裝及飲食等均嚴格地立有一定的標準。政府監督制已是完密的成立與實行了。因為此中的關係，社會亂象漸至縮減。教育，出版，尤其是中國儒家學說的研究，極力鼓勵。這自然是增進公德私德與維持社會安寧的最善法門。後起相繼的幾位將軍又人同一心的幫助商民，農民爲有利於農商的立法，并利公用事業。他們這樣做，相信俟至國家繁盛起來，社會不安之象就自然會消滅的。

家康主張固結全國，他的後繼者又樂得承其志努力實行。所以，排洩耶教就雷厲風行起來，日本人之與外人交接者幾成禁例。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外來的思想或信仰怎樣由耶穌會徒介紹到日本去，外來的思想信仰怎樣傳布得如許迅速，並怎樣從中發生事端而致爲秀吉所排洩了。可是當時的排教，還是不得充分的實行，故排教開始的幾年中，耶教的傳布，并不因而停頓。外國傳教師也依然不斷的努力他們的布道工作。結果，基督教徒竟增加至六〇〇〇。

○○人。其中尤以九州與其他南方各部爲多。當家康握政的早年，他分明不是反對基督教的。有好幾次他竟表同情於基督教的傳布。他之所以出此者，並沒有宗教的動機參在其間。歸根言之，不過是因爲商業上利益的關係吧。他決心要發展與維持歐洲各國和東亞互商。在許多年中，日本經與墨西哥、西班牙的通商成績頗可。同時荷英兩國商人，也得許可在日本的南部開設工廠。日本商人也因爲將軍之不加反對，就遍到菲律賓、安南、暹羅、中國與印度去。其實家康對於商業的向外發展和國內鑛產的開墾，是樂於致力的。後來他的態度遂漸變遷，晚年的時候竟對基督教表示仇視。降至秀貞與家光握政的時候，情形就更不同了。他們更是仇視基督教的，而尤以家光之態度爲最厲害。家光不特要銷滅基督教在日本的勢力，而且要封鎖門戶，反對外來一切。自然，我們這裏是不能盡舉出他所以採取這種政策的理由的，不過略說幾個最顯著的吧了。日本當時有派了一位專使到歐洲去，這位專使在歐洲所看見的宗教，極多是黑暗的。所以他的報告自然就不利於外教了。同時又有一位英國人名維亞當（Will Adam）者大得家康的敬視。這位英人對於天主教在歷史上的種種不名譽的方面暴揭無遺，於

此，就惹起日本人對於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傳教師的懷疑，以爲他們是政治侵略的先鋒隊。因爲此中的關係，外國教士們對日政府就有懷恨，對將軍的權力就生慢視。竟有要謀殺將軍的案情發覺者。可是在各個宗教裏面的各階級，似乎並沒有傾軋事情的發現。教士們中，特別是耶穌會徒中，各人對於宗教上的尊嚴逾恆重視。總而言之，當時教士們的態度是仇視將軍的，仇視以攬握政權而維持治安的將軍的。可是在日本的外國人互相衝突起來了。在商業上，西班牙人排洩荷人，荷又同樣的排洩英人。到了一六一四年，家康一怒之下便發定命令所有在日本的外國傳教士概逐出境，已成教堂應行燒燬，日本人中既奉信耶教者應即誓棄其信仰。將軍反教的態度逾恆強硬。諸教士中除了有些自動返歸祖國之外，餘均力抗不肯出境。家康一心一意以求統一，維持治安；然而結果天公不從人願，他的高壓政策尙未完全實現，就於一六一六年以身先死。家康逝世後，秀貞與家光繼而握政，堅持反教政策，而且變本加厲；可是事實上，反教固反教，外國教士還是不斷的接踵而來，日人信仰耶教者還是拒絕與耶教脫離關係。他們這種大無畏的反抗，更增了將軍的懼心。這麼一來，德川氏的威信與優權大有掃地

的危險。江戶諸要人當時頗深懷慮，以爲日本的獨立或有不和。政府所放逐的教徒多是因爲政治上的理由。正如羅馬帝國一樣的看法，爲叛逆。政府的手段是很酷辣的，燬拆教堂，并殺害一切拒絕放棄耶教信念的日籍教徒，多以慘酷的方式去殺害日籍教徒。政府這種手段益酷辣而教徒殉難的精神益壯烈。教徒們因爲受壓迫過甚，積怒之下遂於一六三八年（一）集合未死的教徒一致叛變。他們以寡難敵衆之故，就退據於距離長崎不遠的城壘。可是終爲政府軍隊所殺滅殆盡。經此而後，一切教會活動遂至停頓。政府反教命令的嚴行，直至十九世紀。在這樣狀態之下，佛教就應運而起，大得政府之同情，命令全體日本人民均須參加佛教之任何支派。所有一切佛教徒必須在寺院登記。凡有反抗不肯登記者以耶教徒論必處死刑。僅除了一二僻遠而又變相的地方之外，其他外來的一切宗教不能存在。

（一）島原事件。

耶教徒的強烈反抗，因使政府對一切國外貿易大起懷疑。當時日本本來是有意繼續與西班牙、葡萄牙兩國貿易的；可是因爲反教情形日趨嚴重，外國教士繼續由他們的本國商船

來日。江戶政府對此考量之後，就決定與西葡兩國斷絕交通。與前者斷絕於一六二四年，與後者斷絕於一六三八年。一六四〇年葡萄牙人圖謀要與日本恢復通商，無奈他們的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所殺害。日本政府爲了防免外國所謂搗亂勢力的侵入，諭令日本臣民一律不得離開本國。倘有私逃出國者，歸時執得必處死刑。日本政府既採取這種對外絕交的政策，則建造大船要與國外貿易者自然必在禁例。英國人這個時期中在日本沒有工廠，更因那裏市利不好，過了幾年也作罷計歸國。後來雖要復與日本通商卻被拒絕。在歐洲諸國中僅有荷人的商船不在禁例。這是因爲荷人從來就是反對天主教的，同時又不大願意去宣傳他們所信仰的宗教 (Protestant)。他們中竟有助日本政府驅逐日本基督徒者。所以在日本政府心目中他們不是危險的分子；然而他們究竟也是耶教徒，江戶怯膽的官員因此對荷人就難免沒有懷疑。加以荷人來日本通商，吸收日本利源。爲防止此患起見，對荷人也當加以限制。結果僅得許可荷國商船泊停於長崎一地。在那裏荷人須小心翼翼的在一個小島（一）營業。一切宗教儀式不得履行。日本政府對他們的限制越弄越嚴。起初每年可舶來荷船幾隻，後竟減至一隻。荷

人每年僅得登岸一次。每次僅限一人。且登岸後僅可到江戶拜謁將軍，一舉一動均受警察的監視。荷人之所以不惜忍辱與日通商者，是因為圖利的緣故。荷人那時輸入日本的大都是絲與小件商品。以這些東西來換得日本的金、銅，載歸歐洲，高價出賣可圖大利。

(一) 出島。

除了這與荷人通商的特例之外，日本簡直是嚴密的閉關自守，孤處世外，不與西洋接觸了。日本在這種不相往來的生活中，計有二百餘年。在這一個時期偶有由荷人介紹過來些新的思想。同時雖也有中國人在審慎的限制中進行一面的貿易。中國那時也是與日本一樣的主張海禁，不與歐人接觸。這種政策是否有利，還是成一問題。真的，因為這種閉關的政策，使日本失掉了國際競爭的戟刺，雖則或有國勢崩拆的危險。自彼而後的幾個世紀中，日本就入了一個準備的時期。迨至培理來日，乃大警醒而與西洋恢復交通。

德川握政而後，對外無患，對內幾百年來的亂闕告終。然而德川制度本身懷着牠的自毀的種子。我們知道「好爭」是武人封建制度的由來，且也是其目的。牠的一切力量都用到歷

服內亂上去。這裏我們須注意的，就是這種制度的崩壞是不可避免的。牠好像是一個蝸繭，在這個繭的裏頭，日本國家安息着，爲十九世紀的轉變準備着；可是在轉變時的一觸而繭便破。德川握政而後的長期太平，不能算是引導日本跑上轉變的最關鍵的時期了。同時也就是從第七世紀以還，日本國家團結的開始。德川所行的制度，竟令許多好鬪的藩閥杜止內爭，行動一致起來。不錯，封建制度的形式與「封土」是存在着的。國家的統一雖未完全，分裂國家的惡勢力則見減弱了。幕府並沒有預定甚麼廣大的法典；然也曾公佈那些法制，使各臣民都應審慎地去服從，使服從中央政府的法律成爲各臣民的習慣。

當時日本漸至繁盛起來了。治安既無問題，而農工業之求得又易。政府方面力求鼓勵振興農業，經營灌溉，築設河隄。這麼一來，農民土地的享有增加，町村自治，更具佳績。同時道路改良，商業發達。武人領袖也以往日注意於戰爭者，轉而賞識到太平的樂趣了。接着，奢侈風起，衣服，飲食，起居漸至複雜。商人階級也因積富的關係，地位漸至重要了。資本集中了。幣制改良了。有時雖見饑荒的發生，疫症的流行與人口減少等情；然而社會貧窮並不成甚問題。都市間如



與現代的倫敦或紐約比較起來，那簡直沒有狹隘地貧民聚居的恐怖情形。

教育方面已漸普及，文學美術兼程並進。在江戶那裏有許多武人領袖的住宅，有許多壯觀的學校。下至兵士的兒子也幾成爲世界上溫文爾雅的人了。平民演講堂，多處設立。中國的古典作家，並加研究。這是老早爲家康及以後的歷位將軍所最獎勵的。湊巧時適十七世紀的中葉，中國明朝傾覆，滿人未得侵入之候，中國儒生紛赴日本。他們在那裏的確給日本學者於研究中國學術上以不少的興奮。因此，日本學者虔信孔子學說的人爲數激增。在極久以前，日本雖有自命儒家的學者，然其數目之多，未有及於此時。儒家學說也未有如許廣聞。在這烈熱的圍氣當中，演講儒家學說的學者既夥，門戶之分就在所不免。查日本當時儒家中最重要者有兩派。一爲朱熹派，一爲王陽明派。朱氏以爲我們要制定倫理上的法典，應先事研究我們所托身的世界與這世界中所與關係的法則。先要有「知」而後能「行」。王氏（一四七二—一五二九）與朱氏的學說適得其反，他以爲一個人對於倫理法典上的「知」僅係一種發議從內心求出來的。朱氏主「知」，「行」分開，王氏主「知」「行」合一。朱氏深受中國

經典中的超然思想所影響，他漠視宗教的儀式，側重有條不紊的天然秩序。他對孔子生平述作所發表的許多意見，大得中國官方的推重，直至二十世紀朱氏學說在日本正如在中國一樣的受官方的贊同。王氏雖不得邀官方的景仰；然而虔信他的學說的人爲數亦頗不弱。王氏學說向傳於信佛之禪宗者，尤爲有力。日本的上流階級多信孔教，雖則名義上他們仍是佛教徒；可是他們已公開的看佛教爲有涉迷信，僅合於不受教化的羣衆所景仰。

日本政府當時鼓勵學者努力於書籍的搜羅，歷史家也因得官方的贊許，開始作大規模的研究日本國家的過去。繪漆與陶藝新有極大的成功。有色印刷與平民文學亦見同時發展。用供下層階級的歡賞。著名的建築物也在完成，如壯麗的廟宇還用以裝璜在日光的家康的墳場。這就是古昔日本在文化上的佳績了。

由來久遠的武人階級已在崩壞了。不錯，牠的倫理上的法典——武士道，當時正在審慎地編纂而成爲日本空古未有的一種法制。這種法制是對於軍儀及尙武思想加以重視與鼓勵的。每值一次武人賽會，則全國爲之効勞，雖則他們久未致用疆場；然而他們卻能傾動全國。

者，寧非怪事？奢侈有傷德化，自古已然。日本封建武人勢力之所以傾覆者，蓋亦由此。家康的後裕漸見失勢而受制於諸侯了。正如天皇初在藤原接在將軍支配之下一樣的。甚至將軍後來也在許多時候受他們的羣臣所支配。

因爲研究的空間增加了。同時又因爲幕府的鼓勵，便轉人民的思想向過去方面去運用。學者中研究，編纂日本歷史的漸有人在。他們的工作，結果便引起人民復興愛好本國東西的熱忱。日本文字自此就加有人研究，及比較的有組織起來了，與古典艱深的中國文字相反的白話文學，也發達起來了。本土的信仰——神道教到此亦得復活了。因爲神道教的復活，天皇以教主的關係大增其個人的威嚴。佛教雖會認爲日本國教，不過是當時借以排除耶教的吧。這時呢，佛教在一般愛國者的心目中，已是贅瘤的了。因爲它終竟是外來的信仰的緣故。在政治方面，日本史家無不謂天皇是唯一一名正言順的元首，將軍不過是比較近時產生的銜首。於此，一班學者就起而作皇權歸還，將軍退職的呼聲。此中最令人難解的地方，就是努力於這種運動的史家多是德川宗族裏頭分子呢。

這種歸還皇權的運動，復因當時歡迎中國古典文學或儒家學說的影響，更大增其勢力。原來德川氏諸官員鼓吹研究中國文學，和歡迎明末逃亡日本的中國學者的時候，他們簡直昧然不曉得中國儒家學說怎樣會倒他們的台，怎樣有關係於幕府的運命的。中國典籍所重的是皇位，這種思想輸入日本學者的頭腦裏頭，自然的有危及將軍的地位了。因為照中國儒家看來，日本的將軍不過是天皇的一位大臣，以大臣的地位篡奪皇權罷了。

適在日本南方有幾個大藩，他們與德川氏是互相仇視的。德川握政，他們自然不滿。若有機緣必求皇權歸還。倘爲事實可能，他們很願推翻德川將軍的勢力，甚至擁護別人家來取代，也所不惜。

### 十九世紀中的迫切變遷

當十九世紀的中葉，日本已達至改革成熟的時期了。舊時的制度已在崩壞了。德川將軍勢日不振，其權就爲諸大臣所掌握。民間怨聲四起，人心不安，革命似即發作。至於怎樣去革命？

取何種方式，有沒有外力會來阻梗？這在當時是極難斷言的。可是在歷史上有一個最奇怪而最湊巧的，就是當舊的日本正在成熟要變遷的時候，日本就與已在發展的西洋諸國接觸，在這接觸中的結果，便是新的國家出現。

參考書：Griffis, *The Mikado's Empire*; Lloyd, *The Creed of Half Japan*;

Brinkley, *Japan, Its History, Arts, and Literature*; Brinkley,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Longford, *The Story of Old Japan*;

Davis, *Japan, from the age of the Gods to the Fall of Tsingtao*;

Cary,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f Japan*.

## 第六章 日本舊時的文化

我們要述說日本從舊至新的經過，就不能不稍耐煩的敘述其正在未變遷時候固有文化的要點。一九一七年的日本，無疑是一八五〇年的日本的嬰孩呢。因此，我們要瞭解日本的現在，就不得不先認識日本的過去。

### 武人階級

武人階級的優勢，當算是在十八世紀日本文化最特色的一點了。自從源賴朝掌握國權而後，武人階級的首領，常是身爲將軍或是將軍的大臣。日本過去有幾位天皇感於皇權之被奪，要作實握國政的企圖時，總不能不像將軍一樣的去信賴武人的擁護。這種制度的發展，實

有類於歐洲中古時代的封建制度，無論在形式上或思想上都是以武人爲重要的部分。在日本這種的名稱是「幕府」(bakufu)。「幕府」的首領叫做「征夷大將軍」(sei-i-tai-shogun)。將軍的地位純然就是築在武力上面的。以名義論，他是天皇的臣僕，以事實論，他的權力是全國至高無上的。將軍以下是「大名」(daimyo 卽諸侯)。當德川時代，他們中有些與皇族是兄弟的宗派，或直接附庸的，又有些家康敵黨的後裔，因爲有這種的關係，他們對家康及家康的後繼者，不過是表面上的歸服吧了。在直受大名統轄的是附庸，尤其是武士(samurai)。他們的地位是世襲的，平時出入腰負兩劍，這是要顯耀他們地位的關係。他們中不是忠心於大名，就是忠心於將軍。從他們的主人，每年可領得一定的款項，以供費用。此外，有些號爲「浪人」(ronin)者是沒有所屬的。他們的自由是超常的。他們之所以出此者，若不是因爲他們是冒險勇敢的精神，就是因爲他們常有苦患如貧窮，失寵，悶鬱或主人家室的覆亡等事情的發生。日本的武人階級定有他們自己倫理行爲上的法典——武士道(bushido)。這武士道我們下面當略加述說。日本的下層階級似是爲擁護武人階級而存在的。事實上，武

士們與商農階級中間好像隔有鴻溝。下層階級的青年對武士們獻媚示誠無不備至。他們在服裝上，行止上倘爲法律所容許者，無不樂得步武武士們。大約，普通人民的崇拜英精分子，到處都是如此。不錯，自從德川當權而後，幾百年的太平歲月，武士們竟因此而失掉了他們一部分的氣力，同時又因溺於奢侈的惡習，結果，他們中許多遂爲其部下所支配。德川氏當時頗能同情於平民階級，以圖推倒武人諸侯的勢力；可是爾時全國的霸權大致還是操之於大名與武士們的手中。

武人階級的存在，從許多方面看來，當這新的時代，與西洋接觸的新時代中，對日本是有利的。有了武人階級，纔能養成一班嫻於紀律與慣於指揮籌劃的領袖，使全國能景仰而服從。除了極少的例外，日本在從舊至新的過渡時期中的領袖都是逃不出武人階級的。甚至現在的日本政府中最佔勢力的還是他們的後裕。因爲有了這些武人特殊的遺傳，這個島嶼帝國就是有許多媲美中國大有便宜的地方。我們曉得，中國那裏沒有世襲的貴族，沒有忠心與樂於犧牲的習尚，故不能使國家從顛危萬分的變遷時期中，坦然經過。並且中國本身好像還沒



有養成一種服從紀律與萬衆團結的能力。足與日本媲美。日本人尚武的習慣這種習慣在這與西方競爭的時期是預備上的重要部分。歐洲雖然久已從封建時代而至工商業的時代了。可是戰爭的習慣依然存在。經濟的發展，依然須有賴於武裝的力量。日本在其武人階級領導之下，尤其是在其尚武的風習影響之下，比較的容易採用歐洲的強大的海陸軍政策。日本在仿法西洋戰爭的技術上是著名的。日本的人民久已有服從，勇敢與好鬪的習尚了。所以，她能使西洋各國對她有所戒心，而登於強國之林了。日俄戰爭，日本得操勝算者，並不是端賴何種方法，而是得力於幾百年來的幕府的精神。

在另一方面，日本這種尚武的精神，在現代也有吃虧的地方。日本未久以前並不是工商業的國家。貿易是下流階級的勾當，資本的積累，就有困難。商船兵船，至感缺如。同時道政不良，交通不便。日本在這個時代差不多完全是經濟自足的國家，國外貿易幼稚逾恆。工商的組織是行會。如此情形，怎能與西洋的組合資本的組織來競爭呢？可是到了一八五三年以後，日本纔接受西洋商業革命的思想，而傾全有的精力到生產的方面與資本的積累上去。自然，日本

之所以能適應於這種新的環境者，並不是頃刻間的事情。現在的日本總算已能適應於新的環境了。可是卻也費了多半世紀的光陰。舊時的日本在道德上是尙武的，而非重商的。日本人看貿易，不如西洋那樣的榮譽，那樣的重要。這不是因爲封建時代做商賈的人善於狡詐的緣故，而是因爲當時貿易事業不是武人的勾當。所以，商人不受強有力的成規所束縛，一味步武於西洋有計劃的企業的發展。他們可算是當歐洲商業侵迫而來的時候，日本應戰的先鋒隊了。

從尙武方面來說，日本與中國顯有不同的地方。日本重視武人，中國則武居工商階級的下層。中國雖然常有戰禍；可是政府久已有了一種習慣，以政務盡由農工學階級選出來的文官去執行。事實上，中國感有困難，不能組織起來去對付西洋的海陸軍。所以，日本在這種情形之下，就不得不起而努力於整個遠東的防守，以抗制西方勢力的侵擾呢。爲了這個目的，日本併吞高麗，并現在已依照她的步驟要去做中國的保護國了。日本之所以有如許龐大的能力，一次戰勝於俄，復能戰勝於德者，一部分不能不算是受了長期的武人封建制度的訓練的結

果吧。

武人階級是築在「封土」上的。在封建制度中所謂忠心悅服，給與於地方諸侯者多給與於國家，或天皇，或將軍。我們曉得德川氏的首領爲將軍，將軍之下有地方諸侯，有附庸。附庸們對將軍雖然悅服；可是有許多諸侯對將軍的權力懷有妒心。所以當將軍與諸侯衝突的時候，爲附庸者必先服從他的諸侯，而次及將軍。有時甚至將軍之命全不理會。這種封建思想在新近的日本依然存在。在陸軍方面，受長州的支配，海軍方面，爲薩州所掌握。這兩派的互相仇視由來已久，同時在日本的政治上已成爲重要的部分了。

### 日本的帝制

另一個從舊時的日本遺下的當是帝制了。日本的皇室是萬世一系，未曾更姓換號的，皇子孫，還有許多人堅信以爲是天神直接的後裔。這一點已成爲日本人愛國精神所憑在，也是日本人愛國精神的特點了。這裏，日本還有一個比較中國便宜的地方，原因中國的皇室不

是萬世一系的，不是盡係同出一源的。經過了好幾個朝代，并當西人在中國強暴的時候，皇位還爲異族所佔有。

日本人對於皇室的陳襲的態度，可說是對於新時代責任上的一種重要的預備了。將軍們，尤其是德川氏的將軍們，對天皇的尊嚴是重視的。這麼一來，在人民的想像中已鞏固天皇的勢力與發揚日本在十九世紀新興的愛國精神了。然而天皇的位而不治，在日本歷史上已成慣例。將軍首相尤其是藤原氏的首相藉天皇之名而行政施令者已不下千年了。將軍首相這樣侵犯皇權，而諸大臣們又同樣的支配將軍，或甚至支配諸侯的權力。在名義上天皇是全國一切權力的來源。事實則天皇極少干政，一切政務差不多都是由內閣去執行。日本的所謂責任內閣，現在事實上雖已成立；然而我們這裏所說的內閣不是負責於國會的。顯直的說，日本的內閣不過是若干有能的人，得天皇的信任，并以天皇的名義而執行政務吧了。至於天皇個人影響於國政的程度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因爲關於這點，從未曾有人充分的公開估論過。

新日本的愛國主義，與民族自我的意識，集中於天皇者，已在過去七十年中特別地張大了。日本古昔簡直沒有甚麼愛國主義的存在，直至封建制度告終的時候，愛國的意識纔漸開始發生。僅知道二十世紀的日本的人對這點，一定會奇怪的。日本人民現在的極端愛國精神，民族自豪的心理，一部分是由於舊時的制度中濫觴出來的。武士忠心於地方諸侯在德川時代已爲顯著。同時天皇的尊嚴又未嘗稍減。在武人階級方面，他們對天皇或國家的觀念，雖曰至微；然而倘如皇位被不是神武的後裕所篡奪，他們或許是不會容忍的。這都是因爲他們相信日本是個「神本之邦」(Land of Gods)，皇位的承繼不能混亂的緣故。日本人的愛國觀念因爲過強，所以不讓蒙古人來侵犯他們的疆土。歸根來說，他們對直接統馭他們的諸侯的忠心是極重要的。按照他們在倫理上一部分的規律，各個人都能犧牲其妻孥，自身性命來服役主人。倘如他的主人死亡，竟有願行自殺，捐軀以示忠心者。總之，在封建時代，日本人僅知道要直接的忠心於主人。到了封建制度崩壞，各個人的忠心就移而集中於天皇。這點是西人難於賞識的地方了。後來海禁大開，日本接觸西洋諸國，因而更引起他們對於國家懇切的愛

護。

武人階級的法典的另一特點，是他們對於體面的重視。私人間的怨隙，常以仇害生命相報。他們信重中國儒家的「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的話說，所以爲君爲父報仇的故事，實不勝數。在封建制度中倘若一位附庸遇着他的主人被人家殺害了，他必奮身爲他的主人報仇，甚至因而危害及他的妻孥的生命也所不惜。武人所背的刀劍，卽表示用以維持或保護他的體面的意義。武人階級對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異常誇大，而這種誇大，似乎已成爲日本民族的特性了。日本人的誇大是先封建制度而就有的。有了這種誇大的心理，而封建制度纔可維持。民族的誇大既已存在，而個人的誇大也經成立。我們明瞭了這種誇大的心理，而後纔可明瞭他們受西洋人排洩，如加利福尼亞與加拿大等地在立法上對他們入境的嚴加限制，因而引起他們的憤恨了。自然，他們這種憤恨的發生，一部分固是經濟上的緣因，可是最要的是因爲上述的入境限制，係單獨對付非屬歐籍人民的。這好像日本人有被看爲劣種的意思，有傷他們民族國家的光榮。

日本人的愛國主義，一部分當算是德川專政期中全國團結的結果。我們曉得日本在德川以前的國族精神并不見得高，甚至德川在政後，歷了多時還是如此。自然，封建制度的實行，全國必至分裂不堪的。當時南方有幾位諸侯於各自爲政之外，居然有如獨立的君主。例如，當十六七世紀的時候，他們竟獨自的先與歐人互商。後來德川氏費了無數心力，纔能在其支配之下統一起來。自此全國就受審慎預定的法律所統轄，發政施令均自江戶。如貿易旅行，甚至服裝，民食等也無不直受國家的監督。不錯，國家主義的感覺在德川幕府未場台以前，還未普遍；然而我們不能承認現在日本的國家主義是德川時的一種自然的結果。

德川的制度，正是日本新舊特性的預備。事事由國家監督，社會方面團體的生活逾恆重視。個人的行動，處處受團體的裁制，與個人主義盛行的國家主義適得其反。我們已經說過，當德川時代，社會生活中的無論任何方面都是由政府規定，與受將軍代表的監督。國外貿易受政府的支配，治安秩序由政府按照最剛嚴的規律去維持。同時又行一種所謂綜合責任制度。這就是說一個家庭裏面的各個人的行動，應由該家庭負責。廣至一村一町，也是無不如此。所

以在新的日本中，社會綜合的行動是逾恆重視的。鐵路、電信、銀行以及國外貿易等，概由政府去領導與鼓勵。我們知道日本的航海事業的發展，是最足惹人注意的。他們之能有如許佳績者，實受他們的政府的津貼幫助不少。這種綜合行動的重視，在二十世紀的商業經濟上與密有組織的泰西諸國競爭，就有許多不吃虧的地方。無論那一個國家，如能對於生活、教育、經濟以及軍事各方面有完備的組織，有指揮統一的中央政府，那麼，在這劇烈競爭的二十世紀中，自然有取優越的好機會了。這種國家集產主義 (state collectivism)，日本因有過去的訓練，所以行之至為適合。在十九世紀的當中，日本自擊情形已就感到有實現這種主義的必要。一下決心，捷手施行，而且高度的施行了。日本因有集權政府的指揮，所以她在太平洋爭霸權，在中國商場爭領袖地位。一切的一切都是行動劃一的。沒有因為指揮的不審慎而浪費的，沒有如若干泰西國家那樣的人民，不能盡量合力奮鬥的。

上述的「國家指揮」在日本表現得很令人滿意。也就是日本行政制度中的一個最有特色的地方。日本的高級行政長官，多是由武人階級或他們的後裕中引選出來的。所以，他們



可說是全國最有優勢的人物了。日本人民各面的活動，都極審慎的與詳細的受政府所支配。這就是德川時代的精神的延續了。

舊時的日本的另一個特點在富有吸收國外文化的經驗。日本在封建時代以前的文化，大都是因與中國接觸所得的戟刺而發展的。甚至在特別的日本式的封建時代，許多方面的生活都受大陸文化的影響。他們的行為標準雖說大致是由其民族社會的需要發展而成的；然而一部分不能不承認是模仿孔教佛教的思想呢。就以武士道來說，自然是日本的土產，而事實受有孔教佛教的影響。日本封建制度的興起，分明就是仿行中國唐代行政制度而失敗的結果。中國文字簡直是整個的搬進過來，中國文學也滿受日本讀者的歡迎。日本舊時深受佛教的影響；然而我們要知道，這印度的信仰之所以傳至日本各島者是由中國介紹過來的。中國的哲學深切地影響於日本的思想家。日本雖這樣受外來的影響，這樣羨慕大陸的文明，卻不願作盲目的抄襲。就以武士道來說，不盡是與孔佛兩教的思想相同的。日本雖採用漢文；然而求事實上之適應起見，卻增以註音字母。日本產生她自己的文學，藝術上的作品。他們的

作品之有異於所懸以爲模樣的大陸作品者，與中古歐洲國家文學、藝術作品之有異於羅馬作品者同例。歸根來說，日本人受大陸文化的影響，雖不如美洲印第安人之受歐洲文化的影響爲多；可是他們就以這外來的文化爲他們的基石去建設他們自己的文化。斯與北歐人民之以地中海文化爲基石者不相區別。

當歐人未到日本之先，日本人於融納國外思想與文物制度上的經驗，已可令人嘆服了。日本數百年來吸收外國文化，已成爲一種習慣了。日本民族的誇大心理很重，他們至怕受外人以不開化的民族看待他們。因此，求進之心，自然殷切。同時又因爲日本的過去的關係，使她的這種誇大的心理不特不爲採納西洋文化的障礙，而且捷快地依其所需求的盡量去吸收。日本最先盡量吸收的是中國文化，後來一感覺到西洋文化的優越，就趕快改而吸收西洋文化成爲己有。從這點看來，日本較中國就大得便宜了。中國人夜郎自大，以爲普天之下不會有任何國家的文化，可與中國文化媲倫的。中國自命是個老大國家，文物禮義之邦，以爲只要自己去施教化，不肯虛心納物，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降至日本採用西法國勢伸張以後，中國纔驚

心痛悟，知道應採用西法以求適應世界的潮流了。

日本是西洋國家的一位伶俐的受教者，現在可由受教的地位，而至施教的地位了。遠東諸後進國都有派遣學生赴日求學。日本學者從中國的意像文字中造了許多適合於西洋物件或思想上的名詞來。而這許多名詞竟爲中國學者所抄襲引用了。日本在遠東居然處在領袖的地位，以其所由西洋學得來的去幫助龐大的東亞共和國。國家從事於工商業的組織，與軍事外交的革新了。

### 舊時日本的文化

舊時的日本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愛好美術。我們可以從日本的繪漆，彫刻，陶器，建築，園藝，禮法，花節，茶儀，刀劍製飾，舞蹈以及其他已經表現者證之。本書因篇幅的關係，不能詳加論列，僅爲按個人興趣之所及略一說及吧了。須知道，日本的美術大都是受中國影響的。無論唐，宋，元，明那一朝代的美術大家，都有日本的徒生。所以每一派美術復活於大陸，日本必受影響。日

本在美術上有她自己的派別。他們對於外來的美術雖力加模仿，可是他們自己的創造力卻不因而埋沒。日本美術上的作品，正與他們所立以模仿的中國作品一樣，深受佛教的影響。他們所寫的畫不在求像，而在於精神之攝托。因為佛教看物質世界是暫時的，在這種環境當中，自然會以物質世界為根據的去描摹精神，去發表情緒，不以描真物體為能事。在繪漆上，他們常增以漢字題解，這是最美觀的。我們可以說日本最佳的作品，大足與西洋至上的作品匹儔的。

日本的繪漆學已經有悠久的和光榮的歷史了。我們這裏若果要去詳舉日本漆學的派別，及其偉大的漆學家，當費不少篇幅。茲所要說的只是最重要的幾個吧了。我們所知道的土佐派大都是研究日本的材料，與適日本的方法。漆學家中如明澄者（一三五—一四二七年），自己專描漆像和佛教的信條。同時又有一位佛僧名叫雪舟者（一四二〇—一五〇六年），他經縝密的研究了中國諸大漆學家之後，就自己擴大他的方向。他的作品如繪像及山水畫等至今猶存。他結識有一位同時的少年漆學家元信（一四七六—一五五九年）是

一位漆學家的兒子。這位漆學家從他的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風格與範圍，頗見廣雜。後來就成一派而名爲狩野派。學從這派者現在還有人在。上所舉的都是貴族的作家。到了一六四六年果然出了一位平民的繪學家刺綉家菱川師宣（死於一七一三年）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德川專政的時候，平民階級的重要。他極諳許多舊派作家的技術，和可以看出他的時代的生活。他鼓勵人家用圖繪與彫刻來當一種方法去教育平民，與娛樂平民。後來又有一位作家名叫做應舉者，對於德川時代的趨勢多有描寫。氏是一位農人的兒子，他把從前中國派的畫規，舍諸不理，而僅依自家所獨見到的去產生他的作品。在德川時代有色的半印半日的繪冊，也頗流行。其主要目的是爲着平民的。

彫刻方面，日本尤其值得人們的注意。那裏有著名的木刻家，有著名的彫金的藝人。日本人所造的佛祖的銅像，無不令旅客一見之下，嘆賞不置的。日本的繪漆與嵌飾，工夫卓著，陶器也久聞名。雖則中國陶器輸入日本經有多年之後，日本人纔仿而製造；可是他們卻費了不少工夫，以求出產上之改良。我們如要詳盡的述說陶學史，自非宏卷數部莫辦。日本陶學派別不

少，常有因某一地方而取名者，或由某一「封土」的領袖提倡藝術，因而取該「封土」之名爲名者。

關於建築方面的歷史上的最好模樣，當算是佛教的廟宇，和少數尙存的封建時代的城壘了。在日光的宏偉壯觀的家康墓場的建築，是令人見而嘆服的。日本一部分的園藝極得西人的譽稱，而使自然派的人觀之尤覺可愛。有些景緻是入畫的，矮小不長的樹木，常加以無限的人工去改革，使能有普通的發長。日本的桃花盛開的時節，亦就是舉國賞花的例假。

當德川專政的時候，皇室與諸侯常給予人民以機會發表愛美的靈感，在精美十足的禮儀中去發表愛美的靈感。日本人的温文有禮，至今日而猶然。在二十世紀日本人雖經工業上關係的搖動；可是他們的禮貌，仍然保而未失。泰西諸國不鑒及此，好幾次所採取對付日本的策略，徒是滋生事端而已。日本人甚至於飲茶之微，也有他們的儀節，也有各種不同，有詳細的規定；空閒中精緻地焚香的消遣；武人刀劍製造瑣飾的技巧等，都是從「美」的精神上發揚滋長的。跳舞，遠在日女神時代已就有了。他們對於跳舞，也當作一種禮儀看待。可是近時已不

同了。美術上愛好的精神已成爲商業化的了。雖則愛美的精神依然存在，依然是日本人的一個特性。

日本舊的文學，雖深受中國影響；然而他們文學的成績，并不如他們的美術那樣可觀。日本的詩與散文，大都是模仿外國的。他們的詩有許多特別的規律，因而譯成西文甚多。戲曲方面，本來已就受着神道教的影響，後又深染有佛教思想的色彩。後來於風格，內容上又十足的成爲通俗化了。

在哲學、倫理或宗教上，日本並沒有甚麼創造力，足與中國、印度或高加索人匹儔的。日本人只會採取諸種不同的文化制度，以求適應於自己的需要。只善於根據他國所貢獻的加力研究，再謀光大。他們雖有研究中國哲學家，批評中國哲學家，他們雖有許多佛僧有充分獨立的思想，足成立爲新思想派者；然從未見有那一位日本人在創造力上配與佛陀、孔子、朱熹、蘇格拉底及康德諸人同等看待者。

家庭的固結又是舊時日本諸特性中的一種。現在雖則新的時代已經來臨，普通情形已

經變遷；可是他們的家庭制度還未根本搖動。這是日本生活中的一個最須注意的一點了。無論誰人，正如在中國一樣的當孝敬他或她的父母，奉待父母。父母死後，又須祀拜。每一個家庭應由男嫡的去承繼管理祭祀事宜，以免祖先亡烟絕祀。爲男子者倘如婚後，缺乏子嗣，則常採繼子制度，使免絕宗。子女對父母須守服從，這是一種美德。家庭爲重個人爲輕，所以家庭中各個分子，都應犧牲個人的意志，爲家庭犧牲個人的意志。西洋人的「個人主義」在他們心目中是一種邪說。這都是深受中國倫理思想影響的緣故。在中國，家庭的地位尤較重要。中國的家庭是社會的單位。有些人相信當中國文化未及日本的時候，日本人的家庭並無甚重要。換言之，日本人對「忠君」比「孝親」重要。日本人的子責與中國人的比，則輕於制度，而重於情感。

按日本的舊習慣，作妻子的應全受丈夫的支配，其所受支配的程度比之中國而尤甚。絕對服從，個己犧牲，與忠實等是作人妻者所必備的資格。可是作丈夫的則可以不對妻子忠實，可以離棄，可以任意的離棄他的妻子。婦人在自己的範圍內或許可有極大的榮名；然而無論



如何終不得避免丈夫的支配。這裏我們要曉得，日本的婦女並不是不足輕重的。上流社會的婦女一舉一動，都是普通婦女的仿樣。兒童的好壞，也以她們所給與的影響而決定。她們所給與於兒童的印象至深，因之，影響於每一世代的德性方面，是極重要的。疇昔封建時代的婦女在社會上所影響者是高尚的，是遠大的。爲妻子者對她的丈夫既有深切的忠心，且又自願犧牲一切以歡夫氏。這麼一來，自然的會引起她的夫氏也以同樣的態度去待他的封建諸侯呢。至於下層社會的婦女，對她的丈夫尤其真正的助手。她們與丈夫共同爲餬口計而努力。試以皇室來說，以婦女而登皇位者，在日本史上已有數起了。以婦女的地位而論，中國與日本的不同點，是因爲文化上的差異。要言之，中國是農商國家，而日本則是重視軍事的帝國。

### 舊時日本的宗教與倫理

從宗教的範圍來說，我們未嘗見過日本有甚麼上流的創造。雖然日本人是信仰宗教的人民，而且是深誠信仰宗教的人民。他們不信仰宗教則已，若已信仰某種宗教，則百加愛護，甚

至爲此而犧牲性命，也所不惜。這我們可以從他們虐殺、排洩耶穌教徒一事證之。可是他們的宗教情感多是受歡賞美景，和對人生的實際態度而發生的。他們在哲學或神學上缺乏探思力，就於倫理方面，也不敢有何改革。他們的一切宗教思想，如不是從外國舶來的，就是因受外國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的。他們原始的信仰，似乎是極單簡的，奉信各種各樣的鬼神，奉信他們從思索世界、生命、和國家的起原上所臆造出來的鬼神，如日女神等。除此而外，他們還奉拜歷史上的許多偉大的武將。日本有些學者曾說，蝦夷人被日本驅逐之後，蝦夷人所奉信的諸神，日本人也繼而奉拜。（這尙沒有確實的考證）。大概是說蝦夷人的神在蝦夷人的地方有勢力，蝦夷人的領土既爲日本人所征佔，則被佔者的神，應爲征佔者所奉拜，以示和洽。蝦夷人的神教似乎是禁止交接的。贖罪洗過所用的是水和風。他們沒有神像，不立廟宇，不設僧侶。這與宗教信仰上的關係是至微的。

日本在大陸的思想和制度影響之下，其原始的宗教已多大的改變了。男女諸神的故事，是一班多少熟識中國史實與其他國家的神話學者所述作的。因此，他們所寫出來的故事，自

然難免受外國思想的影響。日本人原始的信仰，似乎已經改變其態度，要去提高皇權了。日本一向凡是本土的宗教思想，都必涉及皇室。中國人崇拜祖宗的觀念，傳至日本之後，日本的本土信仰纔受影響而至重看死後的幽靈。這麼一來，皇室的祖宗——日女神也與歷代諸天皇的靈位同樣的受日本人所崇拜了。

佛教傳入日本之後，引起日本人的民族意識，就以本土的信仰名爲「神道教」。可是「神道教」的名稱是來自中國的。其所以取名「神道」者爲的是要表示與「佛法」不同。有一個時期，「神道教」幾爲佛教所併吞。緣因佛教中一些聰明的僧徒發表議論，證明謂古昔的佛聖都是日本靈秀的化身。

然而這種本土的信仰卻依然堅持。皇室方面既示贊同，而全國各地，又設有牠的廟宇，沿至德川時代，若干學者出而希圖復興此教。他們的目的在注重信仰，指出本土信仰與外來宗教的相反。同時還要清除神道教中的一切外來的成分。降至德川時代告終而後，皇權歸復，神道教更能別開生面的作正式的擴大，而成爲純粹的本土宗教。廟宇方面卻依風習建築得逾

恆簡單，在各種建築中恐怕是最能近似日本人的原始房屋了。在每一個廟宇裏頭，都有牧師負責管理，而這班牧師並不成一個階級。他們也無甚勢力。廟的內部不設神像而以表章爲替代。表章中則以刀鏡及珍飾爲普通。聽說這些東西是日女神給授於皇室祖宗保傳下來的。每一個神道教的廟前都設有一個「鳥居」類似裝璜的拱門。我們要曉得，神道教並不設有並不執行甚麼所謂「倫理制度」的。可是牠的教徒在精神上，道德上被引誘而有罪犯者甚少。牠的教儀是以正式洗罪，奉拜歷代的天皇，民族英雄及祖宗的精神，祈禱國家的福利，與避免罪惡爲限。

在另一方面，舊時的日本，佛教不能不算發達。佛教傳入後，隨佛教介紹過來的有許多利於日本發展的印度，中亞和中國的哲學，美術與制度。佛教的哲學頗深奧，依佛教的教義，這一個世界是過渡的，是幻象的。人類在這個世界中是受束縛的，是受無限期的輪迴 (rebirths) 的痛苦。在每一次的輪迴期中，各個人的命運都是受他的「羯摩」(Karma) 所決定。「羯摩」這個名詞是不完全的。可是簡單的說，它是含有一個人過去善惡行爲的結果的意思。人

類只有去釋脫這暫時的世界以求自救；去求信仰中所給示的方法，以解除現存的束縛。我們這裏所謂方法者，有因派別不同而異，望讀者注意。佛教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極富的。牠有許多壯麗的廟宇，從牠的廟宇中所表現出來的美術，得經他們教徒的傳布，已是廣聞於世了。佛教的僧侶，在他們的教會中是一個有權力的階級。他們常是有能力有學問及有信心的人物。佛教包括多神，節期繁多。每當節期，他們必鼓勵人民來廟參拜。佛教可說是國外文化輸入日本的重要的媒介。歷代的天皇，貴族以及封建諸侯，對之無不力示贊助的。所以事實上，佛教在日本所佔的地位，比諸天主教在中古時代的歐洲尤為重要。佛教與天主教兩者都是介紹較優古的文化於半開化的人民，兩者都是以其哲理，學問，教儀，美術及建築來支配社會的。佛教的宗派大者有六，其中的來源多自外國。每一個宗派裏頭，又有小宗派之分。他們雖有時互相妒視，彼此爭辯；然而未曾一次訴諸裁判，未曾互加仇害，與耶教各派之互傷感情者不同。降至德川時代的末段，佛教在日本就開始失掉了牠的勢力。原因當時中國儒家學說盛行，日本學者或有思想的人無不心嚮神往。於此，依然信仰佛教的只有平民階級了。可是這裏勿要以爲日

本人對於宗教上的分野，有如西洋那樣嚴明。日本人常有爲某種目的去神道教廟，同時又可有別種目的去佛教廟，再可依樣的信奉中國儒家的道德觀念去敬拜祖墳。他們雖如此，而自己也不感到有甚麼不和諧的地方。甚至他們已經失掉了對佛教的信仰，而於葬禮上則還是遵照佛法。情形正與在耶教國家而不信耶教的人之對於婚葬禮儀有需於耶教會的勞務者彷彿。

儒家學說影響於日本人的生活與思想者最大。大陸文化第一次輸入日本的時候，日本學者已就傾心於中國典籍的研究了。他們的人數雖則寥寥無幾；然而到了德川家康之後，孔孟就廣受日本人的崇拜。換言之，孔孟學說影響於封建階級的深遠，有如亞里斯多學說影響於中古的歐洲者一樣。在早期的德川治下，中國文學和中國名賢，簡直是絕對的受日本武人階級的歡賞與贊服。甚至當日本的宗教，言語，文學，制度正在復興而爲日本學者所注意的時候，中國的倫理尙爲多數的武士所重視。

儒家的學說影響於日本者不淺。中國人所重視的崇拜祖宗盛行日本了。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的五倫的關係，已成為日本倫理法典的要點了。雖則有因各地情形與思想習慣的不同而略異。附庸的忠心於主人，子女的完全聽從親意，妻子的順從夫命，爲夫殉節的妻子竟受社會的嘉譽。現在日本學校裏頭所授的倫理觀念，多是抄襲中國儒家的學說。

「武士道」是武人階級行爲的法典。我們說及此，常回憶到封建時代的歐洲的武士上去。在德川的晚期中，這種武人法典的存在，簡直是多年演進的結果。我們似乎應該從武人階級成立的時候說起。在家康的歷位後繼者之下，「武士道」已就表現有好的成績了。雖則稍有失掉了它的原來一些不甚重要的部分。「武士道」本來包含有一種日本倫理的思想，後來因爲受了孔教佛教的影響，而尤其是受了孔教的影響。我們知道孔孟兩人同是中國的封建制度時代的怪宿。那末，他們的倫理觀念，自然的適宜於武士道所採用了。「武士道」就在孔教佛教的影響之下長成。

忠心誠服，分明是「武士道」所規定的要德。做武士的人，應當爲他的主人勞務，倘因勞務而至須犧牲其性命，真理與家庭，也是不容躊躇的。到了封建制度崩壞，一切國權寓在天皇

一身，從前人民所忠心於諸侯的轉而歸於天皇了。人民對天皇的忠心雖盛，而奉拜祖宗，孝敬父母，也能同時並進。要知道，欲求家庭的團結，須有賴於孝敬父母，須有賴於兄弟恭。武士們的生活方面，要節儉，要簡單，要勿愛金錢。人生如僅忙於餬口與崇拜金錢，必遭論者的揶揄。總而言之，武士們應能刻苦，能自制，尤須毫無懼憚的能忍受腐害的災患。他們的個人的尊榮至為重要。他們所背着的腰劍，為的是顯示他們的地位。雖曰他們所背的刀劍，如沒有危重的理由，不能妄用；然而因為他們過於重視尊榮，常以刀劍為個人或為其諸侯報復仇怨之用。他們看個人的尊榮，有較性命尤為重要。遇有許多危難的時候，「自己摧殘」，他們不特以為是一種權制，而且以為是唯一適當的解決困難的方法。他們有時失意或敗北的時候，常行自殺。意思是，以這種手段來表明他的忠烈，或期以此反映出他們的冤鬱。以自殺的方式來擁護正義，又以同樣的方式來勸戒他們上官的咎戾。無怪乎，日本武士每人所授一部分的訓練，是以提劍拔腸的自殺（日人稱切腹 *seppuku*）為認許的方法。他們以為武士們舉動要壯烈。倘遇某種情形，而有自殺之必要者，可拔刀劍壯烈自決。倘有被判死刑，則寧可自殺（認為一種權



利)不可受殺於刑吏之手,免示怯弱。這種「淡泊主義」的信奉,與人生物質方面的漠視,特別是佛教禪宗所主張及鼓勵的。可是我們要記着,這種主義已嚴厲的訓練了。個人的自信心也已培養了。又已受中國儒家的影響而加以改變了。

武士們的妻子也有受武士道的影響。她要能個已犧牲,要能藏掩她的一切苦悶。同時又要曉得遇有需要時怎樣端然有禮的去結束她的性命。總之,她要以身作則,深切地能感動她的丈夫。

依武士道,對敗退的敵人,當以寬容大量。對自己曾經簽許的字約,要能實踐,勿失朋友。大凡對於客觀的事實,都要以上所言者,特加注意或加思量。

我們曉得武士道是爲着武人階級而產生的;可是其影響所及的不只是武士們,普通臣民也同樣的受其影響。日本社會的下層階級,於行止上常是盡量的仿效武士們的儀度。「武士道」有如武士,它所由產的社會秩序,縱久已消滅,而它的活現勢力卻依然猶在。

上所說的是日本舊時底制度和生活上比較重要的特點。雖曰牠們後來經有多大的改

變，有些竟至消滅；然而牠們在思想和文化上卻留有不可磨滅的痕跡。

參考書： Chamberlain, Things Japanese; Griffs, The Mikado's Empire;

Binyon, Painting in the Far East; Fenollosa, Epoch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Morrison, The Painters of Japan; Aston, A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Chamberlain, Japanese Poetry; Mitford, Tales of Old Japan; Aston, Shinto, the Way of the Gods; Gulick, The 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Hearn, 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 Lloyd, The Creed of Half Japan; Nitobe,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Brinkley, Japan, Its History, Arts and Literature; Anesaki, History of Japanese Religion.

## 第七章 國內轉變時期（一八五三—一八九四年）

（一）從西人來日至皇權歸還（一八五三—一八六七年）

前一章中我們已經說及德川的治權怎樣逐漸的準備跑上自毀之途，和封建制度怎樣的趨於崩壞了。當十九世紀的中葉，日本的轉變時期已成熟了。家康的許多後繼者孱弱無能，因而政權多旁落於大臣之手，同時德川的敵人西南諸藩閥，特別是薩長兩藩閥遠離江戶意圖作亂。他們實際上，在其所統轄的地方，獨自為政。幕府官員鞭長莫及，加以德川握政而後，太平既久，武人階級遂沈溺於奢侈怠惰。封建制度遂也成爲時代的錯誤。這裏我們要注意，日本的維新，僅是限於少數人的事業。他們注重天皇歷史上的地位，指責將軍的篡奪皇權。西京皇室貴族又正開始蠢蠢欲動，不安於幕府的苛遇。爾時中層階級富力雖見增大，然卻不願意再

續擁護這種怠惰與陳腐的武人階級了。在這種狀態之下，幕府的命運自然難保不發生危險了。假使當時沒有外來的緣因，或許會釀成長期的內爭，而內爭的結果，或許會有一個封建氏族起而掌握幕府；不然則或者國家憲法會至全部改變，都是難於逆料的。後來，革命果至促急，雖則革命的步驟，有視乎西人的來臨而決定。

### 十九世紀西人的前進

德川的閉關自守政策，雖然顯有成效；可是它的成效並不是主政者當時努力的結果，而是因為當時情形的關係。我們知道當十七世紀的末段與十八世紀的全部，西洋諸國並不耐心的在中國與日本求他們的商道。中國當時僅有廣州一處與外人貿易。葡萄牙人在遠東的勢力並不重要。同時西班牙人因佔據菲律賓，無意於菲島以外的商業。大不列顛則正在印度忙於擴張權力，克服土人，抗逐法人。且十七、八世紀及十九世紀的早期，歐洲各國內部發生戰爭，無暇向外。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情形就不同了。（一）俄英美三國在十八世紀的末期和十

九世紀的早期，大探險於太平洋的北部。(一)拿破崙戰爭以後，世享太平，所有的力量幾乎盡集中於工商業的發展。且因工業革命，貿易大張，生產既用新奇的機器，生產自然激增。於此就不得不求多量的原料，去供給大規模工廠的需要。同時因水蒸汽發明，海陸交通發達，大量貨物的運輸，天涯海角，短時可到。再因北美合衆國的發展，歐人接踵紛紛向太平洋而來。結果，俄勒岡(Oregon)，加利福尼亞兩省，就於十八世紀的中葉爲歐人所居留。太平洋的西岸，又有俄人從西伯利亞經過而來居留於阿穆爾(Amur)和阿拉斯加(Alaska)一帶。在這種情形之下，太平洋的商業必緣而起。東亞各國自然地必被迫開放門戶了。所以，中國遂首當其衝。緣因英國於一八五〇年左右已能統轄印度，英人就以印度爲商業上的根據地而與中國通商。那時的中國門戶依然緊閉，互商的限制又過嚴。英人因難容忍，遂與中國宣戰。結果，中國敗績。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由此成立。五口通商，中英貿易及正式關係，漸此開始。爾時泰西其他國家均迅速的步武英國，紛與中國訂立互商條約。這種壓力的移至日本，自然是急遽難免的事情。日本的生活，孤處的生活，也就隨而告終。

當十九世紀的上半期，泰西諸國已屢次表示要開放日本了。荷人嚴受限制的在長崎通商之下，日本已有迫切的變遷了。到處都有日本人學習荷文，以荷文爲媒介，他們已受西洋文化重要的暗示了。歐人所著的關於歷史、地理、文學和科學的書籍，也有些日本人愛讀起來。且經日本醫師解剖人體之後，他們自覺到荷人於解剖學上的說明，比中國人來得準確。知道西方文化的優越，大興求知之念。太平洋的北岸一帶，在十八世紀已有俄國船隻發現了。俄皇於一八〇四年也派專使來日，要與日本成立正式通商，事爲日方嚴加拒絕，日俄兩國就在千島列島和薩哈連一帶衝突。結果，日方敗北。俄國當時本有可能作再進一步的侵入日本的本部；可是因爲拿破崙戰爭的緣故，俄國不能兼顧，日本始免此患。在一八四六年那一年法國船隻有到琉球羣島，勸琉球人受法國的保護，使法國得藉以守抗不列顛。一八四七年荷王勸日本放棄其孤處的政策，一八四九年竟直警告日本，謂美國艦隊不久將到日本。歐洲其他國家的船隻之與日本接觸者，也漸陸續不斷。

開放日本門戶的動議由於美國美國當時在遠東沒有領土的野心，她的目的在通商。這種目的後來果然達到。美國航海的活動，在內爭以前重要過內爭以後呢。她的船隻遍行全球，以遠東而論，船隻數目除英國的外，美國當首屈一指。日本的漁人，有時也能跨太平洋而至阿留西安斯（Aleutians）或北美沿岸。一八三七年有一隻美國船（一）駛近江戶，要領回船破流連於日本的幾位美人。同時倘有可能，尙要與日本通商。可是該船竟被日方破擊，毫無反抗的開回廣州。後因美籍的漁人在太平洋之北者爲數漸夥，他們有好幾次在日本遇船破沈，得救者自然在那裏爲難民了。可是日人竟把他們閉禁起來，且加苛遇。要把他們好好地撥送出境，只有賴於荷人的仁慈的斡旋了。美國當局以爲有與日本將軍辦交涉的必要，以保美籍漁人的安全，并希望從那裏領回受難的美國人。到了一八四六年，美國水師提督比德爾氏（Comodore Biddle）以美國總統的名義要求日本開放，又被拒絕。一八四八年美國一隻兩桅帆船名叫普勒布爾（Preble）開往長崎，威嚇日方，謂日本政府刻須把所被拘留之外國水手十五名交出，否則將行破擊。

美國於一八四〇年後取得加利福尼亞省，不久美國船隻就由舊金山 (San Francisco) 開往中國新通商口岸。既然日本位於來往船隻所經之道，若其口岸開放，於添載糧食，必增許多方便。美國因為船務方面，尤其是關於漁利方面，不能不力求日本門戶的開放。日本昧於時勢，一味拒絕。美政府就派一艦隊由水師提督培理氏 (Commodore Perry) 統率，直往日本要求立約通商。培氏於一八五三年到附近江戶的浦賀灣，艦上武備至為充實。培氏就遞交美國總統致日本當局的公函，後因知道沒有馬上能成功談判的希望，乃率艦隊離開日本，并聲明決意明年再率艦隊來日。日本舉國大發驚慌。幕府將軍左右大臣，尤覺提心吊膽，困擾不安。皇室裏頭更形慌忙，下令全國牧師一律到各大廟宇禱告，望神明保佑，得免外患。光陰很快，轉瞬已是次年的春季了。培氏果依前言，率艦重來，江戶當局目擊培氏所統率之蒸汽戰艦，自知日本已無反抗的能力，幾經談判，遂於無可如何中訂立條約。

培氏雖與日本訂立條約；可是這一個條約，並不規定完全開放日本，因之日本的孤處狀態，還未能全部結束。培氏所與訂立的條約，不是注重於商務方面的。牠僅規定以後日本應照



料與安送交出美籍遇難的水手，并准美國來往商船停泊日本添載糧食。該條約所規定開放的口岸僅有兩：一是靠近江戶的下田，一是位北島的函館。美國可派駐領事於下田地方。美人在日本的商務，必須依照地方規律進行，依照地方嚴肅的規律進行。美國來往商船在日本購添糧食，必須由日本官方代辦。倘日本有訂許租界於其他國家，則美國當得享受同樣權利，另設租界。培氏條約成立之後，歷時兩載，英、荷、俄三國也先後與日本立定條約。惟其中無一有關於居留或廣大的商務、交通等的規定。後至一八五七年，美國駐日總領事赫黎斯 (Townsend Harris) 氏始與日方商議，結果，美人有居留於開放口岸的特權。外人除了他們各本國的領事法權支配外，不受日本官員與法律的限制。一八五八年，赫黎斯氏又與日方談判作再進一步的訂立通商條約，這是最足供人模範的條約。該約自一八五八年發生效力，直至一八九九年纔行廢除。在這個時期中關於關稅者有一定稅率的規定，非得雙方訂約國之同意者不得修改。此外還有關於皇廷接迎外國外交代表，和開放其他口岸等均有規定。我們要知道赫黎斯之所以能得勝利的與日方訂立此項獨惠條約者，並不是靠武力的威嚇，而是賴於赫氏

的同情心的機智，與其忍耐心而有的結果。在這種條約中，關於「治外法權」和「關口稅率」等自然對日本的主權有一部分的損失。所以爭回既失的主權，就成爲後三十五或四十年日本歷史上的要目了。第一，外人不受日本法庭的限制。第二，日本放棄固有主權，由外人支配本國關稅。凡屬有血氣的愛國的日本臣民稍能認識其中涵義者，都是憤激大鳴不平的。美國與日本於一八五八年簽訂此項條約之後，英德俄及西方其他十二國均連接的與日本訂立類似的條約。爾時又適英法正與中國作戰，企圖作更廣的開放中國門戶。這一齣戰爭於歐洲強國在遠東伸張勢用上壯氣不少。日本之所以垂首如命與西方國家訂立條約者，或許也是因受這一齣戰爭的影響。日本爲要與美國於來往公文上互相批准的關係，就派遣專使駐美，此爲日本外交官出國之始。

### 日人於許准外人入境上的意見紛歧

日本與西方國家訂立上述性質的條約者，並不是民意所贊同的。日本因外人的來臨，竟

引起全國分做三派。因爲各派的主張不同，互相攻擊的事情緣而發生。僅幾年中兩立政府解體，新的政治制度漸至開始起而替代。有一派認定西方文化的優越，要置諸不理，絕不可能。他們主張日本要許准西人入口，同時要趕快的盡量仿學西法，期以西人的利器去與西人競爭。日本在西方文化未東漸以前，所採納的是中國文化，是他們所認爲世界最高級的文化。可是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已證明西方文化的比較中國文化爲有勢力，有效能了。所以他們主張要虛心的去接受。這一派，起初人數甚少，後來僅在十數年中就成爲最有勢力的一派。他們漸認到兩立政府的錯誤，有了兩立政府，始終必不能與西方政權集中的國家相頡頏。他們中許多滿腔熱望的改革家就決心開始從事致力於皇權歸復的運動。他們的主張與責將軍篡奪皇權的歷史派的言論又相契合。第二派的主張與第一派自有不同，他們以爲日本要持閉關自守的狀態，自不可能；然而門戶的開放僅可遠至如外人所要求的程度而已。這種論調以幕府官員所持者爲最盛。至於第三派，則可以代表一般最保守的勢力，他們主張絕對閉守門戶，取消與西人所訂立之一切條約，驅逐各地西人出境。大概西京方面的論調都是如此。日本的皇

廷此時還是未曾與外人接觸過的。凡有不利於皇位者概作反動看待。可是西京皇廷向爲西部藩閥所支配，這些藩閥中又以薩長兩藩爲最有勢力。自從家康握政而後，他們對幕府將軍不過是陽奉陰違的了。他們雖不願服從將軍；然而於許准外人進口的問題，他們起初的意見不能一致，而且並沒有一定意見的可言。後來他們堅信以爲西人都是叛逆的，應傾所有武力以反對之。他們就上奏天皇請以皇權強迫將軍取消與外人所訂立之條約。

### 將軍地位的困難

日本因開放門戶而引起的爭執，是環繞着西京而益演益見集中的。每一派都希望得天皇的同情與幫助。有一個時期，天皇曾一度的傾信西部藩閥的話說，接受西部藩閥的奏求，諭令將軍驅逐西番出境；可是在外國厲害的艦隊大礮之前，將軍自知絕無反抗之力，既不能遵照皇命得罪外人，復不敢直言拒絕，給敵黨以機緣去加將軍以背令辱君的罪名，激起國民的公憤。將軍在這樣左右難爲的情勢之下，只得採取模稜兩可的政策。一方面答應西京天皇命

旨以事敷衍，另一方面則接續與外國通商，惟關於租界的讓許，則力求延擱時日。外人因不解將軍地位之困難，竟以缺乏誠意咎及將軍及其左右。起初已就主張關於外交事件概不轉達西京；但同時又不願對西京全不理會。爲着要支配皇廷的緣故，少年將軍就與皇室女公主成婚，後由將軍親造西京一盡臣禮，並受皇命。

### 幕府的告終

當時的情勢對將軍是不利的。諸通商口岸的西人爲數日見增加，商業因也日趨繁盛。甚至耶教的傳道師也陸續來日住在居留地裏面。他們不顧及二百五十年來的禁令與反對耶教的民氣，一味宣傳耶教道理。因此，傳教師屢與反動的封建勢力發生嚴重衝突。外人常被毆打，有時竟被殺害。武士們以爲如此殺害外國教士，纔可表現出他們對外番的憎惡。外番在他們心目中是危害日本聖地的敵人，都應即刻驅逐出境。一八六二年有幾位英國人在公路上偶然遇着薩藩閣的隨員，就遭非禮。藩閣隨員係屬無知之徒，凌人氣盛。不幸的這幾位英國人

一時痛被毆打，其中一人竟被毆打過重斃命。事後江戶當局大表歉意并償款項。英人要求交出犯人究辦。無如薩藩閥拒絕不理。同時將軍又無能力強迫薩藩閥交出犯人。英人遂於一八六二年派戰艦到九州薩藩閥所統轄的地方砲擊。同年西部其他重要的長藩閥也下決心要作反對外番的行動。命令在下關海峽準備砲擊來往於上海、日本東岸及北美之間所經過的輪船。長藩既預備作此行動，又適天皇頒布一道敕令，所有外人一概驅逐出境。長藩自然樂得此項敕令，就由在該海峽一帶的砲台向美荷法三國輪船開火。這三國聯同英國向將軍要求嚴辦肇禍薩藩閥；可是幕府是無能為力的。甚至江戶派去謁長藩的代表竟被殺害。四國於此就派艦隊到下關去，砲打日本的砲台和肇禍薩藩閥的戰船。在這樣砲火威迫之下，長藩只得答應以後不再建築已燬的砲台，不再攪擾來往的外船，并願賠款三百萬元。江戶當局憤於長藩閥之肇禍與違抗命令，出兵討伐，惜也徒然一舉。不特如此，且當長藩不能按期賠款之候，江戶當局應解囊代付。最後一期的賠款，直至一八七五年纔付清。美國因所得賠款超過所失，後仍以其中的大部分退還日本。

外國公使起初對於將軍與天皇間的關係性質，不甚明瞭。他們以爲將軍是日本至高無上的治首，天皇不過是高級的祭司而已。過了相當的時候，他們纔發覺到這種觀察的錯誤。所以，下關事件以後，英國一位有能幹的公使帕克斯爵士（Sir Harry Parkes）在其未到日本之先，已就籌定他的計劃，關於與日本所訂立的條約，概請天皇批准。就聯同數國艦隊派到靠近西京的兵庫港口去。他們以礮艦爲後盾，向天皇提出要求，日本須馬上許准外人有居留兵庫大坂和西京諸口岸之權，并須減低關稅。因爲有礮艦的威力，天皇受嚇之下，只得無可柰何的——批准此項條約了。這一回事件發生之後，人多以爲顯係將軍之咎。將軍不能踐其前言，拒絕外人入境，又沒有能力來阻止外人派艦進入帝都。將軍雖得天皇以大臣看待；然而天皇對將軍已全失信賴之心了。天皇在西部藩閥導助之下，就作有力的集握政權。同時幕府代表在兵庫與外人談判立約的拙手，又爲國人所詬病。將軍審度時勢，就行辭職引退，雖則天皇一時不能打定主意接納此項辭職。

年少的將軍不久逝世，繼而執政者爲一成年人。他抱着滿腔的宏願要去盡量的採用西

法，光復德川的勳業，從事於海陸與江戶政府的改革，并接續以武力征服長藩；惟惜他起得太遲，難保其位了。當時全國民氣激昂，都以爲德川氏既無能力，應即交還政權出來。一八六七年將軍認爲如果再事保存這種兩立政府，於個人國家必同受害，遂請辭職（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四日），接着天皇就以敕令頒布廢除幕府。自此兩立政府結束。惟有少數德川氏的遺黨不滿於由幕府歸還政權於受西部藩閥支配的天皇。因起稱兵反叛，不久終爲忠心於皇廷的藩閥所平定。皇權的威嚴緣此增加不少。在七百餘年前賴朝最先創立的制度，不復存在了。天皇復直接的實握國政了。將軍退職後，尚健在着目覩以後種種的變遷，最後一位將軍的逝世距今不過僅有十餘年的光景呢。

參考書：Griffs, *The Mikado's Empire*; Brinkley,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Brinkley, *Japan, Its History, Arts, and Literature.*



## 第八章 國內轉變時期（一八五三—一八九四年）

### （一）政府的改組：從皇權歸還至中日戰爭（一八六八—一八九四年）

幕府的廢除就是日本新時代的開始。自此，政府的政策是依西洋先進國家的行程而改革的。凡致力於皇權歸還運動（即明治維新運動）的都以為天皇有容許西人入境的必要。因為他們勸告的力量，天皇就宣布他的意旨遵守將軍與外國所締定的條約，直接監督日本國際關係。可是在將軍未退職之前八個月，孝明天皇不幸崩喪。他在位時年齡尚幼，而於舊制度無不表示愛護。以他個人的意見來說，是極端反對外人的。孝明天皇而後，繼而登極者為明治天皇。（一）他登極時僅是一個十四歲的少童，於國政上，自然多受他的諸位顧問所影響了。到了他年長成人，就醉心於新時代思想。雖則他在位時，日本的進步，多是他的顧問官的勳勞；

然而他對於興革事業並不稍加阻難。明治天皇是極能勤勞，有機警，治事有條不紊，在在求進的人。他有好的判別力，所以能接受他人家的意見，能與各大臣於行政上得收聯絡之效。究竟明治天皇影響於當時的政策者果至如何程度，我們不敢斷定。不過我們可以說，若果他是一位少於機警，善於懷疑而又固執的人物，則當時的維新運動或許有發生某種嚴重的困難。日本近時史上或許有不同的記載。若果他在治事上不是慎思的人，或許會步後醍醐天皇的後塵，倉卒圖復皇權，敗事沈愁呢。

(一)明治是他登位時的名稱，他的原名常見於西籍者爲睦仁(Mutsuhito)。明治天皇生於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三日。

日本當時的西部藩閥可說是打倒幕府的重要的工具了。起初藩閥們對外國人的憎惡自不待說，可是經過了相當的時候，他們漸至信服，知道西人不能輕易被逐的了。薩長兩大藩閥自己經過西人破艦教訓之後，已知道番人一定要在日本居留下去了。姑無論如何憎惡番人；然而非有如番人那樣的戰器是不足與言競爭的。因此，藩閥們對外國人的心理，就由憎惡

而至羨懼，覺悟到要採用西法爲當時的急務了。他們自己的軍隊也開始要有現代新式的設備了。他們中誰都希望能繼德川氏而起成立一種變相的幕府；可是時代已過去了。舊制度的再生已不可能，要圖支配政府，就不得不用別的方式了。他們的黨羽聯同南方肥前土佐兩個藩閥操縱新政府。實際上，他們雖未能如德川氏那樣完全的操縱政府，卻能續持了許多年的優勢。現在日本的海陸軍權，仍爲他們所掌握。在政府中他們的勢力還很強大。日本的幕府久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跡了。國政方面已爲新時代的工具——部署組織 (bureaucracy) 內閣及元老等所主持了。

### 行政權的集中

擁護這一位少年天皇的多是急進分子，他們的人數日見增加。他們主張把國家完全的改組起來。他們在皇權歸還中，看到有發展成功一個歐洲式的君主與政府的機會。一八六七年的維新運動，就是他們的努力。他們中最多數的不是貴族，而是下層的武士階級。他們可說

是新日本的建設者了。舊制度雖說已是告終；然而在其中全部未告終前卻也有牠的抗力，全國人民的內心還是未能歡喜外人入境。可是無論如何，從那時起，日本在歷史上便是發展與轉變最迅速的時期了。所以明治在位時代，確可以叫做開明政府的時代了。(一)

(一)日本的習慣，制度，都是仿自中國的。他們的稱呼年日不是以世紀爲標準，而以朝名爲計算。故常有同一天皇而朝名幾更者。明治時期從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開始。該天皇登位於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崩於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明治時期告終。

日本從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九四年，當外交問題開始爲國人所注意的時候，內政的改革，還是比較的重要。我們爲研究上便利起見，可以把日本國內轉變的這個時期所有的要目分爲：憲政的發展，國際的關係，經濟的進步，心理，教育，文學的改革，以及宗教倫理上的變遷。茲試先說憲政上的更新。

幕府的廢除，可說僅是政府改組的第一步。當時已就覺到日本最需要的便是政權的集中了。日本倘沒有願望與西洋國家相頡頏則已，若則，非全國行動上好像一個單位不可。欲求

政府機關有詳密的組織，以便統率全國人民，就應設有單一的行政元首。當幕府廢除的時候，於政權集中上雖得行了第一步；然而僅是第一步。事實上在這新的制度下沒有適當的機關足資行政。日本天皇委托治權於幕府者，幾乎有八百年的光景。國家機關直受天皇監督者，也已是第七、八世紀時改革的目標了。成例久在，因而第一次（一八六八年）就有內閣的組織，這似乎是存意要模仿中國唐代制度的。在這一個組織裏頭的人物，都是西部的藩閥與皇廷貴族；然而無論如何，這不過是一種暫時的組織，以待較良的制度。這種組織，我們不能說十足模仿古制的。既然牠是一種議會的機關，既然牠的分子是武人與皇廷貴族。這一機關於一八六九年開第一次會議，實為日本仿用西方代議制的初圖。

一八六八年，日本國都就從西京遷至江戶（即今之東京）。現在的皇宮就是舊時幕府將軍的官邸。這種變遷有幾個涵義：（一）孤處生活的終止，（二）過去的錯誤，（三）天皇復握既委於將軍的政權。此後的天皇不復有如往昔那樣的虛有其名了。往昔的天皇是幽居宮中，現則公然駕乘出外露示面顏於臣民，而接受臣的敬禮了。國都定在東京於地理上幾是

全國的中心。國都設在口岸，尤足表示政府的誠意，接受外人來日交通，便利對外關係。政府對外，持此態度，再經天皇一通敕令，禁止軌外舉動。天皇公然迎接諸條約國代表之後，對外關係更加強固了許多。

維新之後，不久，天皇的顧問官便代他寫了一篇「誓言」由他宣讀，表示政府今後改革的方針。這篇著名的公文，現試約略的意譯如下：

廣興議會，公斷萬機。

上下一心，社會秩序，共力維持，文武一途，下及庶民，保障權利，無分階級，使各遂志。

舊時陋習，必須破除，天地公道，行動所依。

世界智識，力事研求，愈廣愈善，以振皇基。

從這篇誓言中，我們可以看出新舊的併合，和中西思想的調和了。舉凡孔子的宇宙觀，議會政府的思想，國家政權的集中，與其決心求智於世界等都無不包括在裏了。

這個誓言的發生，同時又有政府機關上的適應，如設立太政院，此其要者。太政院是一個

支配政府的機關，它曾行使這種職權者有好幾年的光景。

幕府廢除之後，接着的是新的時代，封建制度顯然是一種贅疣了。在德川氏治下因爲昇平無事，武人溺於奢侈，耽於晏安，勢力就漸失掉。他們中豪勇的武士與享有盛名的諸侯，至此已不能爲防禦歐洲強國多大出力了。封建制度，既是分權，而於國家團結和改組上，自然遇有困難了。幕府的廢除，武士們沒有將軍以資統率，兵權復爲天皇掌握，封建制度的持接至感困難。同時因爲日本維新的領袖，多屬武人階級中的比較急進的諸侯，他們極早就認識到舊制度的不應存在，起而開始作明白的鼓動廢除封建制度。這麼一來，每個封土，改由中央政府委派代表去統轄。東京政府的集權，始於此時。一八六九年適西南四大藩閥，自動向天皇登記在他們各所統轄的土地人民，表示歸還地方行政權於天皇。接經了一些足資仿樣的忠心的舉動之後，愛國之思，騰然興起。其餘的封建諸侯，竟先後自願的把他們的封土歸降。自此，日本不復是武士對於藩閥的忠服了。不復是散漫的封土的集體了。在德川統治之下，好幾百年所陶養的愛國觀念，和「武士道」所授誨他們的「忠心」，後來僅在數年中一與西人接觸，忠君

之思勃然興起，皇權歸還，纔見可能。然而，我們要知道，藩閥們之所以自願犧牲他們的治權，而歸還於天皇者，並不是真出自他們的本心，而是因為受當時改革家的脅迫。事實上，許多藩閥們已是僅有虛權的了。封建制度既漸崩壞，封土治權，就旁落於大臣或附庸之手。這樣情形之下，藩閥們自然不會不願以徒有其名的治權移交天皇了。況且中央政府答應依各封土過去收入的十分之一，付給他們，同時地方行政費又可不須他們來支付。諸封土移歸於中央政府之後，接經一八七一年的一通敕令，封建制度，就此廢除。

政府呢，對於前會做過諸侯與武士的一律許付他們以酬金。惟這項的支出影響國庫至大。因之，在這種酬金未行廢止之前數月，天皇顧問官就努力設法以求縮減此項支出。一八七三年政府頒布發行紙幣，公債，及縮減酬金的計劃。當時對武士們酬金縮減的比率，雖已規定；然而因為他們所得的酬金總數超過他們過去所支付於國庫的總數。他們中自願放棄此項權利者，大不乏人。一部分因為愛國心的激動，一部分因為不願有此計較，而另一部分則因為依「武士道」他們不願以金錢之爭，損失他們固有尊嚴。在一八七六年前，減縮酬金，就成強



迫性質，而世襲的武士階級之特受國家的酬給者，即此終止。

封建制度廢除之後，爲時僅有數載，已能設立一種十足中央集權的政府，而與西洋最有組織的國家並列了。第一方面，舊時封建軍隊的編織是由各封土專從武士階級中揀補的。可是維新後則這種舊的封建軍隊已行解廢，由各階級中揀充的中央軍隊成立。守衛國家的職務，已不復是某一階級的特權的了。當兵一事已不是由於個人的願意，而且是實行強迫軍事訓練與役務了。凡屬日本男性臣民年齡合格者，不問身分，不問世家，概須強迫當兵。這種新兵初仿法制，經普法戰爭後，又採德制。

關於軍役全國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舊時許多社會階級的廢除。皇室貴族與武人階級之間的懸殊，已無甚存在了。後來所產生的貴族政治 (aristocracy) 也是全國的，不復是屬於文武任何一方面的了。疇昔武士平民之間的區別，也已泯滅的了。在平民階級裏頭舊時也有等次的分別。一部人生來就受人們的唾棄。他們中的一人尤須受「非人」的辱待，可是維新而後，此等陋俗不復有聞了。武士們多自動的解下代表他們身分的腰劍與徽章了。其餘未快

解下者，也於一八七六年被迫一律解除。現在日本臣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新時代的日本領袖，多是由舊時的武士階級出身的。雖則他們的階級在法律上已無存在；可是以他們的品性和傳授的力量，新的日本還是他們最佔優勢，還是他們指揮國務。

日本當維新以前的地方行政，概由封建諸侯所主持。維新而後，有完密的「部署組織」。各部署的官吏，均由中央政府去任命，對中央政府負責。他們受委以主持全國行政的任務。在這種制度之下，國民中卑至販夫走卒，都是天皇直接代表所保護與監督的。起初，行政官吏自然多是由武士階級中選出來的。這因為他們當時是唯一受有行政訓練的人。後來考試制度成立，凡職位中有須由考試登用人才者，概以競爭考試法根據各被考人之學識能力，依次登用。這種考試是不分階級，不問身分的。凡屬日本臣民者均可應考。結果，進身仕途的多非武人階級的分。這種「部署組織」一部分是依第七、八世紀的先例而模仿的。另一部分是模仿西洋，尤其是後來模仿德制為最多。

維新運動中的領袖早就計劃要產生國家的法典了。因為在封建時代各封土的習慣互

相懸殊，自然不能適應於新時代的情形。矧且外人在日本境內享受的治外法權，似乎是當時日本的裁判所與法律性質上的反映吧。外人在日本境內不受日本法權的限制，於一般感覺銳敏的日人，簡直是憤悶不堪的了。他們爲了取銷治外法權希望的驅使，就根本着想以爲要求達此目的，須先移除治外法權究竟存在的原因。所以新的政府就以可能最短的時間，以西洋爲仿樣製定新的法典。約在一八七一年兩部刑法竟成。有些控告外人的案子，就依新律裁判起來。在這新的法典中如沒有外人認爲過苛或野蠻的「拷訊」不用陪審制，而行分科裁判。司法管理方面在在求有效率，果然嘖稱人口。

幣制方面也完全改良與統一起來了。我們要知道，封建時代日本流行的貨幣（銅幣紙幣）多種。紙幣是從中國學過來的。每一個封土都可自由發行紙幣。結果，幣制混亂，價率不定。新的集權政府就感於事實上之需要，纔設立全國統一的幣制。同時因爲商人階級的助力，幣制安定。每一個銅幣，每一張銀票都足以爲天皇與東京政府權力的表證。國家繁榮於是漸增。伊藤氏又被派赴美研究彼邦的財政，歸國後，就提議採用「一元十角，一角十錢制。」鑄造新

幣，依仿美國創辦國家銀行，發行國家鈔票。當培理來日的時候，銀賤金貴，交換價率，有四對一之比。外人於此就趁着機會捷手盡量的收買市場現金，藉條約的保護運輸出口。結果，情形益糟，金價更高而至一對十五、十六之比。可是後來活金收罄，賤價銀幣起而取代。當時日本的複本位幣制既遭破壞，實際上又復流為銀本位。一直到了中日戰爭之後，金本位纔行恢復。在許多年前，日本財政恐慌，因有改編銀行制度的必要，就把仿自美國的制度加以改變，設立國家中央銀行，仿歐洲通行的制度。(一)這種辦法，可以幫助政府便於管理全國銀行的組織，再可幫助政府發售公債及其他事業。

(二)日本銀行係仿比利時制度。

爲了要增加人民對天皇的敬意，神道教的復興就屬不可寬圖。在德川治下的早期，佛教比較神道教多得官方的贊同。或許這是因爲要假借以反對羅馬基督教吧。德川末年，神道教應時興起。要記着，這是對於皇權歸還上的一個最大的推動力。從一八六九年而後，佛教勢力益見日落千丈。雖則名義上尙受官方的承認；然而牠的優越地位已爲神道教所奪取了。神道

教也即自此而成爲日本的國教了。神道教對於皇室祖宗的勳業最重追念，同時，這種思想與愛國精神是相密切關係的。從信仰神道教中可以給與日本愛護國家的封土，愛護國家和熱心宗教可以合併起來注重於民族的意識與團結。

日本全國的郵務，已於封建制度未廢除之前開始了。後又由政府附設電信。交通既然靈便，而增進民族意識上，自是一個最有效力的工具了。全國學校的制度方面，我們下面當再多說一點。這裏我所望讀者注意的就是日本全國學校均受東京政府的指導，於國家團結上委實幫助不尠。

我們知道當時努力於政權集中的是若干有能幹的青年人物。他們幾乎都是專從武士階級方面出身的。在思想上，大致極早已就主張有許准外人入境的必要。他們以爲日本要求適應於新的時代，就不能不虛心仿學西法。他們對西洋諸國頗能認識，常冒險旅居國外或用功研究西洋文化。他們中最顯著而屬於皇廷貴族者有岩倉三條兩氏，屬於長藩武士者有木戶山縣伊藤與井上四氏，薩藩武士者有大久保與西鄉兩氏。餘一屬於土佐藩與肥前藩者有

沼濶守一大隈兩氏。我們如果要熟識新的日本，那末，至少要記着這班人物的姓名。他們中多是從南部或西南部來的，從維新運動中著名的諸封土而來的。在他們之下，政府爲南方諸侯所支配者爲時頗久。這些曾任過諸侯的人物，天皇對之頗能言聽計從。所以在政府中的文武官員，他們可得左右一切。後來，大隈與沼濶守一兩人竟脫離他們而領導自由運動。

### 新制度的阻力

政府的集權，雖比較上有驚人的捷速，並不是一二年的工夫而可成功的。日本政府的改組直至一八八五年間，纔告完竣。可是這種維新的進行，是難免沒有舊勢力橫來阻梗的。民衆方面，對從事維新運動的領袖，誠然日益同情，而實際上則幾乎每有一步維新的進程，就有遇着若干猛烈的阻力。在外人未得完全安然免卻仇外羣暴與執固人們的刀劍之前數年，縱然外人是受天皇特加保護的。但在東京路燈暗淡的街巷，夜間常有仇外暴徒，候守偷打來往大意的外國人。有一次英國駐日公使的隨員尙第一次去謁天皇，途中就遭着兩位武士辱打。他

們不惟仇外心強，而且對於維新運動，反對殊甚。所以做天皇大臣的常有個人性命的危險。大久保氏之死，可作一例。日本的維新運動，不是全國均慶得計的。許多保守的人民反對把日本過去光榮的風俗與法序，舍而不顧，徒慕西法。因之，反叛情節常有發生；然每次都爲政府所壓服。最後，於一八七七年，南方的反動勢力已膨脹而至登峯造極的有好的組織起來了。用兵彈壓他們反能增加新政府的權力。他們的領袖爲薩藩閩的武士西鄉氏。在維新運動的初期，氏身爲這種運動的要領之一。他主張「當兵」應爲舊時武士的特有權利，反對國家軍隊由各階級徵編。且因爲政府許准西人入境，同時高麗又宣布與日本斷絕邦交。西鄉氏就主張高麗用兵；可是既然外戰會阻礙國內改革，當時一般急進的要領決裂，憤而辭職，離開內閣，南行歸到薩藩的舊地去。在那裏他開始糾集一切失意分子，以他之才能，作個人的號召，果然聯合全部舊派武士力量，不久，竟能編立一支驚人的軍隊。大凡對新政府不滿的人們，都到他那裏去。同時又得前薩藩閩的熱誠擁護。到了一八七七年，他們就起而動兵作亂，反抗政府。而以西鄉爲首領。(一)東京政府爲平亂計，就下令派動新編軍隊，其人數之多有過於實際的需要。政

府之所以出此者，一部分是要顯示新制度的有效力於國人，另一部分則在能保操勝利。這一場戰爭，頗爲劇烈。結果叛黨敗北，他們的領袖之倖免戰死於沙場者，概行自殺。新舊勢力相比於戰地，新者尤示其優。總之，從各階級所徵集的國家新軍隊，既已大勝頑逆的封建亂黨。於此，與新時代對峙的危重的武裝勢力，就行覆滅。

(一)這裏應加說及的就是西鄉作叛黨領袖的動機，與確定的步驟，已成爲一個有爭點的問題了。

### 立憲政府運動

日本中央集權的成功，不過是其政治轉變上的一方面而已。維新開始後不久，有一個極重要而又饒有興趣的便是與西方民主思想接觸而產生的憲政運動。當時一切改革家，都是無不力求主張廢除封建制度和歸還皇權的。他們中有一派主張「專制政體」，助以「部署組織」。另一派則主張民選代表應握政府大權。能代表比較近於前一主張者爲普魯士制。大概保守的舊時的武士們，都贊和此議。實則政府權柄多由他們掌握。關於後一主張，所代表的



意見頗雜，不過他們的主要思想，尙是來自英國和西方其他有限君主國家的。依這種政制，政權操於內閣，復由內閣對民選的議會負責。

○「立憲政府」似乎在一八六九年天皇「誓言」中的所謂「興立議會，萬機決於公斷」已預先表有此意了。自然，此話在解釋上頗有爭執之點。因爲用詞含糊不明之故，我們又可以這樣解釋：「議會廣於召集，萬機決於公斷。」此一解釋顯有不同的意義的。有些人說，這一誓言已明白的表示須設議會政府了。又有些人說，這一誓言並無含有任何西方制度的意思。或許後者說法比較近當。這一誓言的起草人的所謂「議會」似乎是有意指封建諸侯與皇廷貴族的議會的。因爲當這誓言宣發的時候，封建勢力雖失掉了牠的首領將軍；然其本身制度，則大致尙存。武士和貴族，他們可以傳統身分的權力來會議；然而他們究竟不是民選的國會議員。這種議會的確於一八六九年，曾召集過的。（二）而其功用純然是商議的。換言之，這種議會僅是藉以確定武士與貴族階級意見的一個方法吧了。要知道武士與貴族階級在當時是在政治上最有經驗的人物。可是他們的會議是令人捧腹的。出席的人，既無甚尊嚴，而同時又

了無成績可言。政府的主持，則端賴其他機關。議會是虛設的。一八七〇年議會延期，於一八七三年，竟行解散。

(一) 叫做國議會。

在天皇誓言中所涉及的制度，因為尙未實現，一班維新家後來就根據這個誓言加以解釋，謂大有權力的國議會，已在誓言中應許了。一八七三年日本的政治家瞭解西洋制度，比較他們在一八六九年進步得多。他們派員赴歐美諸地考察政情。歸國後其中一位(一)就在政府中向他的同僚呈出一篇覺書，主張採行「君主立憲」政體；可是在這篇覺書中並不說明實行這種政體的任何一定機關。從這篇覺書呈出之後，便是日本代議制政府真正競爭的開步了。接着的發展史是饒有趣味的。然而這裏我們只能把其中重要的綱目來略加申說呢。當時努力於這種憲政運動的，要言之，可分兩派。第一是急進派。他們主張採用西法，捷快的和廣大的把日本西洋化起來。同時又主張從外人的標準來看，凡屬古怪和不雅的風俗制度，概在必除之列。他們希望日本抄襲西洋文化，使能馬上得與西洋國家同列於強國之林。這派以青

年學者最居多數。他們中有留學歐美者，有從國內新學校出身者，有作報紙主筆者，有些常閱西籍，或在條約商埠與西人常相過從者，有些信仰西洋最過激的政治思想者。他們讀了鼓吹法國革命的書籍，如盧梭的民約論（*Social Contract*）等，那能不受影響呢？可是此中我們要注意的，就是姑無論他們所染的思想如何過激，卻從未有人在日本倡過廢除君主的論調。可見日本帝制在人民思想上的根深蒂固了。許多急進分子所主張的是設立內閣。內閣所有一切行動須對民選的國會負責。第二派是一部分官僚政客の集合。他們與在朝的政客決裂之故，意在從事鼓動掌握政權。他們顯然把憲政運動來做題目，圖謀傾覆內閣或迫逼內閣使與他們妥協。

（一）木戶。

一八七四年春一班政府重要官員對政府對高麗所採取的政策，主張不負責任。他們上了一篇覺書聲明反對各部行政要領的任意作爲，並主張由民選產生國會。在這班反對政府的人物中，我們應當記着的是後來爲憲法而奮鬥頗具佳績的沼淵守一氏。政府當時對他們

的爭點，表示讓步。顯然是一方面有望他們給政府的擁護，另一方面又可阻止他們後來作更遠的要求。雙方和議（二）一致主張對憲政上作重要的變更以便達到代表制度的政府。結果，成立了一個耆老院（二）（有如立法機關；）可是這個機關僅有權討論，無權建議。該院議員不是民選，而是限於貴族與官僚階級中所任命出來的。同時又根據着分權的原則改組政府，設立高等法院，使立法行政司法各權分立。這顯是受西洋盛行的分權學說所影響的。加以，諸府縣議會又將召集。目的在與東京政府接觸，以便後者知道各地人民的需要。這些改革雖得實現；然而卻沒有關於「民選」的規定。他們所說的代表只是治人階級的代表了。只是努力使天皇左右羣臣更合格的掌握絕大權限的了。他們之所以僅有如許改革者，也許以為日本當時尚未預備，不能安然收更進一步的革新的好處吧。

（一）即在一八七四年的所謂「大坂會議」。

（二）耆老院與元老不同，也不相關，讀者望勿混看。耆老院是後於元老而成立的機關。

一八七四年政府所期許要改革的，自然不能常久為維新家所滿意了。既然耆老院與府

縣議會都是代表治人階級的機關，都是易爲內閣所支配的機關。那末，傾向民主思想的人，安能甘於默守？所以，一八七七年爲憲法問題而鼓吹的運動又起，且較從前更爲厲害。參加這次運動的人，也不限於失意的官僚了。他們在繼續的與西洋民主主義接觸之下，急激的思想已散布了。許多主張代表制政治團體也已組織起來了。他們演講家，煽動家四出鼓吹，喚起民衆。這種運動的進展愈恆緊張。於一八七八年政府一位主要的大臣大久保被暗殺後，政府就作部分的退讓，公布組織地方議會。地方議會是民選的機關，各議員概由人民選舉。每一個府縣都有一個議會。其功用僅爲各該府縣行政首領之諮議。每一議會，每年開會一月，有權討論地方課稅和支出，有權審查地方財政收支賬目，並對中央政府有請願權。這許多地方議會，以整個來看，成績頗好。後來（一八八〇年）村町也有類似的組織。雖然他們有時與中央政府的代表發生衝突；可是他們是代表人民對於地方行政的喉舌，同時也即無殊爲國議會而設立的訓練所呢。

地方議會的頒定，還是不能緘諸維新家的口。在國會未規定以前，他們所要求的仍在緊

張。因爲繼續與西人交接之故，西洋的革命思想，已由口頭上傳播起來了。各地團體也上了多次覺書，要求成立國議會了。同時維新家又開會示威，標明重看這項要求。許多新辦的報紙也爲此出力，廣事鼓吹。最後，於一八八一年十月政府應許諸團體的要求，就以天皇的名義頒布定於一八九〇年召集國會。次年伊藤被派出洋考察泰西各國所採行的政體。伊氏歸國後遂爲憲法編纂委員會的主席，產生一個類於西方的憲法。

這裏關於伊藤者，似有略加申說的必要。伊藤是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中日本一位最有聲望的政治家。他起初僅是長藩下的一位武士，早年有與他的首領一樣的仇視外人。可是不久就自覺到日本應仿法西洋，力行改革之必要。決心伴同井上及另外三位友人於一八六三年違犯皇諭冒險地潛逃赴上海，由上海轉赴倫敦。當時日本政府尙嚴令禁止人民出國，違者輒罪。伊藤同其友人以國家前途爲重，故不顧一切的負着他們的使命到倫敦那裏去。在那裏，他與井上費了一年的光陰從事研究。後來因爲長藩與西洋諸國撥難，伊藤倉忙歸國，以期阻制他的封土以內人民，免對外人發生野蠻的舉動。可是他對此所圖者不能如願。竟有一次他

幾有性命的危險。到了維新之後，日本已明白及認識新的時代了。伊藤於此就捷登高位，而爲東京政府的重要角色。

### 政黨的構成及其鼓動

自一八八一年政府宣布要召集國會之後，三個政黨遂先後應運而起。他們要預備着去領導憲法下的政府，及依照憲法的規定去實現他們的行動。日本政黨最先構成的爲自由黨。其領袖人物爲沼澗守一氏。氏爲早期幫助領導國家經過皇權歸還的維新家之一，又是一位熱心擁護民權的人。他的政黨所代表的是極端的急進分子。所以，他有日本的盧梭之稱。和他的政黨所主張的雖然是重視人權；然而究竟他和盧梭並不是一個正確的比擬。有時他的黨中的比較急激的分子，竟主張用強暴的手段去進行他們的主義，並常以尖刁惡毒的詞鋒去攻打敵黨。

其後，跟着自由黨而成立的是改進黨，以河野大隈氏爲總裁。大隈也是起自武士階級的。

早年兼通荷德文字，堅信日本有改革的必要。他曾做過大官，在政時期比沼澗守一還要長久。在薩長兩派的武士把持政權之下，大隈最後憤而離政，就去組織政黨，期使能代表民衆的人，到政府那裏去掌握政權，好減弱薩長兩派的勢力。我們知道改進黨是主張代表政府中的比較中庸的一派。他們所主張的是：（一）人民的投票權逐漸推廣，（二）發展地方自治，（三）採取國內改組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及（四）設立健全的幣制。這種黨綱自然會引起廣大的同情而反對薩長的寡頭政治的。因為人們對改進黨的同情之故，而沼澗守一及其黨徒所標示的主張不甚惹人注意。

第三個是立憲帝政黨。這是若干保守分子所組織的。他們所主張的略如：（一）擁護皇權，無論任何事情，倘對皇權有不利者概行反對，（二）選舉團之嚴加限制，（三）天皇對一切立法有絕對否決權，（四）設立兩院制，反對比較民主的一院制，（五）司法應該獨立，（六）海陸軍人員不得干與政治，及（七）言論集會自由。這一個政黨的組織，在時間上雖暫，在黨員數目上雖少；然其在朝握政的與在野擁護的黨員均能人同一心，所以他們所標明



的黨義比較他們的敵黨爲有力量。日本的現行憲法中，我們可以找出他們所主張的意思來。這幾個政黨構成之後，幾個月中政黨鼓吹，頗盛一時。每一個政黨都向人民宣傳牠的主張。羣衆集會，隨所多見，同時許多急激的報紙，對他們所愛護的主義竟作過大的爭論。我唱你和，我攻你打。鬧得一時天花亂落，社會騷然。政府於是就不得不採取高壓的手段了。經了政府彈壓之後，公會，報端，漸趨緘默，全國空氣一時纔略示緩和起來。那時的日本人還是不慣於西洋的制度，言論集會上須自約制的。要知道，這種「約制」是在民主政治國家維持秩序方面不可缺乏的。所以，日本人那時還未能預備採行類於英國那樣的政黨制度。

### 憲法準備前的變遷

伊藤於一八八三年從歐歸國後，幾乎馬上就開始準備改組政府，準備採立憲法。他在外國所躬親考察的一切「有限君主政體」(limited monarchy)中，惟以德國政制給他的印象最深。伊藤受俾斯麥的影響極深。他以爲德國政府的精神，專制帝皇的風習，以及訓練有

素的行政官吏等情形，較其他西洋強國爲與新日本類似。我們可以從他改變日本制度方面看出他受這種信念的影響。日本皇權歸還而後，貴族階級已公然廢止了。到了一八八四年伊藤又把貴族階級恢復起來。後在伊藤自己看來，此舉實在得計，因爲恢復了這新的貴族階級，可以作爲上議院預備的初步，可以當一種工具來使政府獲得有力的穩健階級的擁護而加鞏固。新的貴族階級，約有五爵。受爵的人大都是舊時皇室貴族，舊時封建諸侯，以及維新運動顯有勳勞的人。

第二步是模仿德制改組內閣。日本的首相有如德國的內閣總理 (chancellor) 指揮其他諸大臣，并於主持整個的行政上負完全責。登用行政人才，則以考試爲根據，自此而後，政府任用文官僅以考試被選者爲限。一切考試，凡是日本天皇臣民者均可參與。這種變遷，目的在能使行政官吏，真能代表全國，以及祛除舊時武士階級對於政府官位的壟斷。

日本現行憲法的編制，不是委託於人民代表的大會，而是由伊藤等若干人動筆草成的。憲法的頒許與產生，僅視乎天皇的意欲，全國人民絕無參與意見的機會。伊藤草這憲法的時候是慎守祕密的。所以其中各步的進行政黨機關報無從得而苛評。伊藤等委實費了不少的時間，最後，於一八八九年這一個憲法纔告完全草成。後得天皇的核准，并於莊嚴盛觀的典禮中頒布之。

### 憲法的內容

日本憲法的重要條文略述如下：

第一，帝制的重視。日本天皇是萬世一系的。他是一切權力的來源，一切主權的所在。他核准凡所通過的法律，并以敕令頒布及執行之。天皇召集，延長，及停止國會，并得解散下議院。在國會閉會期中，天皇得發布可代法律的敕令。天皇為全國行政之首，任免文武官員，決定文武官員的俸給。他統率海陸軍，并主宣戰，議和及締結各種條約。他授與爵位，和有權敕令赦免罪

犯。換言之，天皇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可是實際上行使上述權限的都是他的諸位大臣。各大臣所向負責的是天皇，不是國會。天皇對諸大臣的行動，隨時都可干涉。然日本天皇從來未曾如德皇那樣公然干與或指揮過國家行政。從許多方面看來，日本天皇僅是位而不治的。就在新的政制之下，他也沒有顯然的行使過任何權限。遇有政治上的重要事件，天皇通常必與樞密院或他的大臣商榷過，而後纔行。他的位與英王又有不盡同的地方。英王的行動有受國會的牽制。日本天皇則有不然，他的權力不是由國會的意志而來的。以憲法而論，他如意欲隨時可得直接行動，不如英王之仰息國會的那樣可憐。日本在封建時代一切政府都受治於將軍，所以現在則受治於內閣與樞密院了。天皇在德川前參政實多，惟惜後來情形就不大同。

在憲法中關於臣民的權利義務，頗有規定。臣民均有納稅當兵的義務。權利方面規定於憲法中者較多。依律所定，日本臣民任職公務，移居自由。臣民住宅如非違法，不受搜查。言論，集會，著作，結社，信教倘在法律範圍內，不受政府干涉。一切臣民如非犯法，不受逮捕，非合法的法官，不得審問。臣民財產，法律保障，不得侵犯。臣民請願，也憲法上所認許的權利。我們要知道日

本憲法中所給與於人民的這些權利，固是在封建時代所夢想不到的；然而這些權利的授給，不是如我們從字面上看來那樣沒有限制的。按諸事實，這些權利都是多受普通法律所限制的。因此，政府如遇必要時，欲把牠們減縮起來，並不是困難的事情。

日本帝國議會分有兩院：一爲貴族院，一爲衆議院。貴族院以皇族分子，公侯兩爵貴族，伯子男三爵各級代表，國內賢能爲天皇特別敕任者，以及納稅最多額的人民的代表，共同組織之。這顯然是一個保守的機關了，是一個大可牽制衆議院的過激的傾向了。至於衆議院則整個是民選議員所組織的。衆議員係由各選舉區所選舉出來的代表，各選舉區的人口幾乎是相等的。至少於原則上當是如此。晚近，因爲有財產資格的規定，選舉權已受限制了。帝國議會每年召集一次，會期雖可由天皇敕令更動；然而普通以三個月爲限。兩院議員在議會期中，言論自由，不受逮捕。一切法律應得兩院的同意。不特議會有創議權，而政府（譯者按：普通所謂政府係指內閣）也有這樣權限。政府要徵收新稅，先須得了議會的同意，每年預算須經議會的通過。然而議會對國家財庫，並無全權。因爲一定的事件如官員薪俸的支配及皇室經費的

支付均不在議會法權之下。倘如議會拒絕通過政府預算，政府可以依照前年度預算施行。天皇有立法上絕對的否決權限，議會有質問政府的權限，議會議員卻可以向內閣各大臣提出責難。同時兩院又各得上奏天皇，爲他們訴苦和彈劾大臣。惟是日本議會的權力是不能與英國國會比擬的。日本內閣並不負責於議會，而議會又免不得天皇的支配。加以日本上議院在許多方面牽制下議院頗見效力。既然上議院是保守的，那末，自能阻止下議院所通過的急激的法案了。

日本的樞密院與英國樞密院不同，前者不是虛設的，不過已成爲缺乏權力的過去的陳物吧了。在這樣情形下，日本內閣乃應運而起。我們不能不承認日本的樞密院是一個特別機關。牠是由天皇任命而產生的，是爲着應天皇諮詢而產生的。內中的顧問官，都是國內素享盛名的政治家。內閣大臣也有出席該院的當然權。

元老在日本不是成文憲法中所規定的一種制度；可是在不成文的憲法中，他們是極重要一部分呢。所以我們談及樞密院時，就不能不連帶的涉及元老了。元老不是政府的正式官

吏，而是於維新運動中領導主政的一羣武士。他們極得天皇所信從，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力量，和他們過去對國家那樣的勳勞，故能為全國人民所倚重。元老的功用，可以說純然是顧問的。可是當國家遇有危重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在政治上較樞密院、內閣，或國會還比較來得重要。當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和二十世紀的初年，他們的勢力是很龐大的；可是他們如當一種制度來說，因為原來的一羣元老的死亡之故，已捷快的向着絕滅的道途上跑了。一九二二年他們僅存的四人中又死喪了一半（譯者按：現在僅存西園寺公一人。）因此，日本元老已不能接續的為日本政治中有力的要素了。

內閣，是政府行政方面的機關。內閣行政僅對天皇負責，而與國會於責任上不相關係。內閣的領袖為首相，地位最重要。這種制度是從德國抄襲過來的。

司法方面，一切法官都是任命的。其任期之久暫以該法官個人在任之成績如何為斷。日本有如歐洲國家，另有行政裁判所的組織，審理關於行政上的案件，或與政府官員有關係，而為普通裁判所法權所不及的案件。

這一個憲法是東亞君主國中最先頒定的。可說是西洋自由的民主思想進入專制的遠東的先例了。雖則在現行的憲法中保守的思想尚濃；然而牠是有伸縮性的。在實際施行上或可同人民的政治訓練而變遷，同時對原來的憲法又可不發生更動。我們從日本的內閣責任方面看來，尤見言之不錯。

日本於一八八九年所採定的憲法，從整個的實行方面看來，頗得差強人意。牠的重要的弱點，實在的弱點，在於上下議院的衝突，特別是下議院與行政機關的衝突。除了與外國發生戰爭，如一八八九年後幾年中爲了對付共同的敵人，政黨與內閣協力合作之外，都是常相鬪爭的。可是後來政黨已漸使內閣有如英、意、德等國制度一樣的對下議院負責了。有許多時他們似乎於內閣責任上獲得成功；然而多是失敗的。雖則內閣常對下議院一些議員給以有問題的退讓，而得他們的擁護和友好。

### 政黨與內閣間的鬪爭



日本政黨與內閣的鬭爭，始於第一次國會的召集。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的期中，起初政黨的聲息寂然，降至憲法採行至少就恢復了兩個政黨。一爲沼濶守一統率之下的「自由黨」；一爲河野大隈統率之下的「進步黨」。兩黨均主張內閣應負責於下議院的。同時又有反對黨的暫時聯合。選舉的進行，並無騷擾。人民對選舉的興趣，也頗普遍。在多半的選舉區，每一個議席，都有三四個候選人來競選。當時投票權雖嚴行限制；然而在五十餘萬投票人中，實際投票的，竟佔多數。在下議院佔多數議席的極能代表社會各階級。從前做過武士的人甚多，因而在下議院中，他們就佔多數。總之，全國重要的各階級人民在下議院中的代表，都有合理的比例數目。日本下議院的議員與美國國會議員不同，他們多數不是法律家，雖則上議院是個有尊嚴而又保守的機關。

我們知道日本國會的召集，多是當反對黨開始與政府爲難的時候。按照憲法的規定，政府每年預算，必須提出國會通過；可是預算問題似乎正是最易爭執的要點，而且爭執最烈的要點。因此，自由黨與進步黨兩者在國會中，各有支配國庫力量的時候，就是他們凌制內閣命

運的機會。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勢必受迫妥協。答應反對黨三分之二的要求了。內閣當受迫承認政黨勢力的時候，並不是對他們的爭點上表示退讓，而負責於衆議院的話說。所以國會與內閣的鬭爭仍未減縮。最後，倘政府一怒之下，不得已時只得行使其憲法上所給與的權力，以天皇之名解散國會了。

當第二次選舉國會議員的時候，政府力謀支配下議院。無論是合法的，或非合法的（如行賄、威嚇及壓制等）手段，如果對於支配下議院上有所增補的，均不惜採用。他們的目的是選出的衆議員多是擁護內閣的人物。政府雖然有時採取一些險辣的手段；可是當國會開會的時候，在議院中擁護政府的議員，仍見少數。加以政府採用種種非法手段支配選舉之故，威信大減。同時立法與行政機關之鬭爭，依然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而爭執之點依然是財政。上議院與下議院在衝突時，雖則前者常是一致的擁護政府；可是內閣的地位既有如許的困難，改組自屬必要。起草憲法的伊藤氏於是受任首相改組內閣。要知道這一個內閣還是不能退讓不能調和的。最後，伊藤氏爲着滿足他的要求起見，就行縮減國費。勸導天皇頒給詔書說明自

願將皇室經費十分之一撥歸國防之用，同時勸各官員均作類似的犧牲，並請國會扣除成見，實與政府合作。伊藤氏復作進一步的刪減政府經費，並與沼澗守一及其他重要的自由黨人協商獲得他們在下議院擁護政府。伊藤氏如許熱心努力，結果，簡直轉移反對黨對政府預算的攻打，以天皇所發表的欽旨去限制他們的行動。轉移他們的注意到政府政策的其他要點上去。他們所心向的是採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去阻擾與揅打當時的寡頭政治。政府一日不答他們所要求的原則，他們一日不肯罷休。後來，政府爲他們所強制而歸失敗。第二次國會遂與第一次同樣的被政府所解散。

第三次衆議院於一八九四年選舉結果，依然是在野黨獲佔多數。伊藤氏雖得自由黨人的擁護；然而因爲他對政黨政府原則顯示退讓之故，從前助他的人，此刻竟憤恨他。參加反對黨與他爲難。所以這第三次的衆議院又同過去一樣的幾乎陸續不斷的與內閣不洽。後來竟因政府的外交政策引起衆議院的猛烈攻擊，並議決上奏天皇表明不信任當時的內閣。國會於是復被解散。

### 中日戰爭期中政黨的暫時調和

新的選舉尚未舉行，中日戰爭已就爆發。日本人的愛國精神常是極好的。當國難的期中黨派權利可以犧牲。中日戰爭，日本國會就一致團結擁護政府，向公共的敵人進攻。第一時期的責任內閣之爭，因此遂告結束。我們顯然知道國難過去之後，舊時的鬭爭必至恢復。不過我們所希望者是在現行的憲法之下，無論是政府方面或政黨方面，都應該作無條件的退讓纔可。內閣的行爲不應有何自私自利的動機。可是牠的領袖都似乎以爲日本產生對國會負責的內閣當非其時。關於較詳的這種鬭爭史實，我們當在下章述說。這裏恕不詳及。

#### 參考書

- Griffs, *The Mikado's Empire*; Brinkley, *Japan, Its History, Arts, and Literature*; Brinkley,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McLare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during the Meji Era*; Okuma, *Fifty Years of New Japan*.

## 第九章 國內轉變時期（一八五三——一八九四年）

（三）外交經濟教育與宗教的變遷：從皇權歸還至中日戰爭（一八六八——一八九四年）

### 日本與西方國家於外交上關係的成立

前章我們已經討論過日本從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九四年當中，因西人入境引起政府的組織和精神上的轉變了。我們這裏對日本外交政策的沿革，頗有興趣。在德川家康治下的政策，可以簡單的說是一種「閉關自守」的政策。到了培理來日之後，這種「閉關自守」的狀態，就成爲非速終止不可的事實。自然，要使日本全國都能認識這樣事實，非是一旦的事情。可是他們一認識了這種事實，即決心適應於新時代的要求。政府許准西人在東京設立公使館起來了。天皇依諸大臣的奏勸，也開始躬親迎接外使，期與諸國作友好的邦交了。同時，也在各

通商口岸設立交涉署了。自此而後，這個島嶼帝國在外交上已就依照西方國際關係的慣例了。

### 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思想的勃興

日本的國家主義，甚至遠在德川統治時代已微弱的發長了。降至十九世紀後半期與西方強國接觸之下，愛國思想正如雨後春筍，勃然興起。於此，就從事於政治上求中央集權，改組全國。在外交上約略言之，有三個方向：第一，國內的保守分子以爲西人是蠻夷之族，不可與相接觸。他們所希圖的是恢復舊時的閉關自守政策；可是除了一班無組織的武士們誤用熱心於這種政策之外，所謂閉關自守的思想於一八七〇年以前，已實際上失其存在了。第二，帝國主義思想的興起。日本人於國內政治上改組後，向外發展的思想，是厲害的。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開始以來的戰爭與外交，都是他們的帝國主義思想所演成的。第三，要求與西方強國同等看待。這是從他們的民族自誇心理發露出來的。他們不受國外任何民族的歧視。要求

自主以修改條約的方法收回關稅權與司法上的自主權，取消治外法權。因為他們要與西方諸國同等看待之故，引起他們強烈反對美國在美領太平洋沿岸對日本僑民的待遇。

皇權歸還之後，我們從日本人的要求中，可以見到他們的帝國主義的精神了。他們要求凡日本人所居住的地方或天然屬於日本羣島的地方，均應歸由天皇政府所統轄。所以他們早就爭謂琉球羣島、小笠原羣島、千島列島、薩哈連與蝦夷諸地域應盡是日本的；甚至高麗，因為秀吉的侵伐和高麗按期派使進貢於江戶皇廷的關係，竟視為他們的屬國。蝦夷更不待說。在德川時代蝦夷已為一位北方藩閥與家康所統治了。蝦夷的人口大部分是土著的蝦夷人，日本人甚少。為統治上的便利起見，日本政府現時已特設機關以資監督該地行政，並曾採行有力的殖民政策了。這種政策的施行，蝦夷地方已就極神速的成為日本過剩人口的方便的出路，與日本邊疆的省分了。至於日本人的帝國政策施之於薩哈連與千島列島者不大見效。為的是因有俄國的爭逐。日俄糾紛緣此而起。到了一八七五年纔雙方立約，結果，千島列島歸屬日本。薩哈連歸屬俄國。薩哈連於俄國是個隘要之地。不獨可以支配西伯利亞的東岸，且可

操縱交通要道的阿穆爾河口呢。小笠原羣島是太平洋荒廢無人的地方。其有重要之可能者是因爲該地可爲海軍與商業上的場所。日本有見及此，遂於一八七八年不費一兵一卒的佔據該羣島。

琉球羣島的情勢比較的有困難。以該島人民的種族和文字來說，則近於日本。該島在日本封建時代已爲薩藩閣所克服。並視爲他的屬地之一者，已有二百年之久了。可是該島久已開始派使北京進貢於中國。同時又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該島曾與中國訂立條約。一八六八年日本竟斷然聲明琉球爲日本屬地。到了一八七一年若干琉球人，遭台灣野人殺害。日本出而追究。當時台灣爲中國屬地，日本宣稱琉球人爲日本臣民，要求中國賠償損失。中國官方否認日本在琉球的勢力與否認日本有究辦台灣野人的法權。日本對這樣答覆表示不滿，遂於一八七四年出兵佔據台灣南部。中國提出反抗，日本要求賠償。兩國相爭幾至用兵。最後，中國表示讓步，賠償損失。日本纔行退兵。可是當日本已迫求琉球王交出過去與西方諸國所締立之條約，接受日本統治。迨一八七六年，日本的行政權就及琉球羣島，使成爲日本帝國之一部。



分。中國依樣提出抗議，聲明不滿意日本割據琉球；然而日本後來潛事進行，終至併吞該羣島而歸所有。

### 日本與高麗的關係

高麗的情勢較琉球更爲困難。高麗在許久以前，曾與琉球同樣的認中日兩國爲朝國。高麗一方面派使進貢於北京，另一方面又派使進貢於江戶。可是因爲地理上中國與高麗接壤，且係東亞強國，從歷史上說來又是文化的發源之地。所以高麗對日本自然不如對中國比較的敬服了。加以日本秀吉征伐高麗時的殘酷行爲，已成爲高麗人永遠不忘的怨憎了。於是一八三二年就終止納貢日本，於一八六八年與一八六九年竟慢然拒絕迎接日本的公使。這種態度簡直惹起日本對高麗半島的野心。同時日本一班政治家目擊俄國新近（一八六八年）獲得烏蘇里河以東的土地，並在高麗之北的海參威開設商港。他們極怕懼俄國的侵害行爲。况海參威地過嚴寒，滿冬結冰的港口，誰也知道俄國必不自足的。日本呢，既握有從海參

威至太平洋的兩條必經之道。狹小的一條是位於蝦夷與日本本道之間；另一條較寬大的是位於高麗與九州之間。俄國對屬於日本的對馬與壹岐兩小島嶼久已垂涎了。當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中俄國會一次要佔據對馬，後因英國反對而中止。俄國欲得高麗是無庸疑義的。高麗既是一個弱小，退化，而又政府腐敗，行政缺乏效率的國家，如非得外來的助力是不能爲的。俄國如果佔據高麗，則日本自然不安其位。日本遠有眼光的領袖因此就極主張捷足先佔高麗；可是大多數參與維新運動的政治家，不甚表示贊同。他們以爲無論日本的大陸政策，須等國內改組幾得蕺事時纔可確定。結果，這種主張竟引起西鄉與政府決裂，參加薩藩的叛。可是無論如何，日本政府是不會忘懷於高麗的。適一八七五年一隻日本船爲高麗砲台發砲射擊，天皇顧問等議定主張日本有採取軍事行動的必要。次年出兵征伐高麗。日本做培理一八五三年施於日本的方法轉施於高麗。與漢城締立條約。而時中國對於高麗之獨立與其他國家訂立條約，不加反對。日本於是就將高麗門戶開放於外人，並開始鼓勵，啓示高麗人民接受西洋思想，履行改革。不久，高麗就接與西洋諸國立定通商條約。高麗商業發旺，維新政黨，

緣此而起。中國人心目中對日倭在高麗這種活動，自然有所不悅。我們知道當時中國還是遠東保守勢力的堡壘。中國袒護在漢城的反對黨。中國政府派有常駐監督在高麗，代表中國政府在高麗的主權。日本呢，自然是護助維新黨的。因此，兩黨衝突。一八八二年，保守黨人攻打及燒燬日使館。館中人員均倉卒逃亡。這件事情發生後，日本得受賠償損失，要求許准日本派兵保護日使館的特權。到了一八八四年保守，急進兩黨又相衝突。前者受中國的袒左，後者受日本的導護。一八八四年中日兩國均同意各自退兵，並協定條約，大意謂：「倘高麗發生任何危重糾紛，中日兩國各得出兵，這項出兵，事前應互相通知。一俟糾紛事件解決，各宜如約退兵。」爾時高麗情形漸定；但保守，急進兩黨尙接續鬭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就係緣此而起。

### 關稅與司法底更正

日本因犧牲了司法和財政上的自主，感痛之下，不能不起而作修改不平等條約的運動了。當那些不平等條約締立的時候，日本的法律還是封建時代的法律，西方國家自然不願許

他們的人民受日本地方權的干與。泰西諸國就與日本議約，凡被告人而屬西國人者，應由其所屬國之駐日領事根據該國法律審理。所有外人都限居於一定的條約口岸。這種治外法權 (extraterritoriality) 已行於中國與土耳其了。可說是西人用以與非耶教國家於條約上關係的題目。

關稅呢，也如在中國一樣的有正式條約的規定，以免常時任意更動。日本人感到治外法權和關稅喪失自主是日本人低等的標號，那能爲愛國者所容忍？況且，在治外法權之下，外人犯罪而損害日本人民者，常不受罰，同時領事裁判所設立過多，尤其是那些較小國家的領事裁判所管理方面腐敗不堪。關口稅率盡由外人自定，雖說值百抽五，然按諸事實，日本所抽得者僅及其半。日本的財政是異常缺乏而孔急的。可是這種絕對正當的財源，竟被外人所損害。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開頭就策思取銷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一八七一年派一大使赴歐美爲這件事請求各國同意。當時日本法律與法庭還未改革。一八七八年美國許准日本修改條約，如其所求。可是這種條約的修改，必須俟至其他諸國均有類似的讓許時，纔發生效力。後來，因

爲歐洲諸國不表同意，日本外交部於是就準備邀請各國在東京的代表會同討論。前後共有兩次：一次在一八八二年，另一次在一八八六年。不幸兩次俱敗。西人以爲日本尙未準備至可以信賴能於外人性命財產的保障。當中，日本思想界又從事於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一八八六年那一次的會議，雖則同意擴大日本裁判所法權及於外人；可是有這樣規定：凡與西人有關係的案件，應歸於有外人裁判官的法庭處理。這種規定自難滿足日人的。

日本人連接不斷的要求修改條約，同時又下決心改良全國制度，使能適合於西洋的標準。他們要做在文化制度上能與西人同等，俾西人無所藉口的地方。所以，力求歐化，提倡新教育，模仿西洋立定法律，民法則仿西洋的普通原則，商法則仿自德國，刑法則仿自法國。裁判官以專門研究法律者任用。任期長短，以該法官在任成績爲標準。一八九〇年，這些法律就爲天皇所批准。

治外法權所以存在的理由已迅速地失掉了。西洋各國顯然沒有道理再能保持這項特權了。一八八八年墨西哥就簽約許日本有司法上之自主。美國則一俟歐洲強國同意，也自願

放棄其權利。日本下議院當時繼續要求內閣趕快與各國談判，政府就以此問題直接與歐洲諸國政府從事商榷。最後，於一八九四年大不列顛乃許可如日本所請求的修改條約。大不列顛的貿易在日本最多，僑民也繁，且又是向持反對日本改變的強國，大不列顛既然放棄其權利，美國自也隨而採取同樣政策。這些強大國家先前示例之後，爲時僅三年其他國家也相接受。步武歸還日本以司法上之獨立。日本的整個改革既有這樣的神速與效力，自然各國無所憑口了。所以，各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於一八九九年，便全廢除，領事裁判所及外人租界也不復存在了。一切西人均受日本法權的管轄了。總而言之，日本人已經證明可深信托的了。司法自主之後，接着的是關稅自主的問題。這一個問題在一八九九年已解決一部分了，關稅自主已作部分的收回了。雖則遲至一九一一年始完全的發生效力呢。這不能算是歷史上亞洲國家與西洋國家同等看待，而列於強國之林的先例了。可是，這種卓越的成績，都是日本人愛國精神和才能所賜與的。

日本政治上的改革與新國際地位的提高，是從培理來日至一八九四年中最重要的事

件了。普通國家的改革都是由於人民的倡議，可是日本則不然，一切活動都由政府去指導。這是最具特色的。我們要知道這政府的組織，政策與國家地位的變遷，都不過是日本民族生活中諸種向上轉變的一部分。日本與西方接觸之後，已於商業上，財政上，運輸上，工業上，服裝上，思想上，教育與宗教上均發生革命了。有些地方所受的影響，比日本千餘年前受佛教與中國文化影響的尤為深切。我們這裏可以這樣的說，日本許多方面的改革都是政府領導，人民服從，富有愛國精神的服從。

### 經濟的改進

從培理來日簽約通商之後，日本商業自然一蹴興起。甚至在培理條約未成立之前，商業方面，已有多大的進步了。所以到了一八八七年日本的國外貿易竟超過五十百萬金元。可是日本既久在閉關自守，一旦與外通商，自然不是馬上可以提高他對外貨物的需求，及其購買能力的。至一八八一年因為貿易上不均衡，就給日本以危重的問題——現金漏盡。一八八七

年之後，一部分因爲政府的有力監督與一部分因爲工業上的完密組織，商業就有長足的進展，尤以中日戰爭之後爲最厲害。在這商業昌旺的早期，大部分的貿易實爲外國販商所壟斷。他們來日向土商購土貨，轉賣輸去他國。這些販商不是西洋理想的代表。同時又有企業家隨外國旗到日本去開墾，爲圖己利的去開墾。他們的貿易道德通常是不好的。他們看日本人爲劣等的亞細亞人，爲不誠實而利己的亞細亞人。日本因爲不慣於國際貿易，需要相當時間產生有力機關以資管理。政府雖則希圖幫助商人；可是最初許多日本商人與外商來往已學得外人的道德及其他貿易方法，所以日本商人狡詐的話說就顯著的傳播起來了。後來這種情形縱經改變，而日商狡詐的話說還是流行。最不幸的就是這話說我們又不能謂爲盡屬無根之談。因此，外人常得一種印象：日本人不可信賴。

日本的商業既在發展，銀行自然會緣而起。政府用了各種計劃來試驗，遂於一八七三年摹擬美制設立國家銀行制度。可是日本當時現金漏盡，銀行與國庫祇是築在不平穩的紙幣上面。直至一八八一年纔再設立一個中央銀行，即現在名爲「日本銀行」。這一個銀行是爲



着幫助貿易及國外匯兌此外又設有「橫濱正金銀行」在某一時期會事管理日本國外貿易，并曾採定妥善計劃成立一種蓄金制度，以期現金的集得。後來這種舊的國家銀行就轉變而爲通常的合股制度。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郵務蓄金銀行已成立了。其主要的特色至今猶有存在。日本現在的國家銀行獨可發行銀票，及集中而成的私有制度，合股的金融機關。在一八九四年之後，幫助農工的農工銀行成立。一切私有的金融機關也正如普通國民生活的均受政府詳細的監督與規定。

商業發達，運輸方法同時並進。火輪來往諸島，已是大改舊觀的了。起初，許些多數的船隻都是由外國製造的，外人所有的；可是不久，日本人便開始自家來製造，自家的佔有，且得政府的獎勵與多大的補助，便下了基石，下了二十世紀國內外船業發展的基石。至於鐵路的建築，日本政府的努力最早。雖受着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而東京與東京口岸及橫濱間的鐵路，終築成功。政府繼續地努力於鐵路的建築。結果，多數早期的鐵路不是由政府直接開設，就是由政府津貼的公司所建築的。後來私營鐵路較佔優勢；然而在過去幾年中一切鐵路已歸國有。

了。電信也由國家建設。在一八八六年乃與郵務併合在組織上同一機關。日本電話的應用已始於一八七七年，其經營也受政府監督。

在工業方面，政府所努力的成績，是最重要的。政府直接經營的工廠也有多種，如製紙與績紗等。約在一八九〇年的時候，全國蒸汽工廠已有二百餘所，舊時的工藝也在開始爲工業革命的方法去淘汰了。雖則在中日戰爭之後，鉅大的工業發展纔見實現。

政府同時亦注意於農業的改良。維新之後，農民過去爲封建主人耕耘的土地，已歸農民自有的了。過去的強迫勞工與繳付農產，此刻已開始以付稅替代了。西洋農學專家也被聘來日指導農業改良，新的畜獸的繁殖方法也已介紹過來了。

我們知道日本銀行事業，商業運輸，工業與農業各面的改良，在諸維新家領導之下藉政府之力者甚多。其理由有兩：第一，因爲當時日本政府是唯一有組織的機關，有流動資本，有經營大規模事業，而與工業化的西洋競爭的信用。在培理來日的時候，日本無甚龐大的商富。資本家寓在土地，工業簡陋，及缺乏足以與西洋競爭的組織。第二，重視國家，主張政府監督國家

各種活動的觀念，已爲德川諸將軍所鼓吹了。在歷史上既有如此關係，自然會使諸維新家繼承去例了。

### 教育與宗教的轉變

日本教育制度受政府的指導者正多。在幕府崩潰之前，日本學生已開始負笈求學於西洋了。他們中有些是自備資本的，有些是政府派遣的。維新期中，又有許多學生遊學歐美，吸收根本的智識。他們歸國後充滿思想，贊助或領導維新運動的前進。一八七一年日本爲請求修改條約派使出國，該使目擊外國教育進步有所感觸。歸國後乃決定設立新學校制度。一八七二年通過一個法律，就爲普通強迫初級教育的開端。公共教育的整個計劃，也由初等而中學而國立大學的漸次施行。同時又有私人的努力與教會學校的設立，竟添上了不少的貢獻。外國教師廣受聘請。他們中有些不特介紹西洋文化，反有傳授日本文化於西洋者。後來西籍的逐譯也逐漸的注意起來。要曉得，英國雖然於東亞商業上最有勢力，可是開放日本的不是英

國而是美人培理。自然，日本許多青年學子渡美問師了。因此種種，他們就極努力於英文的學習以爲選擇介紹西洋文化的工具。他們又加用了許多漢字以增他們發表新思想上的便利。遵着進化的程序，報紙漸興，其中有些是受政府鼓勵而創辦的。同時許多是常受西洋思想與制度影響的急激分子所主編的。他們的報紙日漸增加，勢力也漸龐大。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之間，政府就感覺到有立定出版法的必要。文字方面又力求淺易使近於白話的體裁。所以教育與新的思想，普通人民均可受到。

人民生活中甚至最保守方面的宗教也有改革了。從歷史上論來，在十六、七世紀日本人對基督教只是恐懼詆毀與憎惡。日本憲法未宣布以前，反耶教的敕令書於詔板上者猶在。當一八七〇年的時候發見了二百年前的幾個教堂的遺物，在反教苛例之下的教堂的遺物。在那些條約的商埠庇護之下各教派的外國傳教師，尚不斷的努力於佈道工作，所以到了此刻又得乘機一復舊觀。在傳教師中許多有能的人，不特於宗教方面有所革新，就是其他各種國民生活也有幫助改良。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當中，因爲慕外心理的關係，尤其是因慕外

心理而引起全國改革的熱心的關係，耶穌教會發展極快；然而日本人幾百年來的「仇教」是不能忘記着的。所以直至十九世紀的末葉反教勢力復活，基督教的進展上就有慢性。

### 過渡時期的特點

過渡時期中的日本旅行或僑居的外國人，一切目擊的都是最感興趣的。日本除了政治，商業，運輸，工業，教育，思想與宗教等的主要變遷之外，還有其他的變遷。在這些變遷中有些是極皮毛的，雖則一切都有意義。日本人的服裝因與西洋混合之故，看來是最可笑的。家宅裏面，設有西化的房間，配以西洋的家具。商業的分聯 (business blocks) 與公共建築分明是外國式的，或奇特混合非東非西的。歸根截底來說，日本處在這新的世界環境中是不能自求適應的。

當一八九四年過渡時期中的危機過去之後，政府已經完全改組，憲法已經試行數年了。海陸軍則仿倣西洋來建設了。學校制度已成功的實行了。關稅與司法自主的目的，已在許准

中了。工商業已有驚人的進步了。當時全國的改造尙未完全，結果祇能開始測定。可是國內因求適應世界潮流而發生的困難，幸已過渡。自從一八九四年以後，這會改造過的日本因其努力發展之故，已在國際上與強國居同等的地位而日增其權威了。

參考書：Griffs, *The Mikado's Empire*; Brinkley, *Japan, Its History,*

*Arts, and Literature*; Brinkley,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McLare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during the Meiji Era*; Okuma,

*Fifty Years of New Japan*; Cary,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Japan*;

Anesaki, *History of Japanese Religion*.

## 第十章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三一年：日本在國際上底地位

(一)由中日戰爭而拳匪之亂而日俄戰爭(一八九四—一九〇五年)

### 一八九四年後日本對外交上的注意

約在一八九四年的時候，日本國內的改組工作已達至不復需要全國的注意了。日本不特國基已臻穩固，且於國際事件上已漸佔有重要的部分了。新日本已是躍進一個人口增加工商業發展的時期了。日本在這幾方面既有發展，人民的愛國思想既在高漲，同時又因為東亞環境的關係，日本就難免不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了。第一次糾紛起在高麗，由這糾紛而發生的事件殊繁，現在尙未了結，影響於世界者至為重要。

日本在高麗與其他國家的軋轢是勢所固然的。這裏，我們記得中國與日本於一八八五

年雖曾暫時的解決兩國在高麗利益的問題了。可是，兩者均繼續地各行其陰謀詭計。同時背後又有俄國，久已覬覦高麗的俄國。這是日本政治家所最引為顧慮的。他們以為如果日本捷足不採用強辣手段，則脆弱而守舊的高麗，必為虎視眈眈的俄帝國所取奪。日本人相信隣居好鬪的俄國必不利於日本在大陸的商業利益的。日本不息地增加人口的當然的出路必受阻擾。要知道俄皇伸張俄國在亞洲的疆界歷時已有幾百年了。在俄皇大彼特之前，俄國的哥薩克人與一班刻苦的開闢者，已跨烏拉而至太平洋了。他們足跡所到之地，都要爭為俄帝所有。因此，俄國就與中國衝突，結果亞穆爾河的北岸及烏沙里的東土均為俄所掠奪。且在外裏海一帶發展，從西北虎視印度，從西部垂涎中國。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俄國望在高麗南部得一根據地以求他們從海參威而出太平洋的航道。同時又企圖在高麗或中國之北得獲不為冰鎖的口岸，來作根據地以便於商業上與海軍上得以支配遠東。所以，俄國早已就在高麗開始她的陰謀了。她的勢力在北京不弱，或許可以藉用中國以圖己利。無怪乎日本對俄國有懷懼心了。日本為制俄起見不得不企圖幫助漢城的維新黨，期把缺乏效率與腐敗不堪的政府改



組起來，使有能力維持國勢，防禦外侮。

###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爲高麗而起的中日戰爭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高麗有兩個黨派；保守派受中國的袒護，維新派受日本的鼓勵。這兩派常互衝突。高麗政府尤至不可收拾。一八八五年中日兩國所協定解決，雙方在高麗的利益，的條約，簡直是兩國糾紛的來源吧了。中國以高麗爲一附庸國，大責日本認高麗爲獨立國之荒謬。後來因爲漢城（一）的紛爭愈甚，加以適逢高麗人發生叛變，中國通知日本說明要出兵平亂；但日人說中國不嚴守一八八五年的條約，此種通知，係在於已出兵之後。當中國動兵消息達到日本，日本就倉卒準備出兵高麗，以爲這是一八八五年中日條約所給與的權利。兩國出兵高麗亂黨平息，事後兩國軍隊均接續駐紮高麗。日本當時向中國提議，中日雙方協同改組高麗政府及維持秩序。中國方面對此提議表示拒絕，不准高麗以獨立國看待。同時又爭謂中國有權限制日本在高麗軍隊的數目，和動兵的目的。中國顯然懷疑日本對高麗有侵略的

野心，要設法排洩日本使中國能獨佔的統轄高麗。其時適日本國會與內閣劇鬪之候，中國以爲日本既內部分裂，不能爲中國大患。

(一)中日戰爭之前，袁世凱駐高麗，統理高麗交涉通商事宜。

一八九四年七月乃演成中日戰爭。至於此次兩國戰爭的情形，我們這裏恕不詳及。然而有一事我們要知道而出於中國意料之外的，就是中日發生衝突之後，日本全國人民，覺禦外需先使內部和協，藉對外口號激勵民氣，於是政潮解息，全國上下，和衷共濟，擁護天皇武裝勢力。日本於是就由責任內閣之爭，而蹈進於帝國主義之途。同時也是政府的大好機緣，藉中日戰爭以轉移國人對憲法上鬪爭的視線。戰爭結果，中國海陸軍遂爲日本打敗。在中日戰爭之前，中國海軍固不亞於人，號居世界第二位，經過是役之後，新式的戰艦大受損失，或沈沒或投降。而中國在戰略上最便利之遼東半島的海軍根據地，即旅順、大連二港。（二港均經歐洲工程師作有防禦工程，而旅順形勢天成，尤稱堅固。）均遭失守，瀋陽也大受恫嚇，山東半島的海軍根據地威海衛，也被佔據。日本海軍在中國北部就至威氣迫人。同時日本又趁着戰勝國之

優勢出征台灣及澎湖羣島以贖其愆。中國不得已乃請媾和，立簽條約。中國完全正式地承認高麗獨立。(一)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羣島均割讓與日本。中國賠償日本大宗軍費(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兩)。中國同意將揚子江及其他附加之條約口岸與外通商。這就是中日戰爭的結果，矮鬼竟能戰敗大漢如此，真是遠東史上一樁有趣的記載了。

(一)馬關條約(一八九五年四月)簽定，代表中國參加談判者爲著名的中國大政治家李鴻章氏。

中日戰爭，歐人異常注意。戰爭的結果，尤令人聞之愕然。俄國觀日本之戰鬪力，自知其南方發展之計劃必遇阻梗，就其已在北中國的勢力必蒙不利。德皇見日本的勝利以爲是東亞軍事復興的開端，以爲是黃禍的流行，以爲是歐人優勢的搖動。在中日和約未談判訂立之前，俄國因爲要保其在北京地位的穩固，已有不容日本佔領遼東半島的決心。自然，一俟中日和約簽定之後，俄國得其同盟國——德國之贊助，向東京政府提出抗議。措詞雖云客氣，然而主張強硬，大意謂「馬關條約」有礙遠東和平等詞。同時德國也向日本提出類似的抗議。話雖簡略，而意含攻擊。日本當時既無他國之盟助，復無力量能抗三強。在這情形之下，爲求不傷列

強友誼起見，只得忍氣接受三國忠告，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而由中國另外付款賠償。

日本對於中日戰爭所希圖者甚大。「馬關條約」的立定，許多日本人尙以爲過於溫和。所以，遼東半島被迫歸還中國之後，日本民衆以爲有減國家的尊榮，大失所望。他們對俄國的仇恨心理日甚一日。日俄衝突就至勢所難免。政府方面，馬上決定政策開始於海陸軍之擴張。增加人民稅擔，比較中國賠款數日還多大的稅收，完全用以準備將即來臨的戰爭上去。日本的領袖們，大都以爲若果日本要使歐洲列強承認日本在遠東的勢力，非建設強有力的軍備不可。

日本因爲集中力量於擴張海陸軍勢力的緣故，薩長兩派藩閥地位越加鞏固。屬於這兩派的武士們，操有全國的兵權。且於武裝上既有龐大的準備計劃，自然他們的勢力較諸從前之僅能支配政府政策者就重要得多了。他們所主張的是領土伸張，大陸政策有須強硬。他們本不欲與外國發生衝突的（我們下面可以見到）；可是因爲種種關係的緣故，不得不主張日本採取帝國主義的政策。這種政策使日本三次對外作戰之後，其在世界政治上的地位已

就不可漠視了。

中日戰爭後，日本給與於世人的印像是：過去四十年中，日本國內已完全轉變了，很重要的轉變了。除了一二個例外或事情最激厲的時候外，日本人於中日戰爭期中，始終就審慎地遵守西洋國際公法。日本人已經表現出他們有運用西洋的利器與制度的能力了。

日本要得到列強的完全承認，對中國事件有發言的權利，在高麗有優越的利益，以及開放進入滿洲的門戶，自然不是一樁易事。俄國因爲一八九五年干與日本侵略中國，中國爲報答這個恩典起見，就給與俄國以一種權利建築外西伯利亞鐵路，使在歐洲的俄國得與西伯利亞聯成一貫，直經北滿而至海參威。俄國鐵路不依照原定計劃彎曲的在俄土經亞穆爾和烏沙里路線建築者，這當然是中國給俄皇在北滿以顯明的勢力了。俄國接着就在巴黎集款擔保借款去中國，付清所該日本的賠款。這一舉，不殊俄國要在經濟上做中國的保護國的先步吧。高麗方面，俄國也接續地進行其陰謀，嚴厲的阻止日本人在那裏發展。後來，俄國果然直接的在漢城支配一切。又適日本的代表在漢城與高麗王后同被暗殺，爲了這一樁案件的牽

連高麗王爲顧個人身體的安全起見，避居於俄公使館者竟有兩載。日本僑民在高麗者不能以驕氣迫人的態度，狡詐的貿易，及不能甚至以暴力來反對高麗人了。總之，日本之所以怕懼在高麗的俄人者，自有她的理由。俄國如果在高麗得獲更大的優勢，以這種優勢去阻難日本在大陸的商業，及恫嚇日本海岸等，日本人思念及此，那能自安？

到了一八九七年歐洲列強，開始在中國爭取租借地及勢力範圍。我們知道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西洋國家已進入殖民地擴張的一個新時代了。非洲不久以前正被他們分據。前無人爭的島地均被他們競佔。一切弱小國家的領土完整，都已臨着危險。中國呢，一經中日戰爭之後，弱態全盤托露，歐洲列強那得不快趁時機以遂其帝國主義的慾望呢？一八九七年德國藉口其傳教師被華人暴徒暗殺，要求中國將肇禍地軍事上最險要的膠州租借與德國，以九十九年爲限。德國得獲這一個租借地後，就開始在那裏建設青島新都市，建築鐵路，使青島與內地路線連接。這是中國方面所容許於德國的。不特此也，德國且有開山東省重要鐵山的特權。此即兩傳教師被殺，德國所得的結果。中德教案解決之後，不久俄國以爲干涉日本

侵略中國有功，倣德國之故智，向中國要求將三年前俄國強迫日本交還中國的旅順、大連租借與俄國。俄國得此兩租借地後，就在那裏建築鐵路，與西伯利亞路線聯接。這項鐵路於租借地滿限時，中國有收買的權利。中俄兩國又合同建設銀行。名義上雖說合股經營，事實則俄國最佔優勢。俄國既得獲上述的特殊地位，即大有左右全滿及中國北部的權勢。且可拒絕一切非屬俄國的貨物，作有效力的阻止。日本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俄國要行的政策。大不列顛呢，也同時要求租借軍事上隘要的威海衛。英國得此，當然可從山東方面來牽制北京，並使揚子江流域成爲英國勢力範圍，以便操縱揚子江一帶的商業，供給資本建築鐵路，發展工業及採掣鑛山等。法國在南中國有租借地及其勢力範圍。然而無論如何英法兩國尚非日本的大敵。

### 日本壓制拳匪暴動的勢力

中國被迫租借土地於列強及瓜分爲若干外人勢力範圍之後，接着便起一種維新運動。其時因爲得獲少年天子的領導，努力，維新運動的分子就決然奮勉要求步武日本採仿西法，

改造國家；可是維新運動之反影，演成一九〇〇年的拳匪之亂。當時竟因皇廷的許准，遂除西人。結果，外國使館被圍，殺害教士。中國北部排外風潮如騰如沸。諸國在這困於拳匪酷勢之下，祇望日本出力恢復秩序，護救在北京的西人出險。日本於此就以其有訓練與有效率的軍隊壓平亂黨。日本之所以爲世界景仰，得獲在一切國際機關有權涉及中國事件者，實由於此。

### 日俄戰爭前的情勢

拳匪作亂，俄國就趁此時機以保護俄國僑民爲詞，出兵滿洲。可是拳匪暴亂平息之後，俄國軍隊不肯撤退，似有要長此駐紮滿洲的形勢。日本與美國先後提出抗議。這即美國佔據菲律賓濱遠東事件大加注意的緣故。平心而論，美國的政策是要使滿洲與中國其他部分一樣，的受領土完整的原則所保障，主張門戶開放，各國人民均得享有同等的經濟與政治上的特權。俄國在許多時好像要依照列國的忠告，退兵離開滿洲。事實，則俄國對此無甚誠意，也不與中國訂定何項條約。倘當時沒有英美日三國的強烈反對，則滿洲必已成爲俄國領省無疑；可



是俄國終在其所望得的地方得着特權。一九〇三年竟委總督管理俄國關於亞穆爾及在滿洲的利益。簡直以滿洲爲己有一樣的看待了。

俄國因無誠意退兵離開滿洲，及嚴重否認日本有顧問滿洲事件的權利，越加證明日本當預備用兵了。倘俄國佔據滿洲，則日本在滿洲的商業發展上必爲俄國制止而受損失。同時，日本在高麗的利益必至危險。日本力求所有正當的解決方法，使能避免兩國武裝衝突。曾圖與俄國談判；可是俄國依然反對日本有權問滿洲問題。主張限制日本在高麗的現勢力。日方本來未嘗不願與俄盟約作公正的劃分操縱遠東的霸權。如伊藤氏者即主此說。

當人們知道日俄戰雲將起之候，日方繼續擴充海陸軍的勢力。同時又與英國有所聯絡，結果就成爲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內容以中國與高麗爲限。日本認英國在中國有特殊利益，英國也以日本在中國與高麗有特殊利益回認日本。倘英日兩國任何一方爲保障上述利益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時，另一方應守中立。並須運用其勢力防止其他國家參戰反對盟伴。若其他一個國家或數個國家參戰反對任何一個盟伴時，另一盟伴當依盟約與以援助，共同

作戰，議和。這一盟約的發生效力，僅以五年爲限。英國之所以與日同盟者爲的是目擊英國在中國商業的優勢有危險的可能，尤其是怕懼俄國的侵害。這麼一來，英國自然願助日本以抗俄國。英日同盟，無論如何對日本是最有利益的。一來可藉英國財政海軍與商業上龐大的地位，提高日本在國際上的威嚴；二來可藉與英國之關係，使俄國在國際上形成孤勢。一旦日俄戰爭，歐洲其他國家或許不敢聯俄與英對抗。還有一層有利於日本的就是在財政上得倫敦銀行家的幫助，需要的幫助。

### 日俄戰爭（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

起初人們都以爲日本雖與英國同盟，一旦日俄作戰，日本未必勝利。日本顧慮及此，久想要與俄國談判，維持和平，極願承認滿洲非屬日本勢力範圍，同時也請俄國承認高麗非屬俄國勢力範圍。諸如此類的請求，均被俄國堅拒。加以俄國在高麗的漢城，南部海岸及北部邊境的行動，使日本更明顯的知道俄帝國主義的政策，侵略高麗的政策。從日本人的立場看來，僅

有戰爭一途可跑。於此，雙方均忙於軍備。日本的優點在於軍事行動的迅速。外交一趨危重（一九〇四年二月），日本就行襲擊俄國軍隊。雙方相持歷時年餘。俄國實際上大感困難。從歐洲部分的俄國距戰地有數千里。人力的供給又以交通不便而束手。且因軍事管理尤其是海軍的管理，腐敗不堪，能力薄弱。那有勝戰的可能？從日本方面看來，戰地距本國較近，軍隊組織嚴密，指揮有方，況日人勇敢，治事有效率。這是諸中立國家所稱道不置的。俄國軍隊抗禦雖頗強硬；不久終被逐退。大可阻擾日本在大陸的交通與軍隊的俄國艦隊，又迭遭失敗，燬沈者燬沈，未燬沈者被封鎖於旅順口。經日本猛烈一擊之後，旅順失守，歷時僅幾個禮拜，瀋陽竟不待日軍襲打，俄軍已聞風潰退。著名的巡繞好望角而來的波羅特艦隊也於日本海一戰燬沈於日本與高麗之間的對島海峽。東海一帶全受日本支配，不復發生危險了。俄國方面雖屢受挫，還不能以戰敗者看待。倘俄國當時不是因為國內紛亂，或可續戰而取勝。不過因為國內人民反對外戰，革命爆發，俄政府就決意預備開始與日方作媾和的談判。日本政治家也有同樣的願望。日本戰爭雖得勝利；然因多年備戰之故，財政發生困難，負債已繁，那堪延長戰爭，再續

舉債所以當美總統羅斯福出而斡旋時，日俄雙方均表歡迎。

日俄談判舉行於波子瑪斯 (Portsmouth, New Hampshire)。其所議定的條約，即名為波子瑪斯條約。這一個條約的內容略有如下：(一) 俄國承認日本在高麗有政治、軍事及經濟上的至上利益；(二) 日俄軍隊同時撤退離開滿洲；(三) 俄國將遼東半島之租借地及俄國在南滿持有的鐵路與鑛權移歸日本所有；(四) 俄國以薩哈連島南半部割讓與日本；(五) 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之俄領沿岸濱港、河川等許日本臣民有漁業權；(六) 日俄兩國各須按照所屬被虜士卒之維持經費互相償還，以雙方平均計算，俄國須賠償日本約二千萬元；(七) 日俄兩國均得在滿洲設留鐵路守衛隊，每里路程衛隊多少應有一定限制；(八) 雙方不得在薩哈連島建設砲台或利用滿洲鐵路為軍事上之目的，及(九) 雙方須交還及尊重中國在滿洲之主權，惟在租借地及保持門戶開放、各國工商業機會均等。

這一條約的訂定，深為日人所不滿。日本民衆的希望甚鉅，他們以為日本既得勝戰，當要求俄方賠償鉅款以抵當日本人在戰爭的犧牲的金錢與性命。日本的代表在波子瑪斯伊始

就要求俄國賠償鉅款，或許這是外交上的一種手段，要嚇誘俄方於土地上能有較大的退讓。俄國當時以為日本會不要求賠款而接受俄方和約的。日本代表知道俄方的希望，就故意張大其要求，以愚俄國，所以到了相當的時候，日本就將賠款一項棄而不論。可是日本人民不懂這種策略，深致失望，怨憤政府態度之不該退讓。在場效勞斡旋的是美國總統，談判方面進行頗稱順利。

### 日俄戰爭的結果

依波子瑪斯條約看來，日本帝國主義者應是心滿意足的。在高麗與南滿方面，日本勢力鞏固，俄國進展不能。日本因此一戰，竟一蹴而登強國之林。換詞言之，從土耳其侵伐的波動下降之後，日本可說是一個非歐洲國家而戰勝西方頭等國家的了。日本戰績廣聞東方，多大的激動了波斯，印度與中國的國家主義者，起而努力於維新的運動。遠東其他諸民族姑不論其對日本的態度是好是壞；可是他們都是幾乎以日本為模範國家，為擺脫歐洲重軛的先例。總

之，日本已證明西人並不是不可征服的。日本就是仿西人的武器來戰勝西人的國家。

日本戰勝俄國之後，國威大振於世。一九〇五年八月波子瑪斯談判尚在進行之中，英日同盟重行訂定。這一次的盟約關於保持遠東的和平，中國領土的完整，及門戶開放諸項均有規定。同盟範圍之擴大，利於英國者有關於印度而至整個的遠東；利於日本者在英國再認日本在高麗有特殊的利益。倘同盟國任何一方在盟約所指明的地域內的權利，為盟外國家所干涉時，同盟國須與以助力抵抗。英國尙是對俄懷有懼心的國家。倘俄國一旦侵犯英屬印度，則英國自必需要日本就近幫忙禦俄。這種同盟到了一九一一年又再規訂，以十年為限。可是不久，英法俄又有三國同盟（The Triple Entente）的成立。因此英國才不懷懼俄國對印度中國有侵略的行爲。至少也暫時不慮及此。然而新興的德國是大足為患的。所以英國以為與日同盟可藉日方的力量衛護英國在東方的利益。一九一一年英日同盟，其內容與前有所不同者僅有一點，就是沒有關及高麗的規定。這是因為英日第二次同盟成立，係在於日本併吞高麗之後一年的緣故。在英日盟約裏面又有這樣規定：英日兩國任何一方，如與任何第三

國家戰爭時，另一盟國得不因同盟關係加入與其已有普通公斷條約 (Treaty of general arbitration) 關係之第三國家作戰。從一般人看來，英日盟約有如此規定者，爲的是英國不欲於日本與美國衝突時負有助日抗美的責任。因爲英美兩國不久以前有談判一個公斷條約，雖則未經批准；可是誰也知道日美兩國於一九〇八年也有締立一個公斷條約。同年日美兩國又有定立一個所謂「魯特石井盟書」(Root-Takahira Agreement) 明白宣稱他們的策略是保持兩國間之現存關係，並互相尊重兩國在太平洋的領地，保持中國的獨立與完整，保持中國門戶開放。倘遇該條約的原則，有被違犯時，兩國一切行動須互相通告。在一九〇七年法俄兩國又和日本議立條約，旨在協助遠東和平，承認中國獨立與領土完整。這是三國同盟成立後而有的一種自然的副產物。我們這裏所舉述的都是要表示日本對於遠東事件上的權力呢。總之，日本已不復如一八九四年或甚至一九〇四年以前那樣的爲西方強鄰所漠視的了。

參考書：Brinkley, Japan, Its History, Arts and Literature; Brinkley,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sakawa, The Russo-Japanese  
Conflict; The Secret Memoirs of Count Hayashi; Hornbeck,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



## 第十一章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三一年：日本在國際上底地位

(一)從波子瑪斯條約成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三一年

### 日本底附屬地的發展

波子瑪斯和約簽定之後，日本政治家就決心負起擔子來發展他們由戰爭而得的屬地。以期補償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日本的損失。台灣從一八九五年起便歸屬日本管轄。日本佔領台灣後，經營籌劃要使牠能成爲一個有利的殖民地。台灣西岸居民都是漢人，他們對日本的統治，就由仇恨而至武裝的反抗。日人雖能壓服他們；可是此患一去，接着瘟疫流行，更爲危險。台灣是個著名不衛生的地方，同時中國人的移來又不間斷。日本的醫家幸能應用新的衛生與醫學方法，來減低那裏的死亡率。台灣的東部是山嶺險巖的地方，爲生番所居。這種生番殘

酷異常。他們中有些已被日人誘化居住低地而爲和善的農民了。對頑逆的台民，也以厲害的警察方法，審慎地限制他們狹小的地方主義的滋長了。日本人在那裏的行政起初是極腐敗的。要洗除腐敗而求成功一個誠實的，與有效率率的政府，自非頃刻間的事情。所以起初在好幾年中台灣簡直是日本帝國國庫的一個漏溝。後來因爲秩序恢復，就開始在工業上革舊鼎新，建築鐵路，增加行政效率起來。台灣於此，不復有負累於日本的負擔了。對日本的財富逐漸的有所貢獻了。同時又注意於農業上的灌溉，保存改良林業，並鼓勵發展三大農產，如茶（在北部）、米（在中部）及糖（在南部）呢。台灣人所用的糖，起初多是由日本輸入的。因之，政府對糖業尤爲努力發展。教育方面也有加意鼓吹。殖民地行政官員都願虛心審慎地去研究歐洲殖民地行政制度，並要提高台民早能在文化上興旺上得與日人同等。

高麗於一九〇五年名義上雖則仍係獨立，有好幾次也爲日本如此承認過。這類承認顯然是日本與中國戰爭的一種報償的了。漢城的王廷能否自己有效力的和捷快的改革牠的行政，能否自保獨立防禦歐人和漢人的侵害，倘高麗自己可有這樣的能力，則日本或可不加

干涉，准高麗自爲其政。然而日本政府無論如何是不信任高麗人可有這樣能力的。誠然有些熱心國家改革的高麗人如果沒有外國人陰謀的阻擾，或許他們可以挽救高麗於狂瀾既倒中的。

日本有了多年的經驗，不容高麗人享有政治上之自主。日本曾兩次與中俄戰爭，爲的都是保持其在高麗的利益。起初，則以高麗的領土交與脆弱的高麗王，腐敗的王廷及好些絕無經驗而浪行的維新家去治理，帶冒險性的去治理。後來，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興起了。所以到了一九〇五年，波子瑪斯條約簽定之後，馬上就不由漢城政府的同意，締立條約，支配高麗的外交權，並規定由日本派遣總督使，監督高麗的行政。日本這種舉動，一來違背日本迭次承認的高麗獨立，二來損傷其他國家在高麗的條約權利。然而歐美國家對日本這種舉動予以同意，高麗愛國之士雖有百感悲憤，又那能做有力的反抗呢？伊藤氏就委派高麗總督使，主張保存高麗王廷及其他行政機關，使用顧問制度從中支配，並圖將高麗的財政、警務、法律、司法、教育、衛生及工商業等盡量改革。伊藤氏之所以希圖發展高麗半島者，是爲日本的利益着想的。

雖則他同時也宣說是高麗人本身謀福利的。伊藤氏當時的地位很困難。因為這種兩制的政府 (dual system of government) 是一種下策。高麗的官吏之缺乏效率，與腐敗的習慣是不能馬上改除的。另一方面高麗人心裏對日本人普通來說都是憤恨的。同時因為在高麗的日本官吏，僑民的高壓行為之故，而日韓間之仇視心理日甚。日本人到高麗的，大致是看高麗人為被征服的民族，以高麗的土地為合法的取利場所。加以，在東京有一個強有力的帝國主義的政黨，主張完全吞併高麗。一九〇九年伊藤氏辭職引退，自認失敗。不久，伊藤氏被高麗愛國之士暗殺身死。

伊藤氏而後，兩制政府尙繼續數月。直至一九一〇年八月，高麗乃正式簽約歸併於日本，採用舊名朝鮮，自此高麗遂為日本帝國領土的一部。我們如考慮及高麗的弱點，高麗在軍事上地位的重要，歐洲國家的自利的野心，與日本因戰爭而受的犧牲，則日本之併吞高麗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了。日本併吞高麗當中，當然有些是我們所認為不滿的；雖說那時高麗已經顯示其自己不能維持獨立的地位了。

東京的政治家會盡誠的去努力增加高麗的財富，與增加高麗人的日本化了。盜匪減少，鐵道公路，建築漸進，農業的試驗場增加，需要的種樹工作實現，及獎勵工業等是日本常自誇稱的。高麗被日本併吞，王廷廢除，一切高麗人如果對日本忠心而又有能力的都給以官位。日本所希望的在能使高麗人（即韓人）均為日本天皇的順民。所以他們只想捷快的同化高麗人。有些人說，日韓兩種人民相關甚切，同化問題，並非困難。爲了要達到這種目的，日本法律，法庭均採行於高麗。同時廣設學校，日文字，鼓勵高麗人學習。

高麗人對於日本的同化政策，是憤然反感的。在他們心的深處是最痛苦的。這裏我們要注意，高麗未被日本實行併吞的許久以前，耶教已在那裏盛行了，十九世紀，耶教在那裏比較遠東其他國家都極盛行了。所以，日本人很怕外國教師在宗教方面影響高麗人，並藉口以教徒的關係，保庇叛反日本的韓人。日本人因有這樣的顧慮，許多時常與外國教士發生爭執，尤其是日本人在高麗監督一切教會學校，常以叛亂反日的罪名，加諸無辜的高麗人等情有所爭執。到了世界大戰之後，一九一九年因爲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的學說的影響，和日

本人對高麗人待遇的慘虐之故，便激起高麗人的興師反叛；可是他們的組織不良，事後就被日本人壓服。日本人爲要避免將來叛變的發生，就採一種比較溫和的政策。總言之，高麗人的民族主義與對日本人的憎惡是厲害的。高麗的問題許多年以後恐怕還是很困難的。

從經濟方面來說，我以爲高麗人的生活程度極低，比較日本人的生活程度爲尤低。無怪乎許多高麗人都爲自身謀生起見到日本本部去，到滿洲去，及到東方的西伯利亞去。

薩哈連這一個地方還最是生利的。薩哈連的南半是俄國以波子瑪斯條約割讓於日本的。那裏有幾千方哩的地可供耕種。日人移居那裏的也只有幾千名。薩哈連的漁產最爲重要，林木也收入要源之一。雖則那裏炭鑛頗富；然而比較說來，還是一個未發達的地方。

### 日本在滿洲的利益與勢力的伸張

日本在滿洲的地位並不如在高麗那樣重要。日本與俄國戰爭極顯明的，就是去保持滿洲門戶的開放與中國領土的完整。可是因爲日俄戰爭，日本勝利之故，俄國在滿洲的利益，就

爲日方所得。西方強隣與日本所商定的條約，都無不主張日本須尊重中國主權和不違經濟機會均等的原則。許多日本人以爲既然滿洲的情形已經移變，日本可沒有踐守前約的必要。日本人犧牲了無數頭顱去抵抗俄國，中國則只有名義上的主權，袖手旁觀的不費一兵一卒，日本人爲抗俄而負的重稅，爲抗俄而負的債務是一輩子償還不清的，而中國則不費一錢。日本人以爲他們既然犧牲了這麼大，如果滿洲不給日本使用，是不公平的，這是日本一般愛國主義者的口氣。總之，日俄戰爭，日方勝利，簡直是助長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野心。況且滿洲又是最引帝國主義者注目的地方呢。滿洲與高麗接壤，鑛產林產甚富。且又地屬邊疆，更見重要。滿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幾有三個世紀以前已是如此。近年來，中國人口移入滿洲者爲數甚衆。他們如許迅速的移住在那裏者，一來是因爲他們農業成績的表示，一來是因爲那裏土地肥沃。可是日本人口增加很速，需要地方。一八九一年日本全國人口僅有四〇，七一八，六七七；一八九九年有四四，二六〇，六五二；一九〇三年有四六，七三二，八七六；一九〇八年有四九，五八八，八〇四。到了一九一九年則有五七，二三三，九〇六。雖則日本可耕種的土地，尙未全用，而

耕地恐

一條是

需要。比

(二) 滿

我

然難於

面都詰

支配滿

國方面



美人對日本在滿洲的勢力是無不欲求其消滅的。當波子瑪斯條約的墨瀋未乾之際，美人哈里曼（Harriman）就與東京政府商定要從日本購買由俄國手裏所奪來的鐵路。這位美國的鐵路大家，計劃遠大，要想去達到能支配西伯利亞的鐵路，助以輪船，就能左右大西洋及太平洋的交通，成立一個環繞世界的運輸路線在他統轄之下。這種計劃的籌定，適在日本伸張之候，伊藤始雖同意，終爲日本出席於波子瑪斯條約談判的首席代表所勸止。於此，英美兩國的財政家就從事努力在日俄兩國之勢力範圍，求得鐵道租界。哈里曼先與俄國談判要購買俄國在滿洲的鐵道。美國國務卿諾克斯（Secretary Knox）氏提議將滿洲鐵路劃爲中立區。諸國就聯合起來借款於中國，購買日俄兩國在滿洲的鐵路，再依實際之需要格外建築。至於鐵路的管理暫由國際委員會主持。這一個計劃是極重要的。如果牠能實行起來，可以替代諸國在中國要求獲得許些「勢力範圍」、「租借地」、「特別利益」以及其他侵犯中國的方式呢。又，如果諾克斯計劃能成功，必可減少諸國在中國的陰謀，和利害衝突的原因。自然，正謀國外發展的日俄人民對諾氏的計劃是不能同意的。既然日俄各自支配他們的資

本，他們經諾氏計劃的恐嚇之後，不特作公開的反對，且進而日俄互相協定（一九一〇年）共同保持及均衡他們在滿洲的利益。依美國的計劃，日俄在滿洲的利益必至消盡；然而竟因此引起日本的野心去求獲得日本商人在滿洲的特殊利益，和他們的鐵路一樣的利益。日本人在滿洲因為操縱海關，鐵路，銀行，及避稅等都是犧牲其他諸國的利益，而求日本自身之好的。屢為諸國所詬病，有好些地方，所詬病日本的都是顯有所根據的；可是如果真有違背門戶開放的地方，都是間接的違背。

### 一九一四年以前日本在中國的利益

日本在中國的利益不僅限於滿洲一地，故對於中國本部，亦無時不欲狡然思逞。如果滿洲在商業上，鑛業上，工業上是一個富地，則中國本部，尤其是一個富地。中國的人口既然衆多，而人民又極勤儉耐勞。人口數目，向來雖有不同的估計；可是無論如何，中國的人口總有三萬萬三千萬至四萬萬五千萬之衆。中國自然是可以成爲世界最大的市場了。且中國的原料如

炭與鐵等的供給又極多量。日本內地既然產鐵甚少，而鐵又是特別需要的東西，日本如果要獲得職業和食料去維持她的在增加中的人口，與保續日本國家的進步，則中國那裏就自然的是日本商業上發展的絕好的地方了。日本爲甚麼不導助這麼積重難反而久夢初醒的中國去從事於國內轉變與組織呢？爲甚麼中國與日本不做親密的同盟，由東京爲領袖保障東方人在遠東的占有呢？爲甚麼不以這種合作的力量去影響世界的事件呢？總之，日本既然佔有高麗，且又在滿洲有她特別的利益之故，自有看守，或必要時支配北京的外交。

無論某種策略如果是工商業上所聞知的，日本必盡用之以發展她與中國的貿易。揚子江及支流來往不絕的輪船，許多是日本的，是日本政府重大津貼而經營的。無論在那一個主要條約商埠都有日本的郵務局及領事館。日本商人來中國者應以千計，日本人當教師於中國官立學校者，也不乏人。一九〇一年之後，中國學生相率羣向日本負笈求學者甚衆。他們在東京既離祖國較近，用費又較減省，就可得研求西方學術的機會。這班學生歸國後以其在日本所得的印象，而努力於維新運動者，頗具卓著。

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推倒清廷，成立中華民國，委實給了日本干涉中國內政以許多新鮮的機會。誠然，中國革命是伴着愛國運動而來的，所以易於激起外人的仇視。我們知道南北統一後任大總統的袁世凱氏是日本的老敵，因為在中日戰爭之先，袁氏是在漢城的中國代表。日本對袁氏自然已恨之刺骨的了。袁氏登台的時候，中國秩序尙混亂，地方武人尙多各自爲政。在這樣情形之下，就給日本以威壓中國的機會，提出強硬的要求，以廢其帝國主義的慾望。同時，中國人反對袁氏的一派，則希望日本方面的幫忙，雖然我們不能找出日本政府有甚麼直接幫助中國亂黨的證據；可是有些過度愛國的日本官員，曾經大犯不韙的給助中國內部叛黨以助力呢。要知道改革是需要金錢的。當袁氏主政時，因為要維持軍費，及改組政府需款孔急。國際銀行團於是就應運而起。銀行團包括有英美法德四國代表，答應借巨債於中國，而以稅收（如鹽稅）爲擔保。說明中國將來如果要舉債必須先向該團籌借。日俄兩國後也要求加入，就爲六國銀行團。他們似乎是聯合着要做中國財政上之保護國的。美國方面，因為威爾遜任爲總統，主張退出六國銀行團。其理由大略謂該團在借款於中國所訂的條約上，

對中國主權有所損害，不敢贊同。美國退出銀行團之後，其餘五國代表借款於中國，雖則借款條件不如起初那樣厲害。然而，日本和其他四國以借款的關係就在中國鞏固其地位。

###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間的中日關係

一九一四年八月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因與英國同盟之故，日本在遠東有防禦德國的襲擊，保護英日兩國利益的義務。日本老早已有準備爲盡這種義務了。且也是日本樂得爲此的。因爲這是日本前未曾有的機會去擴大其在中國及太平洋的勢力。爾時歐洲國家因正忙於砲火，美國又不主張使用武力保持東方門戶開放。於此，日本就能爲所欲爲了。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竟毅然向德國提出覺書勸請德國將所有在遠東水上之軍隊，戰艦一律撤退，其不能撤退者，須盡解除武裝，並將德國租借地膠州放棄歸還中國。日本對德國提出這樣一個覺書，自然會令人追憶到一八九五年德國對日本所提的含有同樣意義。可是德國對日本所提請的，置之不理，日本就參入大戰。戰時日本幫助英國在太平洋逐清了德國的巡洋艦與

沈打艇，佔奪德國在太平洋部分的島嶼。這種行動於軍事是極重要的。日本得了英國稍許的助力就出兵中國佔奪青島，佔據德國在山東的鐵路與鑛山。日首相大隈當時以字面宣布否認日本出兵山東沒有任何領土的野心。日本聲明沒有疆外取土的動機，沒有興趣侵奪中國或其他任何人民的占有。話雖如此說，可是日本以為那時是個大好機會，就動兵攻擊青島。中國當時尚係中立國，諸所承認的中立國。日本竟甘冒不韙，對中國主權絕不尊重，為所欲為。縱經中國屢次抗議，責日本軍隊在鐵路區內外周圍之種種強橫舉動。日本並不加意。一味佔據青島看同征得之地，甚至在那裏對不列顛的利益，也盡行排除。

然而，日本尚不自足，竟圖得寸進尺的侵略中國。就於一九一五年五月向中國政府提出驚人聽聞的「二十一條件」。如果這些條件完全有效力，則龐大的中國必至整個的在日本支配之下了。計這條件共分如下五號：

第一號：關於山東者，中國政府允諾日本政府與德國政府協定關於德國在山東省所佔有之一切權利。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之土地，概不讓與或租借於任何

第三國家。中國政府允諾給讓日本以格外鐵路租界，並開山東省內之新商埠。

第二號：關於南滿洲與東部內蒙古者，中國政府將南滿鐵路及旅順大連之租借期限從二十五年展延至九十九年。日本臣民得在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兩地隨處有居住，來往，租借或購買土地以資貿易並經營工業諸權。日本臣民得如意從事任何商業，倘經雙方政府同意有開採礦權。日本人所要求的這種居住及土地佔有權，除給與外國傳教師外，中國從未有在其他部分允諾過任何國家的。所謂治外法權在當時也只限於設有領事裁判所的條約口岸。中國政府允諾如在滿洲，東部內蒙古用外國顧問，允諾他國人建造鐵路，或將南滿及東部內蒙古之各項稅課作抵向他國借款時，須先經日本政府之同意。同時中國政府又須允諾將吉長鐵路租借與日本經營。我們看來，如果這第二號的要求能發生效力，則日本自然鞏固其中國的地位，而支配這些最富饒部分的中國了。日本支配了這最富饒部分的中國以後，一切外來的干涉，都必受其排除的。可是門戶開放的樣子，與中國主權依然必作名義上的保持着呢。

第三號：關於漢冶萍公司者，漢冶萍公司是日本資本家所經營的。牠在中國是個最大的鐵業公司。（一）操縱大量的鐵礦與炭業。日本要求，俟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合辦事業。如未經日本政府同意，該公司所有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中國政府如未經該公司之許准，所有屬於該公司各礦之附近鑛山，不准由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此外無論何項經營，恐有影響於該公司利益者，概須先經該公司之同意。該公司的財產在中國之腹地。那裏，在二十年前英人已劃爲英國的勢力範圍了。該公司的財政困難的時候，曾向日本人舉債。所以牠之受日本人的支配與鞏固日方的政治勢力者，自不待言。要知道日本的鐵礦是缺乏的。如果漢冶萍公司長在日人支配之下，則日本關於鐵礦的供給，必能敷用多年。

（二）在漢口。

第四號：中國允諾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於日本以外之國家。

第五號：包括好幾條要求，比較上面四號爲完全。設如能發生效力，則中國不殊在日本保護



之下了。中國政府要聘用日本人充爲政治、財政及軍事等顧問。中國主要城市之警察機關，須由中日兩國合同管理。中國須由日本採辦半數以上之軍械，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採買日本材料。日本人在中國內地所設之醫院、學校及教堂等均准其獲得土地所有權。在中國腹地也一律如此。再，中國政府須准日本人在中國有傳教權。(二)此外，如揚子江沿岸之鐵路，須准租借與日本。凡在福建省內與台灣對岸之地，需用外國資本以謀發展者，非先經日本同意不可。

(二) 日本人主張向中國人大傳佛教，使能推翻耶教勢力。

日本提出這些條件，中國朝野譁然一致反對。同時他國輿論非議者也不少。甚至日本人中有些人對這些條件，有表示反對者，實不乏人。我們依這些條件看來，中國如果接受，則無殊犧牲其獨立的主權了。北京政府又無力量可對日本作武裝的反抗。且國內缺乏組織，財政更形困難。中國的軍隊在那時與最有武備的日本又不堪一比。歐洲國家因大戰的關係，自顧不暇。美國雖反對日本此舉，然中國不能望美國與以武力的援助。長期談判，了無結果。到了五月，

日本就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哀的美敦書，要求接受首四號中大半的條件。第五號暫俟後再討論。中國在強力威迫之下，只有不得已而退讓，互換字面，終至接受了日方要求的許多條項。第五號的條件名義上雖說延期再論，實際則其中的許多條款已見施行。日本顧問聘用於中國政府者，為數漸增，而其勢力也漸膨脹。

東部內蒙古，當一九一六年正是秩序混亂之候，日本大可以維持治安秩序為口實，作更進一步的要求，如然則中國也只能再空口說白話的反抗，幸那時東京方面的態度已是比較的和緩了許多，可以妥協的。

日本之欺凌中國，是絕無疑義的。日本在國際上地位的重要，於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益見顯明。因為那時日本在北京的署理公使，竟代表北京使團正式提出反對袁世凱推覆共和，恢復帝制之不該。日本代表在北京使團中不過是一分子；可是日本已就要單純以外交的方式來壓制德國了。一九一六年七月，日本復與俄國協商，這可說是波子瑪斯條約而後日俄攜手的第一次。俄德戰爭中，日本曾助俄國運輸軍用品經過西伯利亞。後來日俄兩國且同意彼此

不加入任何同盟，不與任何第三國家協定去互謀頡頏。倘日俄在遠東的利益發生不安全時，日俄須互助以籌對付之方。這雖不是正式的同盟，而是一種共同行動的同意；然而這種同意與英日同盟都是增進日本在國際上地位的重要不少。換言之，日本因歐洲最有勢力的英俄，委實給日本以很大的威嚴了。

###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的中日關係

世界大戰告終，凡爾賽條約成立，日本又增加了支配中國的勢力。當一九一七年的春季，日本已就得了英法兩國的祕密保障，在和會幫助日本爭取德國在山東的利益。惟意俄兩國表示反對。到了一九一七年，中國第一次與中歐國宣布外交破裂後，就正式加入參戰，日本的利益更見順旺。因為當時中國北京政府內閣總理段祺瑞氏是親日派的首領，同年十一月「蘭星石井合約」(Lansing-Ishii Agreement) 美國承認日本因地理上接近的關係，在中國有特別利益，尤其是在與日本屬地接壤部分的中國有特別利益。這樣看來，則不異把這

亞洲最大的共和國送於日本帝國之手了。一九一八年五月東京和北京方面又有海陸軍的協商，以防免俄國革命影響及中國的北部。日本這一舉，簡直是以武力來恐嚇中國，要強行二十一條件第五號的旨趣了。加以中國政府又向日本政府作多次的借款，而以鐵路、鑛山、森林、電信及稅收爲擔保。適遇俄國一九一七年發生革命，自顧不暇。日本乘機無人牽制之便，在滿洲、蒙古及山東格外建築了許多鐵路以固其勢力了。大戰結束，巴黎和會，日本雖經最有能幹而善於外交的中國代表團的反對，強烈的反對；而日本終獲得德國戰前在山東的利益。

無論如何，日本政府對中國人民是窮於應付的。中國人的國家主義思想發長很快，尤其是表現於中國學生階級者爲最顯著。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歸還山東財產的消息傳到中國，舉國人民憤怒之氣有如騰沸，尤以學生界熱忱報國之情爲最激昂。中國人民仇日心理與時俱長。當時中國之所以不與日本宣戰者，爲的是因爲中國的軍備過弱；所以祇有抵制日貨是中國的有力武器。一九一九年日本因中國抵制日貨的關係，商業上之損失不堪。到了一九二〇年段祺瑞場台，親日派失敗，日本兩年來關於山東問題之企圖及建議盡歸泡影。中國在

政治上雖無能爲力；然而人民仇日心理，日甚厲害。這給東京政府對自己的大陸政策的高明，根本發生懷疑了。

###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五年日本與西伯利亞

一九一七年俄帝國政府傾覆之後，戰中被虜的捷克斯拉夫人（Czech-Slovaks）仍欲回去歐洲，聯同協約國軍隊作戰。他們唯一的可通之路，只有從東部西伯利亞及太平洋了。但是西伯利亞因俄國革命發生的關係，秩序混亂，取道從那裏過，安全難保。到了一九一八那一年，協約國爲示威起見，出兵西伯利亞，而以日美兩國軍隊爲最多。日本出兵量數之巨大，尤爲人們意料所不及。因爲西伯利亞混亂之故，普通人都以爲日本於參加協約國出兵示威的目的得達而後，必尋索理由，在西伯利亞不肯退兵。藉口爲保衛高麗的邊疆，爲保護在西伯利亞的日僑，或許日本會在西伯利亞與新立政府發生關係。一九二〇年因赤俄的亂匪在沿亞穆河與薩哈連對岸的廟街（日人稱尼港 Nikolajevsk）地方慘殺了幾百日人。日本在該地的

領事也身死此難。人們都怕由此會引起更大的糾紛。可是捷克斯拉夫最後的一支軍隊於一九二〇年九月從海參威動程返國後，英美法意日本諸國也先後退兵。雖則日本的軍隊駐紮於近北滿的海參威者不少時日。然也終於一九二二年盡數退出。日本政府後以廟街的殺案爲理由，依然佔據俄國部分的薩哈連。日俄兩國曾經爲此開了好幾次談判，而結果全無。這樣直至一九二五年春，日俄兩國始立約，恢復邦交，日本軍隊接而撤退。雖則在薩哈連北部好幾處的炭及礦油由俄國租與日本；然而無論如何，出兵西伯利亞於金錢上的損失，和國際上的交惡，是其自然的結果。日本所得的光榮至微，而所生的焦慮就不少了。除非日本有偉大的政治家出而繼續經營，使西伯利亞成爲日本的殖民地纔可；不然則是無所補益的。

### 日本在巴黎和會和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

在世界大戰期中，日本既是一個重要的參戰國。那末，日本在和會中的地位是不可漠視的了。日本代表所爭求的僅限於遠東與太平洋的利益。日本在和會中曾提出人種平等的問

題；然而諸國代表全不理會。日本在和會中所爭獲的並不少。她爭得德國在山東的利益，受國聯委託管轄德國在太平洋赤道之北的諸島——馬利亞納 (Mariana or Ladrones)，喀羅林 (Caroline) 及馬沙爾羣島 (Marshall Groups)。國聯董事會，日本佔五常任委員之一。無怪乎，日本國勢之所以蒸蒸日上。

### 一八九四至一九二一年的日美關係

一八九四年後日美邦交上已起轉變了。從培理赴日通商起，可說是日美兩國互示的態度是至誠而至親善的。美國在遠東既不被嫌疑有領土的野心，且她的行動上又屢表示有與太平洋隣國增進友誼的誠意。美國對於新興的國家，都無不以兄長的态度去愛護。美國從前對日本也是如此。拳匪暴動之後，日美兩國就圖共同保持滿洲門戶的開放。當日俄戰爭的時候，美國表同情於日本。紐約銀行甚至有借巨款助日抗俄者。美總統 羅斯福氏也就是親善日本的一人。羅氏的政府，自然是對日本表示袒護了。在日本方面，只是以西方大國看待美國。他

們對美國沒有甚麼懼心，原因美國對日本友誼僅是友誼，沒有甚麼野心雜於其間。日本學生負笈來美者，委實接踵不絕。他們歸國之後，還是羨慕美國。且美國分明就是日本絲茶的大市場。兩者之中尤以絲在美國較受歡迎。中國人用日本的絲，大不如美國人用日本絲那樣多量。日本爲回報這一位大顧客起見，從美國購買大量的棉花，工業品，機器，鐵鋼等。

到了一九〇五年，日美邦交就開始衝突。日本有一班人民以爲波子瑪斯條約中有爲日人所不滿的地方，美國應負其咎。可是不久這種憤恨美國的心理便烟消雲散。別的衝突原因則層疊而來。其中最先而最要者其爲日人入境問題。按美國太平洋沿岸諸省，備用低價工人，以資發展地方；然而後來中國工人爲美國法律所限制。在歐人可能急快羣來之際，日本的不諳技藝的工人，就應運大幫而來。他們在美所得的工資，遠高於日本國內自不待言。他們擁擠而來，尤以在加利福尼亞省爲多。日本工人入美境的數目，經夏威夷被美國歸併之後，就忽然劇增。這大批的低價日本工人擁進而來，美國太平洋沿岸諸省人民不勝失驚，特別是美國工人聯合會不勝失驚。日本人是不易同化的。他們國內人口增加又如許迅速，倘美國政府不設法



加以限制他們入境，則美國太平洋沿岸諸省，人口稀少的諸省，必形成極多數的非美籍的羣衆擁入的地方。這是自然的道理。日本工人生活程度至低，白人那能與之競爭？倘美國政府對他們入境不加限制，美國工人必陷於失業的狀態，而太平洋沿岸諸省，必至由美人的社會變爲日本人的社會無疑。爲此問題擔慮的人所發的這類論調，自有相當的理由。可是依著者的管見，他們所發的這種論調大半是無所根據的。因爲日本人實際上還是比較中國人來得容易同化。他們喜歡學習所在國的言語，風俗及達到當地的生活程度。就以治事之效率，營業的種種，從整個說來，都足以與南美洲移來的人民相匹儔的。有些日本學生在美學成之後，仍續居美國，或行醫或當教員。他們在美國社會中會享有盛譽者；可是因爲種族上之偏見，要融化一定合理數目的日本人就比不得融化希臘人或意大利人那樣容易了。美國人得了一種錯誤的印象以爲日本人是最不誠實而最不道德的。都以爲他們是爲着做日本政府的暗探而來的。有了這類的成見，自然兩國間的衝突，就不可避免，日美人民通婚及同化上就感困難了。當一九〇〇年，日美糾紛已成事實。東京政府爲求避免與美衝突起見乃通過法案限制日人

移民去美。一九〇三年美國芝加哥工人大會就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專事考究日人入境的問題。考究的結果，對日人入境主張反對。一九〇五年美人在舊金山又組織了一個聯合會，力主拒絕日本人高麗人入境。到了一九〇六年舊金山學校當局，欲把日本學生與美國學生分開，事經總統羅斯福氏的干涉，始將原案打消。但該案的打消是有條件的。聯邦政府答應以後禁止日人陸續從檀香山、墨西哥及加拿大移入美境。美國國會於一九〇七年就通過一條法律，命總統執行拒絕劣種人民繼續入境。美總統根據國會公意就宣布禁止劣種人民入境。美政府這種舉措，依美國與外國間的現存條約看來是否合憲，尚屬疑問。後來，美總統與日本代表談判協定一個所謂「雅人合約」(Gentleman's Agreement)。在這一個「合約」中，日本同意以後禁止日本工人階級來美。(一)

(一)除非先前有住家在美，及對已在美境之日人有父子、夫婦關係者，不得進入美境。日本默願「雅人合約」在夏威夷發生同樣效力。

一九一三年加利福尼亞省議會不顧總統威爾遜氏之意見，通過一道法案禁止日本人

在加省持有農地僅可短期租借不可長期私有。一九一七年俄勒岡愛達和 (Idaho) 兩省在立法上也有類似的討論。依照他們的這項立法，日本人是不得歸化爲美國人民。（惟在美國生長的日本人不在此例。）日本人對美國這項立法，深致反對，一來因爲美國人對日本人的感覺漠不加意；二來因爲好像這種排日有不可遏止之虞。在日本政府看來，美國這項立法對日本並沒有多大關係。實際上日本人能夠來美持有農地者，爲數就極稀微。依一九〇五年的調查，日本人在美國本部者僅有一〇〇〇〇〇人。其中能占有農地者，其數目不關緊要。不過是：美國既然准日本人與其他國家人民在美有同樣的權利，那末，這種立法，似有違反條約的義務。還有一層，就是日本人受這種立法的排除，卽不異列日本人爲劣種民族之一呢。極度愛國而又敏於感覺的日本人對此那能不起而反對？美國人在立法上如許排洩日本人，簡直是白種人對異種人的一種普通的政策吧了。然而他們可以大閉其門來反對異種民族，而卻不容易異種民族在其自己國家同樣關起門來排洩他們。就以澳大利亞來說，那裏反對日人入境的民氣是不弱於加省的。雖然英日同盟有效的期中，還是如此。真的所謂「只准宰相打火

把，不准小民燃油燈」一樣的豈有此理了。

日美衝突的來源，多由彼此在遠東的政策。一八九八年美國佔據菲律賓，同年又併吞夏威夷。這由美國人看來是環境勢力所迫成，而不可避免的結果。從日本人看來，是美國欲謀中國的初步。不久，美國真如日本人所懷疑的開始在中國爭持所謂「門戶開放」的主義了。一九〇五年波子瑪斯條約所給日本的利益，也為美國所威嚇了。我們記得日俄戰爭而後，美人哈里曼氏要求日本把南滿鐵路賣與美人，事經日本拒絕之後，哈氏又向俄國交涉要收買俄國在北滿的鐵路。美國資本家還希望向中國租借鐵路，好與日本在滿洲的鐵路競爭。此舉因為日本政府之反對而罷休。不久，又有諾克斯的提議 (Knox proposal) 要收買日本在滿洲的鐵路，而由國際委員會經營。這一個提議，在美國人看來，純然是要保持中國門戶的開放，和以中國獨立為目的的；然而在日本人看來，以為這是出於美國自私自利的動機，及驚嚇日本經重大犧牲而得的戰勝利益。美國接着又在中國投資，美銀行家聯同六國要借款於中國。一氣進行，直至總統威爾遜氏之勸而止。美孚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 後來獲得了部分

的壟斷中國的油田，雖則所壟斷的時間極暫。此外美國又有一個公司與中國政府商議在台灣對岸的福建省建築了極大的船塢。一九一六年美國其他資本家又創議借債在山東築路與日本在那裏的利益競爭。大戰期中，美國的輿論對日本侵略的行爲，至深反對，中國又因美國的關係，一九一七年始宣布對德絕交。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在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美國居中最佔重要。在巴黎和會中，美國又是反對日本爭求獲得德國在山東利益的大國。一九二〇年，美人再着手組織「新財政團」(The New Financial Consortium)以支配借款於中國爲目的。日本亦爲該團之一員；然自願不把滿洲與東部內蒙古涉及該團範圍爲條件。美國上舉的活動，在普通美國人心目中，都以爲是正常的。美國在亞洲所希圖的只是機會均等，門戶開放。如說美國有帝國主義的希圖，未免有點冤枉。然而由日本看來，以爲美國向西伸張領土，是胸懷叵測的。在過去僅有一百年的時程，美國竟跨密士失必河 (Mississippi River) 而至洛磯山 (Rockies) 佔領太平洋的斜坡了。從中日戰爭而後，又大在太平洋擴張其勢力，佔據夏威夷，菲律賓，並投資於中國的礦山，鐵路，及干涉遠東政治。將來美國的行動如

何，誰敢相信？由此看來，我們自然不能怪日本人憤恨美國在遠東所持的門戶開放政策，是一種自利的計劃呢。換言之，誰能相信美國在中國商業的擴張與投資，不是在那裏與日本人鬪利呢？

許多美國人極疑慮日本在遠東與太平洋的希圖。他們以爲日本現在僅是期待機會，機會一到，日本就可奪佔菲律賓、夏威夷，甚至美洲的部分也有發生危險的可能。他們以爲夏威夷人口中，日本人的成份這麼多，都是可擔慮的地方。他們又作無稽的謠傳謂日本人對墨西哥、中南美洲諸國的政治策略怎樣怎樣。他們以爲日本在太平洋的船隻一日一日的增加，美國船隻則一日一日的減少。他們未曾誤過任何機會去喋喋放大日本在中國的勢力和政策。也許日本極少數的過度愛國主義者會期待機會之來，佔奪夏威夷與菲律賓的。如果日美兩國作戰起來，夏菲兩島一定不免先受襲擊的；可是日本負責的政治家，是從來未曾想過這類問題的。要知道日本對中國方面的事情，已消散了她的精神了，安能兼顧其他？日本在太平洋的貿易雖則極力發展；然無論如何不會有甚麼危重的蓄意，棄和平而取武裝的方法去競

爭的。

日美兩國間因中國問題而起的衝突，經一九一七年石井所領導的委員會來美交換意見後，已有部分的和緩兩國的態度了。美國曾坦明的承認謂，國與國間既然接近，邦交上必產生特殊的關係，因之日本在中國自有特殊利益的存在，日本屬地最與接壤的地方，尤其是如此。美國當時相信日本必保持中國門戶的開放與尊重中國的主權的。日本對美國所發表的，早已表示同意，並對美國宣告謂：「日本反對任何國家在中國獲得任何特殊利益或特權，足以危害中國之主權及領土完整者。日本承認任何國家人民在中國得享受工商業上之均等機會。」這種「同意」，日美兩國的輿論在愛國的觀點上，並不多大慶幸，因為日美政府雙方互相退讓之點甚多之故。日美這種「同意」之後，中國人民聞得之下，羣情反對，北京政府正式聲明否認日美這樣的協定，並謂，無論任何關於中國的條約，如不是由中國自己願意參定者，於中國沒有效力。

誰也知道「蘭星石井合約」是不足解決日美兩國間的衝突問題的。到了世界大戰告終，

巴黎和會和凡爾賽條約成立之後，日美衝突形勢愈趨嚴重。就以出兵西伯利亞來說，日美兩國是互相疑懼的。在日本方面，以美國出兵干涉接近於日本的亞洲地方爲可恨；在美國方面，以日本軍事當局漫不守約，要假參加出兵之名，圖永久佔據西伯利亞一部之實，爲不滿。加以凡爾賽條約以德國在山東省的利益，定給日本一節，多爲美人所詬病。這也即美人對於凡爾賽條約所反對的一部分。日本佔據雅浦島（Yap）尤爲美當局所反對，因爲雅浦島是太平洋的重要海底電信的中心。此外，尙有加羅林羣島的一個，在和會中日本承國聯的委托行管治權。這一個委托也是美國所引爲不悅的。威爾遜總統曾有特別條項註定過那一個島應由國際共管，不許委托於任何國家。日美兩國的情感，前途是不可樂觀的。有一次傳謂美國在西伯利亞將有租界的取得，日本人聞得之下，不勝愕然。再因美國在中國的貿易日趨擴張，中美無綫電業增進，美國所創導的銀行團又欲借款於中國，日美海軍的設建又互相競爭，凡此種種無一不足惹起日美兩國之糾紛的。日美兩國人民相信日美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英國呢，說不定也要捲入戰渦的。因爲英日同盟的關係，不特會牽動到大不列顛，且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或全



部的不列顛帝國也許會牽動的。日美兩國的形勢是如此，倘不速事設法解決兩國間的衝突問題，結果必至戰機一發不可收拾。

### 華盛頓會議

日美在太平洋的政策互相衝突，爭擴海軍，兩國戰機已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了。美國爲求避免這種衝突起見，乃於一九二一年冬在華府召集國際會議。被邀出席者有英、法、日、中、比、意、荷、葡等數國代表。這一個會議的結果，曾移卻了國際間不少的衝突原因。不特日美兩國邦交上的困難減輕，即中日兩國問題也解決了不少。當時議訂一個條約，限制海軍增加，並禁止各國在太平洋各島添設砲台。英、美、法、日又有所謂「四國公約」(Four Power Treaty)的成立，規定倘以後，該四國在太平洋的衝突，不能用外交方式解決者，應即召集四國會議，以謀解決辦法，並各國在太平洋的權利，應彼此互相尊重。自該公約成立之日起，日英同盟便告終止。此外，有一個較有力量的條約成立。這是關於中國的。各國約諾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的完

整，尊重門戶開放原則。再有一個條約，各國許諾中國關稅再行釐定。在華府會議中曾通過了許多議案，縮減列強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明白規定今後一切條約的訂定如有關及中國者，概須公布。中日兩國也趁着這個機緣作部分的解決了他們在山東的糾紛。日本當時對中國的態度比較一九一五年委實緩和得多。華府會議所訂定的條約，從整個看來，是差強人意的。日美在雅浦島的問題也於此一會議中協定解決。「蘭星石井合約」也照樣通過（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日宣布失效。）我們從華府會議的一切經過看來，對原來的目的上，當稱是最有成績的了。太平洋的戰機也減縮了不少了。雖則該會的結果不能令日美一切人民盡能滿意，有些日本人以爲在該會議中，日本讓步過多。同時又有些美國人說，該會議所定的條約能存在一日，即日本在亞洲東北沿岸能多支配一日。然而無論如何，華府會議之後，諸國的怨聲已暫時的幾乎消沈了。該會議所通過的議案，重要的均被批准施行了。

華府會議後，日美的親善邦交續持過了有好幾年之久。因為有了華府會議諸條約的束縛，日本對中國的政策纔暫時的比較溫和，實際也減了美國人對日本的許多議論。後因日本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地震爆發，美國人民對日本災民捷快賑救，感動了許多日本人的心靈，然而到了一九二四年，美國竟強硬的廢止了「雅人協定」，禁止日人入境，因此又令日人舊恨重起。實則「雅人協定」的施行在十五年中，日本人入境者僅有一二〇、三一七人，出境者有一一一、六三六人。計起來祇增加了八、六八一一人（另有七、四一五人從夏威夷移來者）。這項增加都是婦女的數目（實際增加了三八、八三三人）。她們多是已居美境日人的妻或未婚妻。所以，這些婦女的進口都是一種必要的附加。因已來美國的日本人多是單身的男子呢。可是，加利福尼的排日風潮尙續不斷，該省議會又於一九二一年已要求國會通過「排民律」（Exclusion Law）在案。亞利桑那（Arizona），華盛頓（Washington），得撒斯（Texas）諸省又先後立法拒絕日人對於土地權的享受。到了一九二四年新的「移民律」成立，禁止一切不能獲得美國公民資格的外國人入境。這自然包括日本在內。不受此例限制者，僅有政

府官員，商人，旅行者，離美復歸之合法外人，外交人員，大學教授偕其妻子（年在十八歲以下者），並年過十五歲之學生。這項法律雖不指明廢止「雅人協定」，然已實際將「雅人協定」取消了。美國現在執行這項移民律異常嚴厲。當美國國會將要通過該律的時候，有外交部的勸止，有日本大使的表示反對；可是國會方面，不大理會，一意通過。當時的議員，都以爲移民律應全受國家立法機關的支配，不容有國際條約的牽制。美總統曾有延期施行這項法律的勸議，終不得國會的同情。

一九二四年的「移民律」通過之後，日本國內極力反對。一部分因爲該律的內容有以日本人與亞洲其他人民同樣作劣種看待，另一部分因爲當該律通過時美國國會裏諸議員的態度，令人聞之可惡。聽說國會辯論該「移民律」時，無甚禮貌，有些議員發言時竟有怒容迫人者。這項移民律在日本人看來，簡直是無禮的侮辱。因爲日本人已就與歐洲移民同等看待的。且他們每年所進口的都不及二百人。這並不是帶有危險性的數目呢。查贊成該移民律的人，大都以爲許准外人入境與否，純然是美國內政的問題，不須徵求任何第二國家的同意。

日本人未必是劣種的；然而因爲他們在東方的背景有不同之故，比不及歐人之能易同化。同時，日本方面不須以增加日人來美，驚嚇美國。這些理由，在日本人看來是不充足的。他們不特引以爲怒，而且認爲對日人有莫大的損害。這麼一來，在日本就有顯明的反對美人的行動。幸日本政府捷快的彈壓，致沒有暴行的發生。總之，日美兩國的邦交是日趨困難的。更因美國在中國繼續活動，與努力於海陸軍的準備，而日美邦交的困難，自然必至有增無已。許多日本人都以爲美國似乎是財富最大而又喜戰好鬪的國家。在這種國家裏面，理想主義自會減少，帝國主義必日增加。

### 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的中日關係

自華盛頓會議而後，日本政府對中國的态度已比較的溫和了。在華盛頓會議中，日本同意退還山東財產於中國，定期取銷日本在中國郵局。(一)同時在中國方面的反日風潮也不如一九二二年以前那樣的厲害了。大戰後，日本對中國雖然有縮減了許些侵略的行爲，然

而這並不是說日本在中國的利益減少，不是說她對中國遏止了她的求寸得尺的野心。日本在滿洲極迅速的發展其租借地。就大連而言，好幾處的工業上的大工程的開設是逾恆捷快的。同時在滿洲又有計劃建築鐵路，備作更遠的發展，甚至大有將侵入俄國的勢力範圍內去的趨勢。日本又同其他強隣一樣的將一部分的庚子賠款退還中國，這樣安排，不特於日本無害，且藉此或有增加其在中國的勢力的可能。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日本紗廠工人有抗日罷工風潮的發生，五月三十日滬上學生爲援助工人巡行示威在公共租界被外國警察開鎗掃射。這一場慘案發生之後，全國民氣怒不可抑，反對英日之聲浪益高。結果，中國民衆一致抵制英日貨物。

(一)譯者按，日人在大連旅順和南滿鐵路地帶等處之郵政，始終並未撤消。

一九二七年三月間國民革命軍北伐，佔至南京時，對外國人待遇失當。日本領事館被抄，領事偕數日人受傷。日本政府於此，連同其他受害四國，要求處分該失行軍隊的長官，向受害國道歉，賠償損失。不久，革命軍繼續向北進展，日本決然出兵山東。

一九二八年五月革命軍北伐進至濟南，日本軍隊就與革命軍發生衝突。(一)到了次年三月，日本與中國國民政府數經談判，濟南事件就暫告解決，直至五月日本纔陸續退兵離開山東。

(一)譯者識：日本橫蠻，目無國際法紀，阻梗吾國統一，辱殺吾國外交官，蔡公時先生等即慘死於此難。吾譯至此，痛懷往事，目擊現時東省，不禁與「倭寇不滅，吾中華何」之感。

因為中國反日民氣激昂之故，日本在滿洲的地位更犯華人之怒。然而日本投資於滿洲的數量，並不因而減少。滿洲那裏的炭，尤其是鐵產，於日本工業發展上至為重要。可知日本是不肯放棄其在滿洲之利益的。中國人在那裏要建築他們自己的鐵路，以葫蘆島為其發展的出路。滿洲在張作霖治下，地方尚稱安寧，日本人在滿洲的生命財產，也無甚危險，彼此在武裝上也沒有發生過甚麼衝突。

一九二八年六月革命軍勇猛進展，張作霖被革命軍勝勢所嚇，迫退瀋陽，於火車途中被炸身死。(二)此場炸案，傳聞謂日本人應負責任。日本受這樣控罪，後來就引起日本國會的危

機。張作霖逝世，其子學良繼承所有軍權。不多時，學良就有傾向國民黨的表示，對日本方面，也並無發生如何糾紛。中國人民對日本雖有猛烈的反對，行動方面尚無越軌之可議。但依我們顯明地看來，滿洲仍是危險的地方。

譯者按：此役張作霖因怵於日本之乘機入寇，乃通電息內爭，退兵關外。

中國人有努力於恢復關稅自主和取消治外法權的運動。這種運動於日本是特別困難的。何以言呢？因為日本的國外貿易在中國者最居多數。倘中國關稅增加，則日本所損失的比英美任何一國都要大。無怪乎，中國要求將一八九六年的關稅條約，根據平等與互惠的原則去改修；然而初次數經談判，毫無結果可言。後來，英美及其他諸國均同意中國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實行收回關稅自主。日本呢，遲遲不肯同意，到了不能再延的最後的時刻纔勉從所請。

再，中國要求取消治外法權，其他諸國均先後表示同意，而日本則依樣遲延，到了一九三一年六月尚不表示終難免於姑允。日本之所以如許獨遲退讓者，蓋以為其在中國的利益比



較任何國家在中國的利益重要的緣故罷？

### 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日本與世界和平

我們從上面已經知道，華府會議而後，日美兩國於海軍的限制，與太平洋形勢的改變，已能滿意兩國，而緩和兩國間的緊張的仇視空氣了。從那時起也就是日本外交政策上的一個新紀元了。日本可不怕所謂西洋的海權國家了。同時就一躍而為國聯董事會的董事之一了。在世界社會中可謂居有榮位了。日本因疲於戰爭，一經一九二三年地震巨災，復因經濟困厄，所以華府會議以後的十年中，日本的外交政策漸和平，裁減海陸軍，從五十成減至二十七，八成的裁減海陸軍。到了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會議，日本提議海軍作比例的增加。這項提案，因經大海軍家的反對，後就想出一個調和的辦法，將原案加以縮減。

誰都知道日本是一九二八年參加簽訂「非戰公約」的國家。然而日本之所以遲遲纔正式批准該公約者，不是因為該公約目的上的考慮，而是一面因為國內議論的紛紜，另一面

是因爲該公約中措詞上他們認爲有損失天皇的尊嚴。

日本現在一來因爲她是和中國隣居，二來因爲現在尙是靠武力勝於國聯的世界，日本不能信有和平，所以自一九三一年的開頭，她就如過去四五十年一樣的準備隨時作戰了。

**參考書：** Abbott, Japanese Expans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Inliek,

The American Japanese Problem; Millis, The Japanese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McCormick, The Menace of Japan; Kawakami, Asia at the Door; The Secret Memoirs of Count Hayashi; Prinkley,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Hornbeck,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 Buel,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The Japanese Year Book; Buel, Japanese Immigration.

## 第十二章 中日戰爭後日本國內的發展（一八九四—一九三一年）

我們在前一章已經把中日戰爭結束後，日本的國際關係說過了。從外國人的立場看來，也許一八九五年以後的日本事件是最有興趣的。可是我們要研究日本的发展史，如果不把日本在這個時期中的內政變遷來述說，無論如何是難稱完璧的。

### 政黨與內閣的鬭爭

日本政治生活中最顯著的事件，便是衆議院與內閣的繼續的鬭爭了。這種鬭爭，幾乎是與憲法頒布同時開端的。衆議院受政府黨的支配，主張內閣須負責於國會。另一方面，主持行政的人因為得了天皇的言聽計從，所以對於所謂「責任內閣」不大理會。他們都是封建時

代南方諸重要「封土」的代表。他們在思想上，不願給與人民以干涉政府的權力，其主要原因在他們不信任民衆，同時也是因爲自私自利的關係。中日戰爭而後，薩長兩藩以其掌握海陸軍權之故，其勢力更加鞏固。當中日戰爭期中，日本一切內爭盡息，一致擁護政府。爾時，伊藤氏主持內閣。中日戰爭了結後，伊藤氏就與「自由黨」提攜，並聯合保守分子使得國會的擁護；然而這種聯合的擁護不能久持。內閣失掉了衆議院多數的同情，伊藤氏就於一八九六年冬辭職引退。

這裏我們如果詳細的寫述日本三十餘年的政治史，未免有涉雜亂之嫌。所以只得把日本政治上的重要事件略加申說，且這些重要事件的述說尙難免有雜亂之嫌的；然而這是無法，要求幫助解釋日本重要政憲的發展，就非如此莫辦了。

爲求行政上之便捷，內閣須有政黨的擁護，尤其是下議院多數黨的擁護。要知道，內閣所欲舉的一切，未必都要經國會批准的。不過如果內閣只得有少數黨的擁護，則政治必不安穩。日本內閣獲到政黨的擁護，是效英國窩爾坡爾 (Robert Walpole) 的故智。內閣賄賂國會

內的腐敗議員從中作怪，使國會在立法上不能有大的成效。如此，則國會所做的多是阻難內閣的提案。在一方面，內閣常為卸職武士所支配。他們是有志改革日本的。他們中以薩長兩藩為最強而有力。另一方面因衆議院的議員多係政黨的人物，他們對政府既是站在相對的地位，則其所主張的自然是一「責任內閣」了。

伊藤內閣場台之後，新內閣得有力的「進步黨」之擁護而成立。由該黨領袖大隈氏長外交。可是氏因在內閣中受同僚的為難，於行政上不能指揮裕如，就行退職（一八九七年十一月）。新內閣不久解散。伊藤復應詔出而組織內閣。不霎時又以「憲政黨」（係大隈所領導的進步黨與沼潤守一所領導的自由黨合而組織的）之反對不能續持主政。當時全國驚然。天皇就依伊藤氏的推薦詔命大隈與沼潤守一兩氏共同組閣。這個內閣似乎是願對國會負責的，然而因為憲政黨內部分子過於複雜，裂痕日甚。憲政黨內閣的生命又僅如曇花一現而倒台。該黨也因而解散。沼潤守一派仍取名為憲政黨，而大隈派則復以進步黨為號。召憲政黨內閣倒台，繼而組織的為薩長藩閥內閣。藩內閣雖有憲政黨的助力，也終難久持。後來伊藤

氏目擊時艱，就接憲政黨（一九〇〇年）的總裁之職，把該黨改組，取名爲「政友會」。伊藤復出收拾時局，身任首相。雖曰伊藤氏對憲法是最負責的。他的行政對國會是獨立的。可是伊藤氏事實上卻承認了政黨政府的原則。一方面主張內閣有須以天皇之意趣爲意趣。另一方面又要獲得衆議院內政黨的擁護，以求行政上之便捷。惜當時立法，行政兩機關尙難調和。伊藤內閣未及一年又復退職。伊藤是一個卸職的武士（長州）。爾時，日本國內政治的形勢可說是三角鬭爭的，是伊藤（受政友會之擁護）派，政府武人派，大隈派三角鬭爭的。伊藤內閣既倒（一九〇〇年），政權就旁落於武人之手。桂氏受武人之擁護，出而組閣。其時適日本與俄國戰爭，一切內訌俱息。到了一九〇五年桂內閣倒台。桂氏因與薩長派分裂，另組政黨，名爲「立憲同志會」，以山縣爲總裁。山縣而後，又由七十七歲老翁大隈氏得國民黨人之擁護登台主政。大隈氏是主張責任內閣的。他之重握政權，可說是責任內閣鬭爭中的一種勝利。這種勝利是形式的，因此終於一九一六年被迫引退，而由寺內氏組閣。寺內氏是武人的代表。他與大隈的政策同是主張侵略中國。一九一八年寺內政府下台，繼之者爲原內閣。原氏是政友會

的領袖，同時也是由布衣而登首相地位的第一人。在原內閣的時期，可說是責任內閣的凱旋時期。然而原氏不幸於一九二一年被人暗殺身死。他的內閣也於幾個月後傾覆。一九二四年政友會內部分裂成爲兩派。一派仍採舊名，另一派則取名政友本黨。一九二七年憲政會與政友本黨（或本黨）合組民政黨。一九二二年而後，主持內閣者依序如下：加藤、山本、清浦、加藤高明、若槻（爲由布衣而登首相之第二人）、田中義一（政友會總裁）、濱口（屬於民政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被人暗殺負傷）、若槻（現爲男爵係民政黨人）。

現在日本的重要政黨僅有政友會與民政黨了。可是實際的政治情形至爲複雜。因爲有好幾個含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已經產生了。他們是代表激烈的工農階級，同時也有許些智識分子的參加。這即足以表示世界大戰後日本的經濟社會的不安了。這些急進的政黨大都是一九二五年普通成人選舉頒布施行以後產生的。日本選舉制度改革後，選舉人的增加竟由約三百萬而至一千三百萬人。這樣，自然有產生無產階級政黨的可能了。從力量上論來，無產階級的政黨在一九二八年的普選，他們的投票總數不過佔總票數的百分之五。他們自

已門戶太多。所以在國會中主持一切的還是兩大黨，還是受中層階級及上層階級所支配的兩大黨。這兩大黨的由來已久。從一八八〇年以來，他們有自由黨，由自由黨而政友會，與由進步黨而至民政黨。我們如從這兩個黨綱上看起來，並沒有辨別的地方。然而各黨之所以爲黨者是因「人」的關係，「主義」不甚重要。日本人要加入某一個政黨，先要考慮的是「人」而次及「主義。」對主義忠心者少，對人忠心者多。這是在日本實在的情形。有些人說，這是因爲受了封建制度的影響，因爲日本的封建制度正式廢除，距今僅有五十餘年的光景。

日本政治上仍有許多暴動的事情，甚至衆議院開會的時候，尙不免此。如果急激主義勢力增加，暴動的次數必越多。日本有過度的國家主義派，有保守派，也同樣有急激派。他們或許會有發生武力的衝突。倘經濟上的不安再續下去，則革命的發生，不可逆料。

### 黨爭的結果

責任內閣的原則，在日本並沒有正式的承認過。可是已有折衷的辦法了。日本的政治，好



像百花鏡一樣的變遷。居相位的官吏，有浮沈上下的無常。而實際行政的官吏則沒有移動。因為實際行政，既在專家手中，職位之更換，自感不易。日本有所謂「元老」者，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們是著名的薩長藩閥的遺老，也就是領導日本維新運動的人物。可是這班元老在生者，現在僅有西園寺公望一人了。天皇對元老是言聽計從的。每當國家有大危難的時候，元老的意見至為尊重。西園寺公望年紀已老邁了。對於國務望其多得他的指導是不可能的。輿論方面影響於政府政策者漸多，人民的投票資格也漸低了。人民參加投票的把一八九〇年的數與一九〇二年的數目比較，實有增了一倍。一九一九年繼續增加，到了一九二五年更因為財產資格的廢除，投票人數的增加，更有可觀。普通成人選舉已成慣例了。民主運動也有長足的進展了。

## 皇室

我們要述說明治天皇於一九一二年臨終的故事，就當有細心的準備。因為他的事跡，世

人聞之較廣且確。明治天皇崩後，全國闐然。明治天皇是日本維新時期中的元首，是最受臣民忠心愛戴的元首。他能勤勞，有公共的精神，有遠大的眼光，有好的審辨力，且又喜受臣民的諫奏。他在政的時期，臣民對國家的忠心，日以鞏固。明治而後，嘉仁繼位。嘉仁天皇不幸體多疾病，日甚一日。一九二六年就由太子裕仁攝政。同年十二月嘉仁天皇（世稱爲太和天皇）崩，裕仁繼位，稱爲昭和。這位天皇比較最傾心於泰西思想。他曾廢除了皇廷中許多舊的習慣。他未登極之前，曾遊歷西洋。他極喜歡接見臣民。他的后配也是廣爲臣民所認識的。這位天皇與皇后出入常相伴，大有西洋皇者之風。這樣，不特可以證明日本的西化，且可藉以提高日本女子的地位呢。日本臣民對皇室的忠心，未曾稍失，也許可以利用人民這種心理來防免革命的發生。

### 一八九四至一九三一年的經濟發展及其問題

日本與中俄戰爭之後，國內的經濟生活已有驚人的發展了。一九〇七年政府收買私營

的鐵路，長達幾百里。工業也有鉅大的進展，大坂、東京及其他都會均成爲大工廠的中心了。我們到日本都市去旅行時，實不異身在工業化的西洋。日本最重要的工業有「絲」「紗」兩種。工業要區絲廠、紗廠林立。別種工業也漸隨而進步。歐洲國家因爲互相衝突之故，軍用品的需求，量數之巨超過疇昔。這許多軍用品，大都是從俄國供給的。印度那裏既有新市場的開設，列強在中國的競爭，因而減少。在這種激刺之下，日本的工業家已漸積富了。日本以百萬計算資財的富翁，已有五百餘人了。

銀行方面，無論是官辦或私營的，資本的累積，日有增加，人民的存款也日漸向上。火災、人壽的保險公司諸多出現，營業因而發旺。

本來日本許多工業都是由政府的提創與經營的，後來這種辦法就得改變。現在政府所管理經營的，僅限於獨占性質的幾種了。如保護關稅、研究所、試驗場及官助工業銀行等都是由政府經營的。科學方法發展林業的獎勵，是日本政府的上策之一。日本林地之所以廣大者，（一）此一原因。我們知道「魚」是日本最重要的食料，故日本漁業多受政府的津貼。關於農

業學校、試驗場的設備，目的在改良農業，增加農產，使能供給日本過剩人口的食料。經了這種新科學方法改良之後，日本農產的收穫，竟由十分之一增至一半。同時，日本政府又設辦農業銀行，長期借債於農民，利息至微。這樣可免貧農受資本家的壓迫。日本現在荒蕪的野地要開闢新的野地有須改良。凡此種種，都是受政府的獎勵，尤其是在蝦夷那裏的開闢，受政府的獎勵。

(一)日本的林地大半屬於國家及天皇所有。

日本人口的增加雖極迅速，大半食料尚係自給。日本的農民是自己耕自己的田。農民的生活既安定，而自己又能獨成一個階級。鑛產方面，已經發展了。日本在封建時代最著名是銅鑛，現在還是繼續的求這項有大量的獲得。鉛、硫磺等礦量數之多，超過國內的需要。日本沒有鐵鑛，日本所用的鐵，都是買自美洲及亞洲大陸的。日本炭產雖富，然而炭與火油都不敷國內的消費。水電力 (hydro-electric power) 曾經開展，惜窮竭之期，已臨目前。日本不欲發展則已，如則有須越境取得燃料與氣力。

關於船業方面，日本尤有驚人的進展。在一八九〇年日本船隻以噸數計僅有一四五〇〇〇噸。到了一九一〇年則增加至一六二五〇〇〇噸。一九一四年三月已超過二百萬噸。歐戰而後，日本因受環境的激刺，噸數依然增加。一九二四年更進而達至四八一五〇〇〇噸數了。因為政府的力予津貼與獎勵，日本商船的建造，纔有這樣的佳績。現在中國的揚子江及其支流，我們都看見許多往來如梭的日本商船了。同時，赴南北美洲、澳大利亞及歐洲等處的航綫，也有相當的擴充了。日本人的商業組織是最稱完密的。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商業中心都有他們組織的支部。現時日本最大的商業組織，可說是三井公司了。這一個公司經營的有多種不同的企業——工業、船業及商業。在財政和工業上的組織，三井公司已如日本政府一樣的趨向於政權的集中了。按諸事實，日本的經濟生活，已多受三井、三菱兩公司的支配了。他們的勢力更擴張而至政治上面去了。在財政方面，三菱公司是民政黨的靠山，三井公司是政友會的老板。由此，我們可見他們勢力的一斑了。

日本現在已不是專以農立國了。她在努力要執遠東及北太平洋商業的牛耳了。日本都

市的勃興，大有一日千里，自不待言。東京大坂，以人口論，早列入世界重要都市之林了。在市行政方面，在在有條不紊，政府廉潔尤爲特色。美國都市行政是比不上日本的。新式的自來水，暗渠，電燈，街車，公園，球場均無所不備。

日本國家的工業化尙未完全。日本人，若以個人對個人來說，在效率上，技術上，尙未能與西洋工人比較。日本工廠內的工人多是婦人與兒童，於工作的實質上自然不能一致。有許多地方，西洋人已用機器，而日本人則仍用人力。鐵鋼工業尙屬幼稚。日本沒有充足的資本，實行其國內發展的計劃。她在中國的野心雖大；然也以資本無措，不能籌劃裕如。日本在這發展的階段中，債務很重，人民的稅擔尙高。日本的經濟發展雖很快，然而俟至中國工業化起來，必要的燃料，鐵等，日本將無所取求。到了這個時期，日本的經濟發展，能否再續向上？這是一個最大的疑問。大戰後，日本受商業不景氣的影響最甚，要回到繁榮去也許是可以的；可是因爲地理上的關係，一九二三年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橫濱與東京不幸發生地震。人民性命財產損失不堪。地震而後，原狀的恢復竟有如許神速者，都足以證明日本人救危力量的偉大了。那

一次地震的爆發，固定的資本既有重大損失，告貸自屬難免。真是天禍日本了。降至一九二六年，日本工廠內的工人數目，纔與一九二一年相等。近兩年來，又以世界經濟不景氣之故，日本農工業復受不良影響。

我們觀察日本經濟的將來，危機潛伏太多。日本人口每年增加既超過全國人口百分之一。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年，僅有五個年頭，平均每年增加七五〇〇〇〇〇人。有一九二六年增加的總數幾滿百萬。這不是如歐美國家人民那樣死亡率的減少，而是因為死亡率與生產並高呢。日本人的生活程度，已提高了許多了。例如每人所消費的米糖已增加，肉類的消費比三十年前竟增加了一倍。日本人臨在目前的問題，就是生活艱難。要移民，則人民不願改變他們生活的方式，嚴寒之地如北海道就不願意移去。要去滿洲與高麗，也以生活程度的差別，不能與後兩處農民競爭。他如美國、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等地又被白種人排洩不能入口。所以日本人要以移民的方法來解決他們經濟的問題，是走不通的。節制生育，在十年前是一禁話。現在雖有公開的討論，可是這個方法實際能否制止日本人口的增加，又是一個疑問。要擴張

農業麼，因為地理的關係，已至束手。現在僅希望的就是日本人不以「米」為其食料的大宗，則他們的困難，或有稍許的救濟。

如果，日本作更遠的工業化起來，以其所生產的貨物去與外國交易食料，則他們的困難問題或可解決。可是表面上看來這並不樂觀。日本一九二八年全國唯一最大的出口，多過出口總數三分之一的還是生絲。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九年日本所出口的生絲及製成貨品的絲類，也不過增加了四五〇成。日本的絲多是銷賣於美國的。日本人靠土地生產的還是如許多量，而生產出來的東西，還是多賴一個外國去消費。所以，我們敢斷定日本要使國內工業化是困難的。總之，日本的工業，現在尚未成熟。他們多半尚在手工業時期。棉料紡織，製船等雖然全屬機器工業；可是規模較小，不足有為。况日本人向精工藝，而拙於工程機械之學。日本的人的工作效率既比不上西人，有好幾種必要的原料如鐵及火油等又感缺乏。他們所用的棉料多是買自外國。現時諸國多採保護關稅政策。外國的門戶深嚴，日本的國外貿易實際就受重大打擊。同時，印度，中國的新式工廠漸興，日本的市場勢必縮減。日本的人口，百分之五十至



五十五是農民，情形與意大利頗相彷彿。全國直接依賴工廠謀生的人民，僅佔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日本人的資本不裕，利息尚高。全國最重要的工業財產，尙是他們低價的人力。

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經濟的將來，與日本人所希望的相差太遠。無怪乎，日本在這世界經濟衰落中，日本人最感痛苦了。日本現存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也漸呈不安之象了。共產主義，法蒂主義均有人主張。這種所謂「危險思想」政府吃怕之下，只有取彈壓的政策了。

可是，日本有許些不可疑義的財產：（一）在地理上宜於國外貿易，（二）全國忠心於皇室，及（三）人民的能力克勝過渡時代的一切困難。所以，我們又可以說，日本的國運前途，並不是完全黑暗的。

### 教育的發展及其問題（一八九四至一九三一年）

日本教育的發達，和新智識的傳布是很迅速的。她的公共教育制度，在中日戰爭之前已就計定宣布施行了。中日戰爭而後，這種計劃已全實現，新的計劃又加添進上去。初等教育已

用強迫施行。初定四年，後改六年。現在的日本兒童幾乎沒有人未曾受過教育了。學術機關，實際上已是應有盡有的增加起來了。大學校內所產生的學者，對世界的智識之庫，也作有價值的貢獻了。日本的專門技術教育是特別著名的。婦女教育雖則未能如西洋那樣發達，然而總算有了很快的進步。教科書的統一，已成事實，教師的訓練，尤覺慎謹。他們已在努力去提高他們學者的能力而與世界名儒並列了。日本，尤其是東京，可說是東亞教育的中心了。中國學生到那裏去的實以千計。舉凡東亞重要的國家，都有派到那裏去留學的學生。

日本的教育制度，並不是沒有問題的。教師薪俸的微薄，教育經費有時移作軍事經費之用。高等教育機會求過於供。結果競考入校，不少有為青年竟抱向隅之悲。因此而影響青年學子身體殘弱，及厭世自殺者，時有所聞。課程繁重，修學時期過長。日本學生須學艱深的漢文，說與寫異的漢文。到了升入高等學校又須學習西文。個中困難，可想而知。日本的中學大學畢業生數目日漸增加，在社會中，就有「粥少僧多」之象。失業而貧窮的智識階級漸見危重。因為他們對現存的日本社會制度是不滿意的。

## 文學（一八九四至一九三一年）

日本報紙的銷路日廣，影響力也日大了。特別是中日戰爭而後，情形大有進步。現在日本沒有人不會閱報了。一個大坂每日新聞，銷路之廣，竟達至一百五十萬份。以政治方面來說，較好的報紙都有獨立的趨勢。他們欲批評政府，他們都是與路透社，統一通訊社合作的重要新聞機關。他們常以諷罵和報告不確的罪名受控。從前，日本政府對於新聞機關，多主操縱。可是現在不甚然了。報紙是平民教育的重要工具，雜誌也然。日本的雜誌發行頗夥，其中有高尚的文化價值者也不少。繙譯西籍，尙續增加。日本人寫作的書籍涉及現代各種題目者，大可汗牛充棟。文字方面，也求簡易。日本的戲院有三種：一是本地的，一是雜體的，一是純然外國式的活動電影，久已傳入。美國影片，尤受歡迎。他們現已自製他們的影片了。無綫傳聲機，留聲機漸至廣用起來了。此外，還有許多東西，他們都來幫助他們對於西洋音樂的賞識。日本的美術雖則還在向上；可是已不幸的成爲商業化了。有些美術家，工藝家仍在模仿古人，有些則趨重西派。

在這兩派之間又有所謂新舊合璧派。後一派勢力最大，可以說是真正代表新日本的一派。

### 倫理社會及宗教的情形

日本的倫理與社會的情形是最有興趣的。日本在其過渡時期中的生活有許多特點。都市方面已有驚人的發達起來了。雖則他們的都市行政是誠實的，是有效率的；可是終難免有社會及倫理問題的發生。

地震之後，東京不久復興。街道廣直，鋪砌整齊是其特點。巍峨屋宇，尤其壯觀。前用人力車者，現在除了農村地方外，都用汽車了。人力車差不多已絕跡於都市社會了。

西式運動頗為日本人所重視。棍球已成爲日本的國戲了。每當棍球表演的時候，旁觀的人如堵如牆。日本棍球會到美國去比賽過。日本網球最優勝者可與西洋運動家作國際的競賽。他如奪球戲 (Rugby)，聯合足球戲 (association football)，打球戲 (golf)，球戲 (hockey)，跳雪戲 (skating)，鬪拳戲 (boxing)，爬山戲 (mountaineering)，與野戲 (field sports) 等

都是日本人所愛好的。日本人參加好幾次窪林比（Olympic）運動會時，都有好的表演，曾得有冠軍游泳的成績。

日本有工人聯合會的組織了。在許久以前，他們受政府的彈制；可是一九一四年後，他們的會員數目大增，力量亦漸重要。他們曾經宣布罷工，做他們的武器。其組織的力量與西洋許多工業國家比之不相上下。日本因為人口的密度增加，食料發生問題，農民受痛更深。雖然有些農民有組織的關係，曾得到生活上的改善；可是無論如何，在農業區域內的現象是不安的。又因為有些係由外國輸入，國內的農產價格自然下落。同時入口的食料須付關稅，價格必貴，工人的生活費自然增加。為要維持生活，則工資的提高，在所不免。工人提高工資，則生產費增加，日本的貨品在世界的市場上必受打擊。在這樣環境中，信仰社會主義的人，自然漸見增加。雖則社會主義尙未能深入民衆，政府雖則禁止他們散發傳單宣言等；可是青年學生中參加俄國式的共產黨者，大不乏人。近來日本對於「危險思想」的防止，是煞費心機的。日本最慘痛的是婦女們在工廠裏頭做工，常被殘酷的或忽意的廠主大取便宜。這班婦女們在經濟驅

逐之下，不得已須下心從資本家的意欲，延長工作時間，承受不敷生活費的工資。在這種病態的社會，日本政府爲稍補救起見，曾在立法上給與工人若干的保障了。工人的情形也略加改善了。自一九一九年國際勞工會議（the Inter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以來，日本政府在這個機關監督之下，所規定的關於工人改善的條例，已被批准與施行了。

社會罪惡的存在，已有很悠久的歷史了。在這新時代生活標準的推移中最易發生問題。日本的藝者（譯者按：日本的藝者有類我國的歌舞女，）快要過去了。一部分因爲他們被執照娼女的反對，另一部分因爲她們是專爲富人階級求歡的。藝者的職業，已達到「孤城落日」的光景了。可是在藝者將謝未謝之候，應運而起的又有西式的珈琲店與跳舞場了。這些新起的娛樂場所取費較藝者所取者遠廉。

男女兩性的關係，尙在變遷。然而無論如何，兩性社交已較從前自由得多了。家庭方面也有變遷了。舊的家庭制度崩壞，服從團體的觀念搖動，個人主義的思想勃興了。如潮怒湧的婦女運動，也由西洋澎湃東來了。婦女組織，提高女權，女子參政等的聲調，高唱入雲了。

穢多階級從好幾百年以來，就被社會人的唾棄，現在則這種非理的階級觀念，已有人鼓吹把它廢除了。在法律上穢多階級已與普通人民平等了。雖則事實上他們尚被人們的歧視與虐待。

商人的道德現在已經提高了。就以過去來說，他們的道德無論如何，總不會如一般西人以為那樣壞的。日本政治上的腐敗，自不可免；然而腐敗的程度，必沒有如美國那樣厲害。誰也知道日本人所主張的是侵略主義。這或許是因為一躍而登首等國的一種自然的結果。日本人多是抱極端的愛國主義的。他們以為日本的文化是世界最優尚的。他們有傳播這種文化的責任。

自西洋的科學哲學東來之後，日本原來的宗教與道德標準就發生搖動。神道教在倫理上沒有甚麼力量。它僅有兩方面可值注意：在國家方面，可藉以鼓勵人民的愛國精神，忠服天皇及崇拜國族英雄；在平民方面，則有好幾種信仰。一為「大木教」(Omoto-kyo)，起源一個婦人，自謂她從自動的文寫中得了神音。當世界戰爭時，這種信仰興起，勢力不可漠視。政官員

一時驚惶之下，就力主彈壓。此外另一爲「天理教」(Tenrikyo)，在十世紀的初期已就發生。近年來又有復活的趨勢，可是也因爲政府的反對，仍未能振。至於佛教現在已有恢復的趨勢了。同時在這種危險的激刺之下求其適應了。佛教中的領袖有些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他們會組織了所謂「佛教青年會」以及學校等。這都是仿基督教會所認可的方法而活動的。當二十世紀的開始，「日蓮宗主義」(Nichirenism) 復起，現則已歸銷沈了。可是日本有許多人對於親鸞氏的主張復感興趣了，對十三、四世紀這位著名的佛教徒復感興趣了。雖然在日本的佛教徒日有減少之勢。

基督教呢，當十九世紀末葉日本人大理會它，可是到了現在已經達到一個新的發展的時期了。基督教的勢力在日本增大很快。耶穌教徒無論在人數上或其他的勢力的上都較羅馬天主教來得重要。晚近羅馬天主教雖已增加了許多活動；可是耶教徒已能進而獨立不須外人的幫助了。他們現在有了一位非凡的領袖香川豐彥氏。這位先生他的體質是弱不勝衣的。他現在是一位中年人，他的盛名是廣噪日本的。他是一位著作家，同時又是一位社會改革



家，宗教的傳播家。日本曾洗禮的基督教徒尚未及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惟其影響的力量就不可漠視了。他們不特能影響佛教，而於社會改革，道德標準，出版言論各方面都能感人最深。以講節期，則耶穌聖誕爲日本人民普遍地慶祝，以講倫理，則日本人各面生活，都受基督教徒的評議，而且評議得逾恆厲害。日本的政治中人物，就有不少受新時代的青年攻擊與恐嚇。政府爲了這些問題，曾召集各重要教會內的人物來共同討論補救方法。然而這種會議過重形式，實則敷衍了事，毫無成績。日本的慈善機關漸有多起，其中在基督教會監督之下而設立者不少。基督教會中許多重要人物都很熱忱的努力提高日本人的道德精神。大戰後西洋的個人主義澎湃東來。無論工業，思想，政治那一方面，都是受着西洋思想影響的。日本的軍隊已裁減若干了。在許多學校中已採軍事訓練制了。日本有些地方反對軍國主義的輿論很強，這在日本不能不算新有的事情呢。許多著名的學校當局對於道德教育已漸注意。在許多學校裏頭，每一個教室都貼有一張一八九〇年的皇諭，令學生尊奉該皇諭中的基本的道德原則。同時在課程方面又設法能增進學生的德性。日本人不是不健全的。我們希望在這過渡期

中他們所常犯的咎戾，必不會根深蒂固，而至不可救拔的。

## 結論

前章我們所論述的只是日本國內生活變遷的一個概梗。我們已經說過日本的過渡時期，並不是憲法頒布之日或中日戰爭之時而終止的。日本進步很快，現在依然遵序闊步前進。都市方面雖未能充分的適應西法，工業革命僅算是已經有了好的開始，伴着商業進展。文學，美術，教育，宗教各方面還在變遷的狀態。在這個狀態之下，只可說是由適應，同化的階段，而達至一個具體建設的階段呢。日本人的智慧能力所要產生出來是甚麼？日本國家要變成怎樣？要怎樣去幹？甚麼時候在這適應的步驟中纔能作更遠的進展？這些問題尚沒有人能作正確的預覆。日本是不願僅作一個模仿人家的國家的。因為她有她過去的歷史。她希望能對世界文化有新的貢獻。自然，這是要她將來能與中國合作方可。遠東政治在過去的五十年中而有如許重要者，並非突然而來的事情。中日兩國無論怎樣，其在世界事件上的重要，是有增無已的。

歐美人士對這些問題應有特加考慮的必要啊。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譯者脫稿於哥倫比亞大學

參考書 Japan Year Book; Kikuchi, Japanese Education; Aston, A Brief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Gulick, 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Gulick,

Working Women of Japan; McLare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During the Meiji Era; Okuma, Fifty Years of New Japan; Hornbeck,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 Porter, The Full Recognition

of Japan; The Japan Year Book; Kagawa, Before the Dawn;

Reischauer, The Task in Japan; Anesaki, History of Japanese Reli-

gion; Kennedy, The Changing Fabric of Japan; Beard, Realism in

Modern Japan.



Wenckstern, Fr. von—A Bibliography of the Japanese Empire, 2 vols. This contains a list of the books and articles on Japan in European languages, published from 1859 to 1893. Leiden, 1895, 1894-1906.

General Books of Description, Travel and Statistics

Beard, Miriam—Realism in Romantic Japan, pp. x, 521. New York, 1930. An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fe.

Chamberlain, Basil Hall—Things Japanese, pp. II, 408, 4th ed., London, 1902. This is a standard reference book and covers in alphabetical order the principal topics and questions of interest to the average student of Japan.

Griffis, William Elliott—The Mikado's Empire, 12th ed., 2 vols. New York, 1913. This work first appeared in 1876. The present edition contains supplementary chapters bringing the history down to 1912. This work was long the standard popular authority in English, and while most

of it is now somewhat out of date it is still of interest and value.

Hearn, Lafcadio—*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 2 vols., 1907-10. O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books of an enthusiastic admirer and naturalized subject of Japan.

Japan Year Book. Tokyo, 1905.—An annual summary.

Kennedy, M. D.—*The Changing Fabric of Japan*, pp. vii, 282. London and New York, 1931. A capital book on current conditions.

Mitford, E. Bruce—*Japan's Inheritance: The Country, Its People, and Their Destiny*, pp. 383. New York, 1914. A book in popular style by one who knows Japan well.

Nitobe, Inazo—*The Japanese Nation, Its Land, Its People, and Its Life*. New York, 1912, pp. xiv, 334. This book is made up of popular lectures delivered in America by a well known Japanese scholar.

Porter, Robert P.—*The Full Recognition of Japan, Being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Japanese Empire to 191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1, pp. xii, 789.

##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20 vols. and still in process of publication. The publications of a learned society whose membership is made up largely of foreigners.

The Japan Year Book. Tokyo, 1906 et seq.

## Art and Architecture

Binyon, Laurence—*Painting in the Far East*. London, 1908, pp. xvi, 236.  
Fenollosa, Ernest Francisco—*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2 vols. London, 1912.

## Education

Kikuchi, Baron Dairoku—*Japanese Education*. London, 1909, pp. xvi, 397.

## Literature

Aston, William George—*A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1899, pp. xi, 408. A brief manual by an authority.

Chamberlain, Basil Hall—Japanese Poetry. London, 1911, pp. xii, 260.

This prolific scholar has also produced such other books as 'Aino Folk-tales, Aino Fairy Tales' (3 vols.), and 'Japanese Fairy Tales in English' (1907).

Holtom, D. C.—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odern Shinto: A Study of the State Religion of Japan, pp. 825.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922.

Kojiki (translation by B. H. Chamberlain, 1883).

Mitford, A. B.—Tales of Old Japan, 2 vols. London, 1871. Interesting stories from Japanese sources illustrative of life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Westerner.

Nihongi (translation by W. G. Aston, 2 vols. London, 1896).

Reinsch, Paul Samuel—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Boston, 1911, pp. viii, 396. An admirable work with some important chapters on modern conditions in Japan.

Satomi, Kishio—Japanese Civilization, Its Significance and Realization, pp. xiv, 238. London, 1923.



Tsurumi, Y.—Present-day Japan, pp. v, 114. New York, 1926. Chiefly valuable for its description of current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movements.

Religion, Ethics, Ideals, and Family Life

Anesaki, M.—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Religion, pp. xxiv, 423. London, 1930. A standard account by an outstanding Japanese scholar.

Aston, William George—Shinto, The Way of the Gods. London, 1905, pp.

390. This appeals only to the more serious student.

Carey, Otis—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Japan, 2 vols. New York, c. 1909. The standard account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Japan.

Gulick, Sidney Lewis—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5th ed. New York, 1905, pp. xx, 463. A study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y an able Christian missionary.

Gulick, Sidney L.—Working Women of Japan. New York, 1915, pp. xiv, 162.

Hearn, Lafcadio—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04, pp. v, 541. A brilliant interpretation, largely of family and religious life. It must be used with care.

Lloyd, Arthur—The Creed of Half Japan. New York, 1912, pp. x, 393.

Nitobe, I.—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10th ed. New York, 1905, pp. xxv, 203. A sympathetic, perhaps a too sympa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Japan for Western readers by an eminent scholar.

Reischauer, August Karl—Studies in Japanese Buddhism. New York, 1925, pp. xviii, 361. Somewhat critical of Buddhism.

Reischauer, A. K.—The Task in Japan. New York, 1926, pp. 230. A study of recent Christian Missions.

#### Economic Life and Problems

Bain, H. F.—Ores and Industry in the Far East, pp. viii, 229. New York, 1927.

Harada, Shuichi—Labor Conditions in Japan. New York, 1929.

Orchard, John E.—Japan's Economic Position: The Progr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pp. xvi, 504. New York, 1930. A very careful and somewhat pessimistic description.

####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Abbott, James Francis—Japanese Expansion and American Policies. New York, 1916, pp. viii, 267. A fair, dispassionate discussion.

Buell, Raymond Leslie—Japanese Immigration.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14.

Dennett, Tyler—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1922. pp. xvi, 725.

The best account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Far East.

Gulick, Sidney Lewis—The American Japanese Problem. New York, 1914, pp. x, 349. A study by a friend of Japan.

Japan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Clark University Addresses, ed. by

George H. Blakeslee. New York, 1912, pp. xi, 348. A series of addresses on various Japanese topics by experts.

Kawakami, Kiyoshi K.—Asia at the Door. New York, c. 1914, pp. 269. A statement of the Japanese side of the question by one who has long been a 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is, Harry Alvin—The Japanese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15, pp. xxi, 334. The sub-title, 'An investigation for the commission on relations with Japan, appointed by the 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 indicates the approach to the subject from which the study was made. It is a thorough, fair-minded presentation based on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facts.

McCormick, Frederick—The Menace of Japan. Boston, 1917, pp. vi, 372.

Written with a bitterly anti-Japanese bias by a newspaper correspondent who has long been conversant with Far Eastern affairs.

Millard, Thomas Franklin Fairfax—Our Eastern Question, America's Contact

with the Orient and the Trend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1916, pp. 543.

Nitobe, I.—The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Baltimore, 1891, pp. ix, 198.

Treat, Payson J.—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53-1921. Boston, 1921, pp. 200.

History: Works Covering the Entire Field

Brinkley, F.—Japan, Its History, Arts, and Literature, 8 vols. Boston and Tokyo, 1901-1902. This is a standard treat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rinkley, F.—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New York, 1915, pp. xi, 784. Unlike the last, this is a detailed history confined very largely to the political side of the nation's life.

Davis, F. Hadland—Japan, From the Age of the Gods to the Fall of Tsingtao. New York, London, 1916. One of the best of the short popular accounts.

Hara, Katsuro—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Japan. New York and London, 1920, pp. xx, 411. Excellent.

History: Works Covering Specific Periods or Problems

Asakawa, Kanichi—The Early Institutional Life of Japan: A Study of the Reform of 645 A. D. Tokyo, 1903, pp. 355. A careful study by an exact, painstaking, capable student.

Asakawa, Kanichi—The Russo-Japanese Conflict. Boston, 1904, pp. xiv, 384.

Buell, Raymond Leslie—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New York, 1922, pp. 461.

Hayashi, Count Tadasu—The Secret Memoirs of. Ed. by A. M. Pooley.

London, 1915. An interesting record of a Japanese statesman and diplomat.

Longford, Joseph Henry—The Story of Old Japan. London, 1910, pp. xi, 409.

Longford, Joseph Henry—The Story of Korea. New York, 1911, pp. vii, 400.

McLaren, Walter Wallace—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During the Meiji

Era, 1867-1912. New York, 1916, pp. 379. A careful study but with a marked bias against Japanese expansion and the Japanese oligarchy.

Murdock, James—A History of Japan, 3 vols. pp. viii, 667, viii, 741, 823. Tokyo, 1910, Kobe, 1903. A standard work.

Okuma, Count Shigenobu—Fifty Years of New Japan. English version, ed. by M. B. Huish, 2 vols., 1909. A record by various authors of Japan since its transformation.

Treat, Payson J.—The Far East: A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History, pp. xi, 549. New York, 1928. An excellent account, especially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with a somewhat pro-Japanese bias.

Vinacke, Harold M.—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 Times, pp. XX, 479. New York, 1928. This includes somewhat more of the cultural side than does the above volume by Professor Treat, and with a slightly pro-Chinese bias.